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九十四本，第三分
出版日期：民國一一二年九月

蘇寧阿《萬里回疆圖》與十八世紀後期清朝的新疆地理知識

孔令偉*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庋藏有清朝蒙古旗人武將蘇寧阿（滿文 Suningga, 1731-1805）於乾隆三十八年 (1773) 所製作之《萬里回疆圖》紙本設色地圖長卷，不僅係存世之孤本原件，富有文物價值之外；其地圖寫本以及所附圖說篇幅龐大而記載詳實，極具重要歷史意義。對研究十八世紀後期以降清代西域地理知識的發展，乃至於清朝基礎建設對新疆地景的影響而言，係不可多得之史料。該地圖圖像本體及圖說部分，詳細描繪十八世紀後期新疆之自然、人文地景，尤其反映清朝平定準噶爾後天山南麓的基礎建設與社會情況。此圖尤為可貴之處，在於所附題為〈山川影〉及〈西域回疆記略〉長篇序跋，作者在當中詳述其在十八世紀六〇年代於新疆從軍時之見聞，又詳載關於此地圖之形成原委，深刻體現出宋明傳統堪輿學、清代西北史地學、中亞伊斯蘭地理學等多元知識傳統的交流。其圖文所載地理資訊範圍遼闊，以新疆為幹，旁及當時天下地理形勢，其中多有不見於清代傳世史料者，不僅對於玟察十八世紀下半葉的新疆史地具有重要價值，亦能為進一步深入理解清代地圖學、地理學與天下觀的發展提供關鍵線索。通過結合《萬里回疆圖》的地圖、圖說以及序跋中的時空資訊，並重點比較滿漢文檔案中的相關紀錄，本文將從十八世紀中國與中央歐亞間的歷史脈動出發，進一步玟察盛清西域地理知識的發展，乃至於清朝基礎建設對於新疆地景營造之影響。本文文末附有《萬里回疆圖》彩色照相、序跋全文錄文校注，並藉由地理資訊系統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整合本文對該圖之史地考證，用以繪製清代南疆交通路線圖，以期為學界充分發掘其圖文史料之價值。

關鍵詞：蘇寧阿《萬里回疆圖》　清代新疆地圖　西域史地　地理學知識　基礎建設

---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本文係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三年期計畫「清朝西域地圖測繪與歐亞地理知識傳遞」(NSTC 111-2410-H-001-005-MY3) 階段成果。研究期間，幸蒙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協助調閱《萬里回疆圖》原件並授權使用電子圖版。

一．前言

從十七世紀上半葉至十八世紀中期，雄踞於中央歐亞 (Central Eurasia) 的準噶爾汗國與東方的清朝斷斷續續地展開了超過一個世紀的對壘。也正是因為準噶爾崛起所產生的重大地緣政治挑戰，清廷歷經康熙、雍正與乾隆三代不斷針對中央歐亞進行系統性的情報蒐集行動，從而促成了清代西域地理知識與新疆地圖繪製的歷史發展。通過利用西藏、拉達克、葉爾羌及中央歐亞諸國間商團與朝聖者所形成的情報網絡，清朝自十八世紀上半葉起得以把握印度莫臥兒、伊朗薩法維乃至於沙皇俄羅斯等周邊帝國的勢力消長與政經動向。[1] 隨著清朝情報網的擴張，清廷遂得以獲得大量關於中央歐亞的地理資訊，並通過中國傳統的史地考證之學以及西方耶穌會士傳來的近代地圖學與測繪技術，將這些新興的地理資訊轉化為系統性的地理知識。隨著十八世紀中葉以降清朝對準噶爾的征服，清代官修、私繪地圖中關於新疆的地理資訊亦逐步獲得完善與深化，進而推動了清朝西域地理知識的發展。本文主要的研究目的，正是通過以考察《萬里回疆圖》為基礎，進一步探討十八世紀後期清朝征服準噶爾後在新疆地圖學以及地理學知識等方面的發展。

十八世紀上半葉與準噶爾的軍事對抗，曾直接促成了清朝對「西域」（滿文 wargi ba）的地理知識的建構。清朝文獻中所謂的西域，實際上指涉的地理範圍包含了西藏、準部以及回疆。關於清朝在十八世紀初期首次對西藏進行系統地圖測繪之原委，已有先行研究詳考。要言之，康熙四十七年 (1708) 至五十六年 (1717) 間，清廷在耶穌會士以及地方官吏的協同工作之下完成了《皇輿全覽圖》初版，然而囿於清朝對中央歐亞的實際掌握，當時西藏、準部以及回疆等地尚未被完全收入版圖，而多有空白。為試圖對西藏以及岡底斯山一帶進行實地測繪，康熙五十五年底 (1716) 至五十七年初 (1718) 之間，康熙帝曾秘密派遣學習過歐洲測繪技術的格魯派學問僧，以欽差喇嘛的身分前往青海、西藏等地進行地圖測繪，其成果具體體現在康熙五十八年 (1719)《皇輿全覽圖》西藏部分的增訂中。[2]

[1] 孔令偉，〈1724-1768 年間拉達克、西藏與清廷間的歐亞情報網——以清代中國對莫臥兒帝國的認識起源為核心〉，《清史研究》2018.2：27-48。

[2] 孔令偉，〈欽差喇嘛楚兒沁藏布蘭木占巴、清代西藏地圖測繪與世界地理知識之傳播〉，《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92.3 (2021)：603-648。

值得注意的是，清廷在著手測繪西藏地圖的同時，亦曾秘密派遣間諜前往策旺阿喇布坦遊牧地實地刺探地理情報並繪製地圖，從而成為《皇輿全覽圖》中準部以及回疆地圖的基礎。[3]《皇輿全覽圖》中雖收有〈哈密噶思圖〉及〈雜旺阿爾布灘圖〉這兩份描繪準部與回疆的分幅圖，然而仍有不少天山南北麓地名未被收入，這也反映清廷當時對西域地理知識掌握之限度。[4] 礙於當時準噶爾汗國的勢力，康熙帝不便公開派員前往天山南北麓進行詳盡的實地測繪工作。至雍正朝時，清廷方面雖持續通過邊疆情報網絡刺探準部之地理資訊，並繪製雍正《十排皇輿全圖》中相關圖幅，卻依然無法對準部以及回疆進行大規模的實地測繪。[5] 至於清廷對新疆地理知識進行徹底的系統化調查與整理，仍有待乾隆朝對準噶爾汗國之征討。

隨著乾隆二十年 (1755) 清軍進兵準部，並於二十二年 (1757) 擊敗阿睦爾撒納勢力，準噶爾汗國至此覆亡。緊接著清軍又於乾隆二十四年 (1759) 平定大小和卓，清朝在天山南北的統治正式獲得鞏固，而過去作為政治地理概念的「準部」以及「回疆」亦被統合為「新疆」。在對準噶爾等地展開大規模軍事行動的同時，清朝方面也隨即在乾隆二十一年 (1756) 至二十四年 (1759) 間派遣嫻熟天文曆算的漢、蒙官員，連同歐洲傳教士以及藏傳佛教僧人一同進入新疆進行地圖測繪工作。乾隆三十七年 (1772) 間，清廷又曾再次派員前往新疆進一步進行測繪工作。而以上關於新疆地區的調查測繪成果，也隨後體現在乾隆朝《皇輿西域圖志》、《內府輿圖》等清廷所主導的官修地圖中。[6]

除了因官方刊刻而流通較廣的官修地圖之外，清代自十八世紀下半葉以後，隨著新疆被納入版圖以及西域地理知識的流傳，有不少朝廷官員以及中原士人也開始編纂新疆相關的地圖與志書。這些由清朝官員與士人所製作的新疆地圖，一部分因清廷的統治需求，經由奏摺制度作為附件被送往北京，隨後被保存在軍機

---

3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頁 1366, 1394-1395。

4 Walter Fuchs, *Der Jesuiten-Atlas der Kanghsi-zeit, seine Entstehungsgeschichte nebst Namensindices für die Karten der Mandjurei, Mongolei, Ostturkestan und Tibet, mit Wiedergabe der Jesuiten-Karten in Originalgrösse* (Peking: Fu-Jen Universität, 1943), pp. 10-11. 本文以書名號標註地圖集及獨立圖幅，以篇名號標註地圖集之分幅圖或獨立圖幅之部分。

5 汪前進、劉若芳整理，《清廷三大實測全圖集——雍正十排圖》（北京：外文出版社，2007），五排西三、六排西四以西。

6 榎一雄，〈乾隆期の西域調査とその成果——特に西域同文志について〉，《史学雜誌》58.3 (1949)：49-76。

處、內閣大庫以及內務府造辦處輿圖房等官方機構；另一部分則並沒有上繳朝廷，而是作為官員以及文人的私家收藏，輾轉在社會上流通。與此同時，隨著十九世紀以後內府輿圖管理制度的鬆弛，部分原本秘藏大內的官方地圖也通過底層官吏之手外流到民間，影響了漢地文人的新疆地理知識。[7]

前人關於清代新疆地圖的研究就史料基礎以及研究思路而言，主要可以歸納為兩類：一部分研究主要根據《內府輿圖》以及《西域圖志》等已出版之官方刻本史料，試圖勾勒乾隆年間由清廷中央所推動的官修輿圖之大致經過，進而探討由官方主導的西域地理知識與中原士人文化間的互動關係。[8] 另一部分的研究則通過利用未出版之清代地圖手稿，探討晚清邊界交涉與沿革地理等議題。[9] 根據史料性質的不同，這兩類分別立基於刊刻史料與手抄史料的先行研究，互有短長。如前者在材料上偏重《內府輿圖》等官方刊刻之纂定本，而相對忽略新疆基層官員通過蒐集地方知識以繪製寫本地圖之具體過程。須要注意的是，清廷官修地圖的知識來源，往往係根據新疆地方官員所提供的地圖手稿刪改而來，而後者所蘊含的內容無疑較前者更加貼近當時新疆基層社會的地方知識。換句話說，與其將清朝新疆地理知識的擴張看作單純是自上而下的官修地圖調查，不如視為是地方知識與帝國建構間複雜交錯的互動過程。因此單倚賴清朝官修地圖刻本，難

---

7 Matthew Mosca, *From Frontier Policy to Foreign Policy: The Question of Indi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eopolitics in Qing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101-126; Xue Zhang, "Imperial Maps of Xinjiang and Their Readers in Qing China, 1660-1860,"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 4.1 (2020): 111-133.

8 秦國經、劉若芳，〈清朝輿圖的繪製與管理〉，曹婉如等編，《中國古代地圖集‧清代》（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頁 71-78；喬治忠、侯德仁，〈乾隆朝官修《西域圖志》考析〉，《清史研究》2005.1：104-113；陳世明，〈清代《西域圖志》維漢蒙漢合璧地名〉，《民族語文》2007.1：52-55；張莉，〈《西域圖志》所載鎮西府、迪化州地區戶口資料考述〉，《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3.2 (2008)：142-147；靳煜，〈清乾隆年間西域測繪再考察〉，《歷史地理》30 (2014)：249-266；靳煜，〈乾隆年間三次西域測繪再分析〉，《西域研究》2016.1：27-34；張瑛，〈《西域圖志》纂修略論〉，《西夏研究》2017.1：114-120；劉傳飛，〈清代新疆輿圖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博士論文，2017）。

9 陳維新，〈同、光年間中俄伊犁邊界交涉探討——以中俄訂定之條約及界圖為例〉，《故宮學術季刊》27.1 (2009)：179-225；陳維新，〈帕米爾界圖及光緒時期中俄帕米爾界務交涉問題探討：以國立故宮博物院現藏外交輿圖為例〉，《故宮學術季刊》32.2 (2014)：117-168；陳維新，〈清末新疆塔爾巴哈台段界圖及界務交涉 (1864-1893)〉，《故宮學術季刊》33.4 (2016)：95-142；王耀，〈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清代《新疆地輿總圖》研究〉，《中國典籍與文化》2014.3：121-128。

窺得清代地圖學及地理學知識建構之全貌。另一方面，部分先行研究雖已關注地圖抄本之重要性，然而囿於史料來源，這類研究多半集中探討十九世紀後期晚清新疆地圖的繪製，而對十八世紀盛清的西域地圖寫本著墨較少。清朝在十八世紀繪製的各類西域地圖手稿，具體存世情況目前仍未明朗，民國初年故宮編輯之《清內務府造辦處輿圖房圖目初編》雖有簡短著錄，[10] 然由於各種史料保管因素，得窺原件者迄今寥寥，故盛清西域地圖手稿及其所涉及之各種史地議題，尚未獲得學界充分討論。有鑒於此，本文主要之研究目的，即以作為清代私繪巨幅西域地圖孤本的《萬里回疆圖》為起點，開拓十八世紀新疆地圖手稿相關史源，進一步探討盛清西域輿圖繪製以及西北史地之學的開展經過。

此外，就研究視野而言，早期的先行研究偏重於漢地文人對清代中國西北史地之學的貢獻，而對滿蒙旗人以及在地武將所掌握的西域地方知識著墨較少。值得注意的是，不少漢地文人的西域地理認知往往是經由傳抄甚至臆測而來，因此缺乏系統整理以及實地考察的基礎，與清廷中央的官修地圖與新疆社會之地方知識，均有一定程度的落差，而更傾向於一種立基於中原文化的異域想像。有鑒於此，近年越來越多清史學者開始關注旗人和武員在清代西域地理知識發展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其中又以馬世嘉 (Matthew Mosca)、張雪 (Xue Zhang) 等人的研究具有代表意義。[11] 然而當前學界對於旗人和武員所繪製之新疆地圖手稿，乃至於其所掌握之地方知識傳統等議題，皆仍有進一步探究之空間。

此外，在史料分析方法層面，本文參考近年來內亞以及臺灣史研究者對古地圖的研究取徑，[12] 在以比較語文學梳理《萬里回疆圖》中蘊含之漢文、滿文、蒙

---

10 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編，《清內務府造辦處輿圖房圖目初編》（北平：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1936）。

11 Matthew Mosca, “Empire and the Circulation of Frontier Intelligence: Qing Conceptions of the Ottomans,”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70.1 (2010): 147-207; Xue Zhang, “Qing China’s Discovery of Central Eurasia: Geography and Statecraft, 1759-1881” (PhD diss., Princeton University, 2020).

12 烏雲畢力格、那順達來整理，《蒙古游牧圖：日本天理圖書館所藏手繪蒙古游牧圖及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黃清琦，《臺灣輿圖暨解說圖研究》（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0）；葉高華、蘇峯楠，《十八世紀末御製臺灣原漢界址圖解讀》（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7）；柯志明，《熟番與奸民：清代臺灣的治理部署與抗爭政治》（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21）。又葉高華、蘇峯楠以及柯志明等人根據臺灣古地圖的考證結果，已製成線上地理資訊系統：葉高華、蘇峯楠，「『十八世紀末御製臺灣原漢界址圖』轉譯」(https://www.google.com/maps/d/u/0/viewer?mid=158sIoQJr

古文、突厥文、波斯文及俄文等多元地理資訊的基礎上，藉助地理資訊系統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等量化數位科技整合質化史地考證結果，進一步繪製具經緯度座標之清朝南疆交通路線圖。

在回顧上述既有研究的前提下，本文首先將對乾隆朝正白旗蒙古侍衛蘇寧阿所製作之《萬里回疆圖》進行實證研究，並在比較相關滿漢文等多語種史料的基礎上，梳理該圖體現十八世紀後期旗人經由實地考察私繪新疆地圖手稿之時空脈絡，進而詮釋該圖背後兼容中原以及內亞等地多元知識傳統的歷史意義。

二・清代新疆輿圖的繪製、保管與流傳

研究清代的新疆地圖測繪以及相關地理知識的發展，輿圖的繪製、保管與流傳是首先需要釐清的議題。目前已知的清代新疆輿圖按編纂性質可以分為官修與私繪兩類，而在數量上又以官修為大宗。本文研究的《萬里回疆圖》，即為相對罕見的清代私繪新疆輿圖。清代官修的新疆輿圖就數量上而言主要形成於十八世紀，尤其是一七五五年清廷出兵準噶爾以後。除前述《皇輿西域圖志》以及《內府輿圖》等由清廷官方測量團隊編纂的大型地圖集外，尚有許多由地方官員進呈朝廷而未正式出版的地圖手稿。相較於朝廷中央所主持編纂的地圖集，地方官員所繪製的新疆地圖多半具有特定的地方性與目的性，例如國立故宮博物院今藏有乾隆年間繪製的《阿克蘇軍臺卡倫圖》以及《石峽口情形圖（玉出圖）》便是針對特定地區軍事部署以及資源調查所繪製的專題地圖。[13] 這類由地方官員測繪的新疆地圖雖然名義上作為官修地圖而被保存在官方檔案中，其內容乃至風格卻往往具有私繪地圖的性質，尤其體現官員本人對新疆的在地見聞。

一般來說，清代官員繪製並上繳朝廷的新疆輿圖，根據案件事由以及傳遞渠道的不同，被分別保存在內廷與外朝。[14] 被收藏在內廷的地圖，隨著乾隆、嘉慶

_4YvZWdx9Uj4sSjNXNY&ll=23.329738505884478%2C122.74074475390624&z=7，檢索 2021.12.31)；柯志明、陳兆勇，「乾隆臺灣番界」，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 GIS 專題中心「臺灣百年歷史地圖」(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twhgis.aspx?fbclid=IwAR2kTdqfHmkEDcwRgx1d6XPZbL3peDn9OEESUYa7ZYYxZnsNzFvr_sPQY58#，檢索 2021.12.31)。

[13]《阿克蘇軍臺卡倫圖》（收入《軍機處檔摺件》〔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文獻編號 022315）；《石峽口情形圖（玉出圖）》（收入《軍機處檔摺件》，文獻編號 040480）。

[14] 關於清代內廷與外朝文書制度的運作，參 Beatrice Bartlett, *Monarchs and Ministers: The Grand Council in Mid-Ch'ing China, 1723-182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兩朝的整理調查，被著錄於乾隆二十六年 (1761)《蘿圖薈萃》、乾隆六十年 (1795)《續蘿圖薈萃》以及嘉慶十一年 (1806)《國朝宮史續編》當中。[15] 除了清朝當時所整理的輿圖目錄外，民國二十五年 (1936) 國立故宮博物院在清點前清內務府遺留庫存的基礎上，又出版《清內務府造辦處輿圖房圖目初編》。這些清代的新疆古地圖也因此在不同時期所編纂的輿圖目錄中留下蹤跡。[16] 如《蘿圖薈萃》中曾著錄諸如「《嘉峪關至安集延等處圖》一軸、《嘉峪關至葉爾奇木、哈什哈爾等處道里圖》一張、《噶斯、哈密、伊犁回部等處圖》三張」等新疆與中亞相關地圖十餘幅。[17] 然而多數這些秘藏大內的新疆輿地圖，事涉邊務機要，不僅有清一代並未對外廣泛流通，時至今日依舊難以得見，故世人未能一窺其全貌。這些清代內府所藏新疆地圖，目前主要被保存在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迄今尚未正式對外開放，因此目前學界對其製作年代、保存情況以及歷史背景等具體信息仍無法進行深入研究。

至於保存在外朝的清代輿地圖，則主要集中在內閣大庫中。隨著清朝的覆亡而轉由國立北平圖書館保存。隨著國民政府播遷來臺，其中一部分的地圖又被先後轉移至國立中央圖書館，最後入藏位於臺北的國立故宮博物院。至於仍保留在北京的清代內閣輿圖，則由北京圖書館接管，即今日中國國家圖書館現藏清代輿圖部分之基礎。關於清代內閣舊藏輿圖的保管沿革，可以從國立北平圖書館、國立中央圖書館以及北京圖書館等單位歷年編纂的目錄中發現相關線索。[18] 這一部

[15] 據稱《蘿圖薈萃》與《續蘿圖薈萃》原件今藏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鄒愛蓮，〈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清宮輿圖〉，發表於國立故宮博物院主辦，「清代檔案整理與館際合作——第三屆清代檔案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6.11.02-03）。囿於現今中國檔案管理規則，這兩份清代輿圖目錄不開放調閱檔案原件以及電子圖像，亦未曾公開出版，僅有汪前進的錄文可供參考。汪前進編，《中國地圖學史研究文獻集成（民國時期）》（西安：西安地圖出版社，2007），頁 1873-1884；慶桂等編，左步青校點，《國朝宮史續編》（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上冊，卷一〇〇，頁 1013-1014。

[16] 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清內務府造辦處輿圖房圖目初編》。

[17] 汪前進，《中國地圖學史研究文獻集成（民國時期）》，頁 1878。

[18] 王庸編，〈國立北平圖書館特藏清內閣大庫輿圖目錄・附國立北平圖書館特藏新購輿圖目錄〉，《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6.4 (1932)：45-72；王庸、茅乃文編，《國立北平圖書館中文輿圖目錄》（北平：國立北平圖書館，1933）；國立北平圖書館編，《國立北平圖書館輿圖部概況》（北平：國立北平圖書館，1934）；王庸、茅乃文編，《國立北平圖書館中文輿圖目錄續編》（北平：國立北平圖書館，1937）；鄧衍林編，《中國邊疆圖籍錄》（上海：商務印書館，1958）；國立中央圖書館編，《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86，增訂二版）；中國國家圖書館編，《輿圖要錄》（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

分過去主要儲存在內閣的清代輿地圖，近年來隨著國立故宮博物院逐步對外開放利用，學者因而得以對其開展相關研究。[19]

除了上述收藏在內務府輿圖房與內閣大庫的大宗輿圖外，軍機處奏摺錄副中也收有相當數量的零散地圖。這些地圖往往是由地方官員所繪製並作為奏摺附件寄往清廷，最終在歸檔時被劃入軍機處錄副奏摺中。這一部分的地圖在清代僅被作為奏摺附件與軍機處錄副一同保管，因此並未被系統著錄。隨著軍機處檔分存兩岸，保存在國立故宮博物院的相關附件地圖近年已大量在數位人文平台開放，供研究者自由利用。[20] 至於保存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軍機處錄副附件地圖，雖然估計數量更為龐大且富有研究價值，然而由於二十世紀種種保管因素的變化，這些作為奏摺附件的輿圖被與錄副拆分保管，造成了大量圖文分家的情況，在缺乏錄副文字敘述的歷史線索下，為這部分古地圖研究造成了極大的困難。未來檔案館與研究者是否有可能進行協同合作將附件輿圖以及奏摺錄副進行重組復原，將是能否系統利用軍機處檔所附輿圖的重要前提。

在官方主導的地圖測繪外，清代亦有一定數量之私繪新疆輿圖，惟後者較諸前者保存相對零散。目前已知清代的私繪新疆輿圖多形成於十八世紀下半葉清朝征服準噶爾以後，如國家圖書館藏《新疆地輿總圖》以及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新疆全圖》，據王耀考證這兩幅私繪的清後期輿圖鈔本具有同源關係，其原始母本應反映乾隆三十八年 (1773) 之行政建制。[21] 至於本文研究之《萬里回疆圖》，據以下考證，底稿形成在乾隆二十九年 (1764) 至三十二年 (1767) 間，而初謄稿則亦繪於乾隆三十八年。然仔細考察《萬里回疆圖》繪寫本，可以發現無論就形成年代、圖像篇幅或文字內容而言，其可提供之歷史資訊遠逾前人研究之《新疆地輿總圖》及《新疆全圖》等後出史料，可以說是現見清代私繪新疆地圖的代表

---

[19] 李孝聰，〈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藏清代輿圖的初步整理與認識〉，《故宮學術季刊》25.1 (2007)：151-178；承志，〈滿文《烏喇等處地方圖》考〉，《故宮學術季刊》26.4 (2009)：1-74；承志，〈尼布楚條約界碑圖的幻影——滿文《黑龍江流域圖》研究〉，《故宮學術季刊》29.1 (2011)：147-236；盧雪燕，〈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彩繪本《山西邊垣圖》與《山西三關邊垣圖》考述〉，《故宮學術季刊》30.4 (2013)：105-153。

[20] 國立故宮博物院「明清輿圖全文影像資料庫」(http://npmhost.npm.gov.tw/tts/npmmeta/map/mapindex.html，檢索 2021.07.19)。

[21] 笑幻道人，《新疆地輿總圖》（清光緒年間鈔本，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新疆全圖》（清鈔本，Washington, DC: Library of Congress）。相關研究參：王耀，〈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清代《新疆地輿總圖》研究〉，頁 121-128。

之作，其篇幅之宏、畫工之精、圖說之詳，為同期作品所罕見。據筆者考察海內外現存輿圖目錄以及相關資料，該圖當為存世孤本，有待更深入研究。

綜合以上所述，清代官修輿圖的保管單位主要有三，即內務府輿圖房、軍機處以及內閣大庫，其中內務府輿圖房以及內閣大庫的收藏情況因為曾經編目而相對清晰，至於軍機處的整體保管情況則尚待釐清。然而可以相對確定的是，無論是內務府、軍機處抑或內閣，這三處所保管的新疆地圖由於事涉邊務軍情，即便在十九世紀以後曾少量外流民間，卻並未廣泛地公開流通；而這些地圖背後所蘊含的地理學知識，也為朝廷中央所壟斷。清代考據學者雖因十八世紀清朝版圖的擴張而開始關注邊疆歷史地理，並根據漢文傳世文獻發展出西北史地之學，然而其所掌握的地理知識多半源於文獻考證而相對缺乏實測依據。

除了上述清廷所掌握的測繪輿圖以及考據學者的西北史地之學外，清代地圖學以及地理學的發展實際上更為多元，仍有待學界進一步發掘，如武將、邊吏對地理學知識的掌握與貢獻便是一個極為關鍵的課題。相對於文臣、學者們主要通過文獻考據所建構的地理認知，清代的武將與邊吏擁有更多的機會實地考察乃至於進一步應用、核對文獻上的地理知識並提出新的見解。因此理解清代武員、邊臣對於地理學知識的掌握、實踐與創新，對於深入探索清代地理知識形塑以及地理學思想發展具有獨特意義。本文研究清代乾隆、嘉慶年間蘇寧阿於乾隆三十八年 (1773) 所製作之《萬里回疆圖》，便是體現清代邊疆武員與清代西域地理知識發展關係密切之極佳實例。以下將首先考察該圖的作者、形制與繪製過程，進而探討該圖形成之時空脈絡以及歷史意義。

三、《萬里回疆圖》的作者、形制以及繪製過程

《萬里回疆圖》，紙本設色，卷軸裝，今藏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善本室，條碼編號 123139。據該館圖書著錄，其不含裝裱部分尺寸約長 1,270.83 公分、寬 64.64 公分，含裝裱尺寸約長 1,276 公分、寬 69 公分，入藏時間為民國三十六年七月二十四日。[22] 在該圖卷首、卷尾處分別題有名為〈山川

[22] 蘇寧阿，《萬里回疆圖》（清乾隆三十八年紙本設色圖，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尺寸資訊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提供，謹此致謝。由於卷軸紙張彎曲幅度以及各處裁切尺寸略有誤差，此處數值為盡量攤平測量之結果，仍存在一定範圍誤差。

影〉以及〈西域回疆記略〉的兩篇序跋文字，偶有蝕落，前者約 7,915 字，後者約 5,407 字，合計約 13,322 字。[23]

關於該圖入藏史語所之原委，可由《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整編史語所檔案》見得端倪。民國三十四年 (1945) 中日戰爭結束，翌年史語所自李莊返歸南京復員。[24] 自民國三十五年 (1946) 迄三十七年 (1948) 間，史語所陸續接收日方戰敗後遺留之歷史書籍與文物。[25] 在上述時空脈絡下，民國三十六年七月二十四號史語所 216 號金石書庫點交清冊，著錄入藏「一二三一三九：山川影壹軸」，經手人為那廉君、嚴耕望二人。[26] 而這份史語所檔案中提到的「山川影」，實際上指的正是《萬里回疆圖》，因當時經手者將該圖序題以為圖名之故；至於檔案記載入藏日期以及條碼編號，與今日傅圖通行著錄完全吻合。

該圖主體部分為一大型新疆地圖，繪製方向上北下南，自東徂西，涵蓋地理範圍東起肅州，經嘉峪關通玉門、安西、沙州、哈密、辟展、吐魯番、阿克蘇、烏什等地，西抵喀什噶爾；南北分別約以崑崙山脈及天山山脈為界。主要內容描繪十八世紀六〇年代清朝內地通往天山南麓南疆一帶之道里、路程、城池、地貌、人戶等自然與人文地理主題。

關於作為此圖描繪主體的「萬里回疆」，作者在跋文中對其地理範圍有明確的定義：「西域回疆，自嘉峪關外，由哈密順北大幹龍大山之南山根，西抵喀什噶爾、葉爾羌、和闐等處計十三城，共六千七百六十里，實約有萬里。」[27] 由此可知，該圖繪製的主體範圍係由嘉峪關迤西，從哈密沿天山南麓各城迄喀什噶爾，共十三城。清代文獻中所謂的「回疆」，對譯滿文 hoise jecen，係對南疆穆斯林聚居區的統稱。隨著十八世紀中期清朝陸續征服準噶爾汗國以及大小和卓勢力，清朝逐步確立了以「回疆」以及「伊犁」分別代稱天山南北的地理概念，並

---

[23] 此處所列文字統計不含闕字數。

[24]〈傅斯年致董作賓〉(1946.04.20)，王明珂主編，《史語所舊檔文書選輯》（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8），頁 101-104。

[25]〈存二一六號金石庫中之接收日本人字畫等件清冊〉（1947.07.21，雜 36-48-1）、〈氣象所來函〉（1948.07.17，雜 36-47-8），《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整編史語所檔案》。

[26]〈卅六年七月廿四入 216 號各書〉（1947.07.24，雜 36-48-2），《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整編史語所檔案》。

[27] 蘇寧阿，〈西域回疆記略〉，《萬里回疆圖》。因《萬里回疆圖》係寫本史料，書寫多用異體字，即同一字筆順亦時有細微出入。本文為考量可讀性，於正文徵引史料時，在異體字與正體字形近的情況下，採通行之正體字；並保存型態與正體字差距較大之異體字。至於附錄錄文則在維持排版工整的前提下，盡量保存異體字差異。

體現在其對於新疆的治理層面，如嘉慶十六年 (1811) 主要為規範天山南麓穆斯林所頒布之《欽定回疆則例》（滿文 *Hesei toktobuha hoise jecen i kooli hacin i bithe*）即為一例。[28] 值得注意的是，此圖將回疆劃分為十三城，有別於清代官方文獻中的「回疆八城」以及突厥文文獻中通稱的「六城」(Altishahr)。[29]

這份輿圖的主體雖以天山南麓的回疆為核心，然其圖文部分亦涉及天山北麓，而在序跋文中作者更是以新疆的西北地理知識為起點，長篇詳述其對於中國華北、東北至西南各地地理知識的掌握。作者在序文〈山川影〉中主要論述了他對天下輿地山川形勢的認知；至於在跋文〈西域回疆記略〉中，作者則在實地考察的基礎上，記錄了他對新疆各地主要城池形勢的觀察。此外，作者也在序跋文中說明其製作此地圖的目的以及經過。這兩篇序跋文未收錄於現存傳世文獻，其中資訊與清代史料頗有可相參照之處，對於從基層官員的視野出發，進一步理解清代新疆地方知識乃至於天下地理觀念，具有極高的研究價值。

根據卷末落款以及首尾鈐印，得以確定該圖作者名為蘇寧阿。卷首序文前鈐有印文「牡丹華樵」一封，又蘇寧阿傳世文集中亦有專詠牡丹之篇，其文友以為頗有追比歐陽修〈洛陽牡丹記〉之意趣。[30] 此外在地圖主體前後，復鈐有題為「山向吾曹分外青」的藏書印，語出蘇軾〈平山堂次王居卿祠部韻〉一詩，這通藏書印的字體及印跡，與蘇寧阿私章相仿。又據蘇寧阿詩文集，其嘗以「蘇子」自況，並數次模仿蘇東坡作品體例為文，景仰攀比之情可見一斑，故從文化心態上亦可證得此印當屬蘇寧阿本人所用。[31]

---

[28] *Hesei toktobuha hoise jecen i kooli hacin i bithe* (《欽定回疆則例》滿文清刻本, Washington, DC: Library of Congress).

[29]《清宣宗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一一八，頁 983；關於突厥文「六城」概念的相關討論，參 Rian Thum, *The Sacred Routes of Uyghur Histo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3-6; David Brophy, *Uyghur Nation: Reform and Revolution on the Russia-China Frontie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178-181; Onuma Takahiro, "The 1795 Khoqand Mission and Its Negotiations with the Qing," in *Kashgar Revisited: Uyghur Studies in Memory of Ambassador Gunnar Jarring*, ed. I. Bellér-Hann, B. N. Schlyter, and J. Sugawara (Leiden: Brill, 2017), pp. 91-115.

[30] 歐陽修，《文忠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02-110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七二，葉 7b；蘇寧阿，〈遊天盆山寺賞牡丹記〉，氏著，《恒一堂文稿》（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376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頁 218-219。

[31] 蘇軾撰，王文誥輯注，《蘇軾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卷一二，頁 593；蘇寧阿，〈遊水月庵後序〉，氏著，《恒一堂文稿》，頁 164-165。

根據《官員履歷片》等清代檔案史料，可知該圖作者蘇寧阿生於雍正九年 (1731)，卒於嘉慶十年 (1805)。[32] 關於其早年的經歷，蘇寧阿在〈山川影〉中曾回憶道：「於乾隆丙寅歲，寧隨守播州，登仕籍；後從戎西域及緬甸，奔馳四方。」[33] 這段文字反映出蘇寧阿在志學之年便曾自京師遠赴西南，從而開拓了他少時的地理視野。關於蘇寧阿的個人背景，《八旗通志》以及《清國史館傳稿》等官修史籍，僅載其正白旗蒙古旗籍，未述其家世來歷。[34] 然據筆者考證，蘇寧阿之父即乾隆十一年 (1746) 出任貴州遵義府知府的四十七（滿文 Syšici，1708-?）。[35] 正因為跟隨其父前往貴州仕宦的經驗，蘇寧阿在青年時期便已開始對清朝的邊疆歷史地理產生興趣而開始從事實地調查，進一步繪製輿圖並撰寫圖說。例如位於遵義府北方的海龍囤，曾是明神宗時期播州土司楊應龍的起事根據地，為考證這段前明史事與貴州地形的關係，蘇寧阿曾繪製《海龍囤圖》並撰寫圖說。[36] 又乾隆十一至十六年間，蘇寧阿曾數度路過湖南武陵山脈一帶，見河谷兩端峭壁上之懸棺，不禁感到好奇，因此多次採訪地方土著相關掌故，同時詳細記錄武陵山脈流域之河灘位置，希望以此補充《水經注》之不足。[37] 由此可見，青年時期的蘇寧阿對於中國西南邊疆的史地考證以及輿圖繪製已頗為留心。

除貴州等西南邊疆外，蘇寧阿對於新疆以及緬甸的地理形勢亦有相對深入的認識。其自稱「從戎西域及緬甸」，體現出他在十八世紀六〇年代曾參與清朝對新疆烏什及緬甸邊境的戰爭。至於蘇寧阿在乾隆三十年 (1765) 以侍衛身分前往新疆投身清廷平定烏什回變的實地經驗，不僅成為其本人仕宦之轉捩點，更成為《萬里回疆圖》的形成基礎。對此《清國史館傳稿》有所記載：

[32] 乾隆五十四年 (1789)《官員履歷片》記載蘇寧阿時年五十九歲，以此推得其生年。又《清國史館傳稿・蘇寧阿列傳》明確記載其卒年分。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卷二，頁 434；《蘇寧阿列傳》（收入《清國史館傳稿》〔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文獻編號 701003586）。關於其生平相關史料，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人名權威／人名傳記資料庫」(https://newarchive.ihp.sinica.edu.tw/sncaccgi/sncacFtp?@@0.8700873109300296，檢索 2021.07.19)。

[33]《蘇寧阿列傳》（收入《清國史館傳稿》）；蘇寧阿，〈山川影〉，《萬里回疆圖》。

[34]《欽定八旗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71 冊），卷三四二，葉 15a；《蘇寧阿列傳》（收入《清國史館傳稿》）。

[35] 關於四十七的履歷以及任遵義知府的相關記載，參《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卷二，頁 89；卷一六，頁 346-349。

[36] 蘇寧阿，〈海龍囤圖說〉，氏著，《恒一堂文稿》，頁 158-159。

[37] 蘇寧阿，〈黔楚灘河險易說〉，氏著，《恒一堂文稿》，頁 158-160。

> 蘇寧阿，伊普楚特氏，蒙古正白旗人，[38] 乾隆十九年由監生恩賞藍翎侍衛……（乾隆）三十年隨將軍明瑞，剿辦烏什回匪，打仗受傷。經參贊大臣永貴等保奏，引見。奉旨：著應升處記名。[39]

對於蘇寧阿覲見乾隆帝的經過，清代檔案有詳細的記載。《內閣大庫檔》中藏有一份乾隆三十二年 (1767) 十月兵部行文內閣稽查房的滿漢文移會，其中抄有一份永貴向乾隆帝保舉蘇寧阿的滿文奏摺。在該奏摺中，永貴稱蘇寧阿原係乾隆三十年清廷派往喀什噶爾（滿文 Kasigar）戍邊侍衛中的一員，因考核期滿，且在職期間因積極效力平定烏什（滿文 Uši < 突厥文 Uchturpan）地方回變，獲將軍明瑞（滿文 Mingšui）等人肯定，故舉薦其升為一等侍衛並進京覲見。[40]

因其在新疆的戰功獲得乾隆帝之肯定，蘇寧阿在覲見後陸續被升授紫荊關參將、通州協副將以及正定鎮總兵等武職。乾隆五十九年 (1794) 皇帝巡行趙北口（位於今河北保定市安新縣），召見時任天津鎮總兵的蘇寧阿並特別「垂詢前在烏什軍營打仗受傷，賞戴花翎」。[41] 由此可見，蘇寧阿在清廷平定烏什回變一役中的表現，給乾隆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皇帝的器重下，蘇寧阿隨後更是仕途亨通，先後出任甘肅提督、寧夏將軍以及鑲黃旗蒙古都統等要職，成為活躍於十八世紀後期的蒙古旗人將領。[42]

在軍旅生活之外，蘇寧阿亦醉心詩文，有文集《恒一堂文稿》、《煙霞錄》，以及詩集《山居野吟》、《江村野吟》等作品傳世，然而《萬里回疆圖》及其序跋文並未收入上述文集。[43] 蘇寧阿的詩文集內容豐富，一方面體現其與漢地文人多有過從；另一方面反映出其篤信道教並以道教弟子自居，而其作品中亦多次自署道號「天台採藥道人」以及法名「妙參」。[44] 他長年鑽研道術，對煉丹

---

[38]《清國史館傳稿》底本中「蒙古正白旗人」原在「伊普楚特氏」前，後修改顛倒次序；惟《清史滿漢大臣列傳》仍作「蒙古正白旗人，伊普楚特氏」。《蘇寧阿列傳》（收入《清史滿漢大臣列傳》第 116 冊〔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統一編號：故殿 026369）。

[39]《蘇寧阿列傳》（收入《清國史館傳稿》）。

[40]《內閣大庫檔》（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檔案號 192751。

[41]《蘇寧阿列傳》（收入《清國史館傳稿》）。

[42]《蘇寧阿列傳》（收入《清國史館傳稿》）。

[43] 蘇寧阿，《恒一堂文稿》，頁 147-232；蘇寧阿，《煙霞錄》（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376 冊），頁 233-247；蘇寧阿，《山居野吟》（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376 冊），頁 248-266；蘇寧阿，《江村野吟》（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376 冊），頁 267-282。

[44] 蘇寧阿，〈黃庭經序〉，氏著，《煙霞錄》，頁 238；蘇寧阿，〈太元太上老君傳文始先生無上真人慮喜道德經本末〉，氏著，《煙霞錄》，頁 247。

術以及堪輿學尤有心得，並與中原文士相善，如曾署理天津府學教授，纂訂《神仙鑑》以及《長蘆鹽法志》等書的黃掌綸，便是蘇寧阿的道友。[45] 黃掌綸曾於乾隆六十年 (1795) 贈詩予蘇寧阿，稱讚其學問與道行：「先生仙骨非凡流，黃庭妙蘊精藏修；丹經註就黃芽抽，谷神長養心油油。」又黃掌綸在該詩頸聯旁注小字稱「先生有〈《心印經》釋義〉、〈八段錦補注〉等偏」。[46] 由此可見，蘇寧阿本人不僅曾實修道法多年，更曾就《玉皇心印經》等道教經典及八段錦等氣功修法撰寫經解注釋。

在著書探討道教心法與氣功之外，蘇寧阿也曾為文討論倒杖法等堪輿之術。[47] 他更將所掌握的堪輿學知識大量應用在其仕宦經歷中，並具體體現在輿圖的繪製以及解說等方面。例如在乾隆五十四年 (1789) 至嘉慶四年 (1799) 間蘇寧阿任天津鎮總兵時，便曾繪製河間府輿圖並撰寫圖說，試圖運用其地理學知識解決現實的漕運問題。[48] 而篇幅宏偉的《萬里回疆圖》及其所附的長篇圖說，則可視為蘇寧阿綜合結合運用堪輿學理論以及地圖學測繪來建構新興地理學知識的代表作。

關於《萬里回疆圖》的繪製時間、具體經過以及保存情況，蘇寧阿在該圖跋文〈西域回疆記略〉中有詳細的記載：

> 乾隆二十九年正月二十四日，余於侍衛任內，出卡倫兵，赴喀什噶爾。三月十七日出嘉峪關，自八道溝向西行，由沙州至哈密，係新路。於三十二年九月初四日自哈密向東行，由安西至八道溝，歸路至嘉峪關，係舊路。按山川道路險易形勢，日繪一圖，凡山之枝幹，河之源委，形勝阨要，水草田土，有關於屯戍防守者，莫不備載……余將所經歷之山川繪圖作說，名曰《萬里回疆圖》，以備後之好古博學者之採取考覽焉。圖成於癸巳歲，紫荊關參將署中之四松亭；裝裱於己酉歲六月，正定總兵署中之正定書屋。兩分兩卷，遂付與長子額勒謹、次子額樂春、三子額樂布、四子額樂昇、長孫福謙、次孫益謙、三孫吉謙世藏，以為傳家之珎，敬之重之。[49]

[45] 徐道撰，黃掌綸修訂，《神仙鑑》（臺北：廣文書局，1987）；黃掌綸等纂，《長蘆鹽法志》（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

[46] 原注小字「偏」為「篇」之通假。黃掌綸，〈跋江村野吟〉，蘇寧阿，《江村野吟》，頁 281。

[47] 蘇寧阿，〈倒杖法〉，氏著，《恒一堂文稿》，頁 191-192。

[48] 蘇寧阿，〈河間地輿圖形勢說〉，氏著，《恒一堂文稿》，頁 228-230。

[49] 蘇寧阿，〈西域回疆記略〉，《萬里回疆圖》。

由此可見，《萬里回疆圖》的底稿最初形成在乾隆二十九年 (1764) 至三十二年 (1767) 間蘇寧阿往返於北京與喀什噶爾的旅途中。其繪圖之主要目的，一方面在於掌握現實的邊防軍事所需的地理資訊，如山川形勢、水草田土乃至城池關隘；另一方面亦是為了開拓當時堪輿學界對天下地理的認知，進而將新興的新疆地理知識納入到以三大幹龍為核心的龍脈理論傳統。

在返回北京後，蘇寧阿復在乾隆三十八年 (1773) 出任紫荊關參將，而同年他委託了一位名叫李梓的畫師在整理、謄繪其原始地圖手稿的基礎之上完成了《萬里回疆圖》的主體部分，並且親自撰寫序跋文的初稿。直到乾隆五十四年 (1789)，蘇寧阿才又委託一位名叫梁璞的書工繕寫序跋文，並裝裱於地圖主體的前後部分。[50] 換句話說，《萬里回疆圖》的繪製過程，從原始底稿、整理謄繪到最後的裝裱工作一共歷經二十五載，不可不謂慎重。而最終所形成的兩份卷軸裝巨幅地圖，被蘇寧阿作為傳家之寶收藏，目前中研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所藏即為其中之一件，另一複本目前則下落未明。在認識作者生平以及繪圖經過的基礎上，以下將進一步分析《萬里回疆圖》所象徵的地理學知識體系及其在清代的發展演進。

四・堪輿龍脈論、西域地理學與新疆地方知識的交錯

蘇寧阿的《萬里回疆圖》對於研究十八世紀的中國與內亞地圖學史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不僅僅是因為其作為一份篇幅龐大的新疆地圖手稿孤本，更是因為該史料豐富的圖文資訊深刻體現出在清朝疆域擴張的歷史背景下，宋明以降的堪輿傳統、盛清的西域地理學及新疆的地方知識三者間的互動、交錯與發展。換句話說，《萬里回疆圖》反映了清朝對新疆的軍事征服與中國地理學知識傳統間的微妙互動。而要理解《萬里回疆圖》的歷史意義，則必須將其置於清代堪輿學、理學與考據學的多重思想脈絡下。《萬里回疆圖》的知識基礎，除了實地觀察外，亦深受元明以降龍脈理論和清代考據學風的影響。其知識體系多元，主要可歸結為堪輿龍脈論、西域地理學與地方知識等三種面向。

---

[50] 關於畫工以及書工的姓名，見於《萬里回疆圖》序文：「旹大清乾隆三十八年歲次癸巳孟秋良日，書成於古中山六合客館。易水李梓摹圖於紫荊關之四松亭。五十四年歲次己酉，六月六日恒山梁璞書字於正鎮之正定書屋。」蘇寧阿，〈山川影〉，《萬里回疆圖》。

在《萬里回疆圖》複雜的知識體系中，堪輿學具有重要的地位。通過堪輿學方法，蘇寧阿試圖詮釋關於新疆的新興地理資訊，進而修訂、擴充中國傳統的地理知識體系，這也體現在《萬里回疆圖》中頻繁出現的堪輿學術語。如在標註地理方位時，蘇寧阿採用了風水羅盤的二十四山向，亦即以八卦、天干、地支來標記相對地理位置。此外，蘇寧阿亦採用龍穴砂水等堪輿地形術語來描述其所見聞之新疆地形地貌，如其途經位於星星山西麓的哈密苦水隘口（今哈密市伊州區東南）時，便以「金星名山」標註當地山勢。[51] 關於蘇寧阿此處提到的「金星」山形，即《堪輿漫興》所謂「金星形體淨而圓，弓起渾如月半邊」。[52] 由此可見，蘇寧阿在繪製新疆地圖時多倚重傳統中國堪輿學方法，這點與清廷憑藉經緯網格座標等歐洲地圖學技術所主導的官方測繪，有著根本的差異。

此外，宋明以降的堪輿學知識傳統深刻影響了《萬里回疆圖》所體現的天下地理觀，尤其是其中以三大幹龍說為核心的龍脈理論。蘇寧阿在《萬里回疆圖》序文中開篇便提到：「山脉發自崑崙，劈枝分脉，有三大幹入中國之說。」[53] 這種將崑崙山視為天下山脈發源地的說法，可以追溯至宋代理學家受堪輿學影響對《尚書・禹貢》的再詮釋，如朱熹門人蔡元定 (1135-1198)《發微論》嘗云：「凡山皆祖崑崙，分支分脈。」[54] 自宋代以後，所謂的「堪輿」逐步發展為「風水」的同義詞，並且與理學發生互動。[55] 在這個思想脈絡下，宋代以降的理學與堪輿學之間的互動，在元明時期逐步演化為三大幹龍學說，最終造成「理學學說—民間信仰」、「真實山川—想像地理」以及「地理知識—皇權正統」等層疊形成下的龍脈論。[56]

隨著堪輿學在元明兩代的發展，這種以崑崙為眾山起源的地理學說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的天下觀，同時也影響了地圖學的發展。如明萬曆十一年 (1583)《重刊人子須知》收有《中國三大幹龍總覽之圖》，又萬曆三十五年 (1607)《三才圖

51 蘇寧阿，《萬里回疆圖》。

52 劉基，《堪輿漫興》（收入《古今圖書集成》第 475 冊，上海：中華書局，1934），卷六六九，葉 60。

53 蘇寧阿，〈山川影〉，《萬里回疆圖》。

54 王梓材、馮雲濠輯，《宋元學案補遺》（收入《四明叢書》第 5 集，臺北：新文豐，1988），卷六二，頁 17。

55 劉祥光，〈宋代風水文化的擴展〉，《臺大歷史學報》45 (2010)：1-78。

56 段志強，〈經學、政治與堪輿：中國龍脈理論的形成〉，《歷史研究》2021.2：109-132；楊玉成，〈龍脈〉，《中國文哲研究通訊》29.1 (2019)：147-167。

會》中亦錄有《中國三大幹圖》並搭配圖說，二者標識崑崙山脈由西北向東南分為三支，又分別由黃河、長江、鴨綠江區隔其中。[57] 詳考《中國三大幹圖》及其圖說，便可發現該圖實際上是一種對《朱子語錄》天下觀的視覺化以及再詮釋，並以黃河與長江作為界限，將中國境內的山脈分為北、中、南三大幹龍。[58] 以三大幹龍為核心的堪輿地理觀，也通過書籍出版與口耳相傳等方式在明清社會中流通，如明清時期託名劉伯溫所作之《堪輿漫興》云：「崑崙山祖勢高雄，三大行龍南北中。」[59] 承襲這個脈絡，蘇寧阿在〈山川影〉中亦稱：「黃河以北者，北幹龍也。黃河以南與長江夾送者，中幹龍也。長江以南者，南幹龍也。此三大幹入中國之說，其來舊矣。」[60] 由此可見，《萬里回疆圖》所採用的天下地理觀框架，一定程度上承襲自宋明以降的幹龍說；然而詳考該圖，則可發現其背後所體現的清代輿地學在地理資訊乃至於知識體系等層面，較諸前代又有進一步的發展。

---

57 徐善繼、徐善述，《重刊人子須知資孝地理心學統宗八卷》（收入《故宮珍本叢刊》第 411 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頁 27；王圻，《三才圖會》（清雍正乾隆間黃晟槐蔭草堂後印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卷一六，頁 56-60。

58 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 27-32, 2214。

59 劉基，《堪輿漫興》卷六六九，葉 59。

60 蘇寧阿，〈山川影〉，《萬里回疆圖》。

圖一：《中國三大幹圖》

（收入王圻，《三才圖會》）

清代堪輿學在發展為天下地理學的同時，一定程度上仍保留了風水數術的意味，故《四庫全書總目》云：「相宅相墓，自稱堪輿家。」[61] 然而在與理學互動的過程中，部分堪輿學者的知識結構在根本上產生了變化，由原本追求強烈神秘色彩的方術奇技，轉向側重思辨求索的格致之學，而蘇寧阿便是一個典型的案例。根據蘇寧阿文集中所收錄之多年堪輿學研究心得，可知其曾編纂一本題為《俯察備覽》的堪輿手冊。在該書序言中，蘇寧阿強調堪輿與理學之間的融通無礙：

[61] 永瑢等編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卷一九〇，頁 2249。

> 地理之學，貴摘其要者。要者何？陰陽二字而已。朱子曰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堪輿之學，大端有十：一步龍，二審穴，三撥沙，四收水，五立向，六選擇，七讀書，八覆舊，九證誤，十參悟。此十者，本儒者致知之學，非術家之末枝。[62]

這段文字體現出蘇寧阿主張道教堪輿之學並非是一種形而下的方術，而是一種用以解釋宇宙形成的知識體系，本質上與儒家的格物致知之學以及朱熹的理氣論可以兼容。蘇寧阿這種調和道教與儒家二者地理學思想的傾向，與宋元明以降理學家所建構的龍脈論息息相關。在這個脈絡下，《萬里回疆圖》所根據的龍脈論，實際上已經超越單純「相宅相墓」的方術，而是進一步形成一種探究天下地理的知識系統。這種雜糅堪輿學以及理學傳統的宏觀地理學說，亦隨著十八世紀清朝在中央歐亞的版圖擴張而發生變化，尤其體現在盛清西域地理學的興起。

值得注意的是，蘇寧阿在承襲龍脈論傳統的同時，又對前代堪輿學說有所發覆。蘇寧阿之所以敢於糾正前人的觀點，與清代中國疆域的擴張有直接關係。宋明的堪輿學者對中國邊疆的山川形勢雖偶有著墨，卻往往囿於見聞而語焉不詳。如朱熹雖曾提及「女真起處有鴨綠江」，並將其與黃河以及長江並列為天下三大河流，然而卻混淆了松花江與鴨綠江的位置；[63] 至於明代堪輿學者甚至往往誤將鴨綠江視為一條短淺的小河，這也反映當時對東北亞地理的模糊認知。[64]

相較之下，作為清代蒙古旗人的蘇寧阿在繪製《萬里回疆圖》時，得以相對準確地描述鴨綠江以及嵩噶里江（滿文 Sunggari ula，即松花江）等滿洲山川地理，並將長白山與發源於新疆伊犁的北大幹龍聯結討論，如其〈山川影〉曰：「北大幹龍之脉穿度戈壁而東五百餘里，至牛首山又起頂，結寧夏沿北套邊度晉，由燕雲入木蘭……東行至渤海約二萬餘里，通長白山。」[65] 蘇寧阿在以其滿洲地理知識豐富堪輿學內容的同時，亦根據《畿輔通志》「泰山實發源於長白」的觀點，闡發清朝皇權主導下的泰山龍脈論。[66] 清代流行的泰山龍脈論，亦即將作為滿洲祖源的長白山視為泰山龍脈發源的特殊觀點，可以追溯自康熙帝〈泰山山脈自長白山來〉所云：「朕細考形勢，深究地絡，遣人航海測量，知泰山實發

[62] 蘇寧阿，〈俯察備覽序〉，氏著，《恒一堂文稿》，頁 190-191。
[63] 黎靖德，《朱子語類》，頁 2037, 2214, 3192。
[64] 段志強，〈經學、政治與堪輿〉，頁 117。
[65] 蘇寧阿，〈山川影〉，《萬里回疆圖》。
[66] 蘇寧阿，〈山川影〉，《萬里回疆圖》；唐執玉等纂，《畿輔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04 冊），卷一七，葉 2。

龍於長白山也。」[67] 出身滿人的康熙帝特意將作為中原王朝正統性的泰山溯源至關外的長白山，從而塑造合理化清朝皇權的泰山龍脈論，而這個觀點也曾直接影響了十八世紀以降士人的地理觀念。[68] 如康熙四十七年 (1708) 在與大學士李光地等人的談話中，康熙帝本人亦曾謂：「凡山東泰岱諸山來脈，俱從長白山來，來龍甚遠，不知里數。」[69] 在泰山龍脈論的主導下，蘇寧阿《萬里回疆圖》在以清代關外地理知識補充宋明三大幹龍說的同時，亦受到清廷皇權意識形態的驅動。

在泰山龍脈論之外，隨著十八世紀清朝在西藏以及新疆的經略，蘇寧阿更加清晰地認識到唐宋前人對三大幹龍的理解，已無法完全解釋當時的天下地理局勢。蘇寧阿曾直言：「唐人言地理者，只云山脉發派崑崙，艮震巽三大幹入中國；黃河發源於星宿海，大畧而已，以其未曾至西陲遠域也，故不知星宿海以西，尚有來源。」[70] 又其曾賦詩：「西疆二萬新開土，唐宋遊人膽亦寒。多怪只因少所見，自然登泰小群巒。」[71] 蘇寧阿之所以勇於指出唐宋時人對於星宿海以西認識之不足，不僅因其曾親自在新疆以及緬甸進行實地考察，亦立基於清廷於康熙四十三年 (1704) 以及乾隆四十七年 (1782) 對河源的探勘成果。也正因為唐宋以降學者的視野多半侷限於中國內地而相對缺乏邊疆的實地經驗，蘇寧阿決定根據其在新疆的踏查成果以及考據學方法詳細繪製《萬里回疆圖》，同時參考《河源紀略》等清廷官修文獻，用以補訂前代學者之漏誤。從這個角度來說，《萬里回疆圖》可以視為宋明以降堪輿學傳統與清朝西域地理學的互動結晶。與此同時，蘇寧阿通過實地考察在新疆所汲取的地方知識，亦對《萬里回疆圖》的形成，乃至於其個人對堪輿龍脈論以及西域地理學的認知，發揮了極為關鍵的影響。下節重點將從《萬里回疆圖》中的新疆地方知識著手，進一步探討作者通過盛清天下觀對近世歐亞大陸的認知與詮釋。

---

[67] 愛新覺羅・玄燁，《幾暇格物編》（收入《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第 4 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99 冊〕），卷二七，葉 6-7。

[68] 蔣鐵生、呂繼祥，〈康熙〈泰山山脈自長白山來〉一文的歷史學解讀〉，《社會科學戰線》2008.6：140-146。

[69] 愛新覺羅・玄燁，《聖祖仁皇帝聖訓》（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411 冊），卷五，葉 20。

[70] 蘇寧阿，〈山川影〉，《萬里回疆圖》。

[71] 蘇寧阿，〈山居野吟歌〉，氏著，《山居野吟》，頁 249。

五・西域天方知識、盛清天下觀與近世歐亞大陸

除上述宋明堪輿學、泰山龍脈論以及清代西域地理學的影響外，來自其於新疆田野所獲之地方知識，尤其是源自中亞以及西亞的伊斯蘭世界地理觀，在《萬里回疆圖》的知識體系中扮演著十分關鍵的角色。關於他所掌握的新疆地方知識，蘇寧阿在該圖序文中曾詳述其來歷：

> 寧於乾隆二十九〔年〕，歲次甲申，從軍西域回疆喀什噶爾舊名哈什哈爾，去嘉峪関七千餘里，因先父奉使霍漢在喀什噶爾之西二千餘里外旋喀，寧迎於邊界西四百餘里，皆荒山無人之境；並閑常細諮訪喀什噶爾、葉爾奇木舊名葉爾羌，在喀城西南一千餘里等城之阿渾回部傳經法師以及遠遊之人聞說。[72]

這段文字體現出蘇寧阿在乾隆二十九年 (1764) 前往新疆參軍之時，經常向喀什噶爾以及葉爾羌等地的阿訇（波斯文 āḵūnd，伊斯蘭教學者）以及商旅詢問西域地理形勢。不僅如此，蘇寧阿提及其父曾於乾隆二十九年「奉使霍漢」，蘇寧阿曾因此自喀什噶爾西行四百里，前往伊爾克什坦（柯爾克孜語 Erkechtam，位於今日新疆烏恰與吉爾吉斯斯坦奧什交界）一路迎接其父以及清朝使團東歸。此處所謂的「霍漢」，即浩罕汗國（波斯文 Ḵānāt-e ḵoqand），位於今日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以及吉爾吉斯斯坦交界之費爾干納盆地一帶。關於這個前往中亞的清朝使團，清代官修史書鮮有著墨。然據筆者考察以下滿漢文檔案史料，可知該使團領隊為蒙古正白旗人四十七，而此人正為蘇寧阿之父。

根據清代《履歷檔》，四十七原為蔭生出身，後歷任蒙古正白旗副參領、正白旗左司掌關防參領、刑部郎中、貴州遵義府知府以及大定府知府等職。[73] 其久歷西南，對於邊疆事務尤其熟稔，對此《內閣大庫檔》中一份乾隆二十二年 (1757) 的移會所抄雲貴總督恒文 (?-1757) 之奏摺稱許四十七「才具幹敏，辦事勇往，在黔年久，熟悉苗疆」。[74] 然在乾隆二十三年 (1758) 引見後，《履歷檔》中載其評價為「局面小，最好亦不過道員而已」，又稱「此先出息，然煞覺局面小，再陞恐不能承受」。[75] 乾隆帝對四十七的評價雖非甚佳，但因其久歷邊事，故在清朝征服新疆後仍獲派前往該地任職辦事。隨著乾隆二十四年 (1759) 平定大小和卓，清廷為管理南疆事務，初以海明（滿文 Haiming）為喀什噶爾辦

---

72 筆者判讀之史料闕字，加〔 〕補入，下同。蘇寧阿，〈山川影〉，《萬里回疆圖》。

73《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卷二，頁 89；卷一六，頁 346, 348-349。

74《內閣大庫檔》，檔案號 230834。

75《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卷二，頁 89。

事都統；復於乾隆二十八年 (1763) 令納世通（滿文 Nasiton，1706-1765）為喀什噶爾參贊大臣總理回疆事務。[76] 由於亟需處理邊務之疆臣，納世通請求朝廷將四十七帶往辦事，因此其遂於乾隆二十八年以辦事章京之名前赴喀什噶爾。[77] 在這個背景下，乾隆二十九年 (1764) 清廷遣四十七秘密率團出使浩罕。根據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滿文軍機處錄副奏摺，可知當時清朝方面懷疑大小和卓舊部、時任喀什噶爾伊什罕伯克（突厥文 ishīk-āghā bek）的阿布都喇伊木（滿文 Abdurim ＜突厥文 Abdur-rahīm）與浩罕秘密勾結，因此派遣四十七率使團西行浩罕以暗中調查其中真相。四十七在出使浩罕的過程中，曾蒐集大量關於中亞各地的情報，而蘇寧阿西行中亞迎接其父四十七所率清朝使團東返的特殊經驗，便成為《萬里回疆圖》關鍵的地理資訊來源之一。[78]

詳考《萬里回疆圖》的內容，可以發現蘇寧阿不僅對於新疆各地有深入的掌握，亦對當時中亞乃至於西亞各國的局勢有一定的認識。除四十七率領前往浩罕之秘密使團外，自新疆當地前往麥加朝覲的哈只（阿拉伯文 ḥāj，朝覲者），亦是蘇寧阿對中亞以及西亞的關鍵資訊來源，對此其在〈山川影〉中曾謂：

> 回經云：西方大極之山名默克，環以弱水，不能渡越，是以高廣莫能測焉。自葉爾奇木至默克，尚有數萬里，大阿渾回部傳經法師有持懕往朝默克者，沿途皆供給衣食腳力，至弱水邊遙望山在蒼滋有無間。其近岸居人皆習經典之大法師，因聽講就教焉。旋歸時則更衣五彩袖□□□□纏頭帕帽，沿途諸部落皆供奉留住聽講焉。其未朝過默克之阿渾，只帶白布纏頭帽。[79]

---

[76]《清高宗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六一五，頁 922；卷六二八，頁 3；《國史大臣列傳》（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文獻編號 701005718），正編，卷一四九。

[77]《內閣大庫檔》，檔案號 179465。

[78] 四十七出使浩罕之原委，與當時清廷對新疆以及中亞政策有直接干係，事涉機密，故《清實錄》等官修史籍未盡其詳，然近年新出滿文檔案中有豐富紀錄，相關滿、漢文史料參：《清高宗實錄》卷七〇七，頁 897-898；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代新疆滿文檔案彙編》（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第 62 冊，頁 163；第 65 冊，頁 363；第 67 冊，頁 70；第 68 冊，頁 138；第 70 冊，頁 155, 243；第 71 冊，頁 75, 126, 221, 227；第 75 冊，頁 145；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滿文寄信檔譯編》（長沙：嶽麓書社，2011），第 5 冊，頁 212-217, 235-238。又關於阿布都喇伊木事跡，見：佐口透，〈カシュガル＝ホージャ家の後裔〉，《東洋學報》42.4 (1960)：373-411；惠男，〈薩木薩克早年經歷考：清朝在喀什噶爾與中亞帕米爾以西的政治困境，1759-1784〉，《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09 (2020)：1-43。

[79] 本文引文□為闕一字，□□為闕二字，依此類推。至於字跡模糊尚可辨讀者，則於本字外加方框，如「某」作某。下同。蘇寧阿，〈山川影〉，《萬里回疆圖》。

根據以上線索，可知蘇寧阿當時曾從新疆地方阿訇的口中，得知關於「默克」（阿拉伯文 Makkah），即伊斯蘭教聖城麥加的資訊。而他所謂的「西方大極之山」，應即麥加近郊的光明山 (Jabal an-nūr)，也就是穆罕默德初獲天啟之地。至於蘇寧阿所謂無法橫渡的「弱水」，很可能指的就是波斯灣，這體現出當時許多來自新疆朝覲者實際上可能最終未能前往麥加，而是在抵達伊朗後便在當地的伊斯蘭學校求學。至於蘇寧阿提及這些曾留學波斯的阿訇在東歸後改穿五彩衣飾，應為當時流行中亞之伊斯蘭蘇菲派的一種宗教習慣。

從新疆阿訇口中所得到關於遠方麥加的新興資訊，更進一步地影響了《萬里回疆圖》對天下地理的描述，蘇寧阿在該圖序文中稱：

> 回部西域之山，皆來自默克，即番經梵語須彌山，儒書地經崑崙山也。其高圍里數之說，常出自仙經子書。然寧諮訪於喀、葉各城之阿渾，皆云弱水環繞隔絕，既無法涉渡，焉知其遠近高廣也。溫都斯坦在葉爾奇木西南二千餘里之山脉來自西方，是以回疆之山來自溫都斯坦，由□行艮伊犁山西北通察漢布呼圖大山千餘里度巴達克山在葉爾奇木西南千餘里，北結霍漢，折而東結伊犁。霍漢外，西有大江為界水，大江西岍即闢色勒地方。[80]

基於阿訇們的描述，蘇寧阿將伊斯蘭世界的麥加，與佛教宇宙中的須彌山以及儒家天下中的崑崙山進行勘同，這個論述使得三大幹龍說中作為天下山脈之祖的崑崙山，終被推到極西的麥加。換句話說，中原堪輿學與伊斯蘭地理學這兩種原本各自獨立的知識傳統在《萬里回疆圖》中產生了交流。

以上蘇寧阿關於麥加等地的紀錄，體現清朝在掌控新疆的過程中，滿蒙旗人亦逐步經由當地穆斯林建構其對於西域天方的認知。除《萬里回疆圖》之外，乾隆三十七年 (1772) 蘇爾德 (Suldei) 編纂的《新疆回部志》亦稱：「默克在喀什噶爾西北，一年餘程，地平衍處百餘里，城可數里大，名曰墨可石。內砌禮拜寺一院，其人日事誦經禮拜，別無他務……至今各回部阿渾、海蘭達爾，[81] 非由墨可石受戒來者，不為正派云。傳言其聖人飛昇處也。」[82] 可見以麥加為核心的天方地理資訊，在十八世紀後期已為清朝派駐新疆的地方官員所知悉。

---

[80] 蘇寧阿，〈山川影〉，《萬里回疆圖》。

[81] 按：此處所謂「海蘭達爾」，即波斯文 qalandar，指伊斯蘭教蘇菲派之「苦修者」。

[82] 蘇爾德，《新疆回部志》（清鈔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卷四，葉 37。

以上源自新疆穆斯林關於伊斯蘭世界的地理資訊，也為清朝當地滿蒙官員轉陳清廷中央，從而為滿洲皇帝所知悉，並被納入官方典籍當中。如乾隆二十四年(1759)〈御製平定回部勒銘葉爾羌碑文〉開頭便點出麥加作為伊斯蘭世界的核心：「粵稽回始肇自天方，又名默克，一曰天堂。」[83] 又《皇輿西域圖志》中亦有關於新疆穆斯林前往麥加以及麥地那 (Madīnah) 等伊斯蘭聖地朝覲的相關記載：「回部西有默克、默德納，為回回祖國。回人凡終身必親往禮拜一次，以答鴻庥。辦裝裹粮徃還，期以三年，惟富者能酬其願，貧無力者不能也。亦有附香火之資於富室，以偕往者。」[84] 上引〈御製平定回部勒銘葉爾羌碑文〉以及《皇輿西域圖志》中的文字，一方面吸收滿蒙旗人蒐集新疆當地穆斯林哈只之資訊，另一方面又承襲《大明一統志》等明代漢文文獻將麥加稱為「天堂」，將麥地那視為「回回祖國」的傳統表述。[85] 而清朝官方文獻中，這類結合新疆地方知識以及漢文傳世典籍所形成的新興天方知識，也被收錄在旗人學習滿漢翻譯的書籍中。例如道光二十五年 (1845) 穆齊賢 (Muchihiyan) 編纂之《繙譯試策法程》（滿文 *Ubaliyambuha simnehe bodon i durun kemun i bithe*），在討論西域天方輿地知識時，亦以滿漢兩種文字對譯稱：「默德那與天堂接壤，云是回回祖國。」[86] 由此可見，隨著十八世紀後期以降清朝對新疆的經略，旗人社群對於以麥加、麥地那為核心的伊斯蘭世界地理知識，也有所關注。

在以麥加為代表的阿拉伯半島之外，《萬里回疆圖》又提及巴達克山、浩罕等位於今日阿富汗以及烏茲別克斯坦一帶的中亞國家。而位處新疆西南方的印度也作為「溫都斯坦」（波斯文 Hindustan）被提及。此外，蘇寧阿又稱「霍漢外，西有大江為界水，大江西�octaal即闢色勒地方」，其中所謂的「闢色勒」即突厥語「波斯」 (Pérsiye) 之音訛，至於這條區隔波斯與突厥斯坦的界水則應為阿姆河。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萬里回疆圖》中所描述的印度與波斯，蘇寧阿的文集亦記錄他曾聽聞一個名叫「空古魯克」的國家，也正是清代漢、滿、蒙、藏等多語種

[83]《清高宗實錄》卷六〇〇，頁 722。

[84]《欽定皇輿西域圖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00 冊），卷三九，葉 15a。

[85] 方志遠等點校，《大明一統志》（北京：中華書局，2017），卷九〇，頁 4044-4055。關於明代以降文獻中的「回回祖國」表述，參：姚大力，〈「回回祖國」與回族認同的歷史變遷〉，《中國學術》2004.1：90-135。

[86] 滿文：“Me de na i ba, tiyan tang ni bade ujan acahabi, donjiha bade ere hoise da jokson i gurun inu sembi.” 穆齊賢，《繙譯試策法程》(*Ubaliyambuha simnehe bodon i durun kemun i bithe*)（清鈔本，Berlin: Staatsbibliothek zu Berlin），卷四，葉 61b。

文獻中所謂的「控噶爾」（滿文 Gungk'ar；蒙古文 Qunġar；藏文 Khung khur），亦即鄂圖曼土耳其。[87] 由此可見，蘇寧阿在新疆當地的軍旅經驗，使其得以從中亞穆斯林口中聽聞關於印度、波斯以及土耳其等地的資訊，進而將伊斯蘭世界納入中國的天下地理學。

除了位於西方的南亞與中東外，蘇寧阿對於中國南方、東方以及北方各地資訊亦曾廣泛求索，而這也具體體現在《萬里回疆圖》對於緬甸、朝鮮以及俄羅斯等歐亞大陸各地地理知識的記載。由於蘇寧阿曾親身參與乾隆三十四年 (1769) 清軍第四次征緬戰役，故其在〈山川影〉當中不僅詳述緬甸城池分布，並試圖從山川走向的角度整合回疆、西藏、雲貴以及緬甸間的相對地理關係，如其稱：「幹龍由後藏南去，度大小金川，由騰越州西大竜種野人寨之大山南，至緬甸猛密，折而向西南，盡於南海。」[88] 此處蘇寧阿明確勾稽喜馬拉雅山脈、橫斷山脈乃至於中南半島一路的山脈走勢，而他所謂南至緬甸孟密（Möng Mit，今緬北撣邦北部瑞麗江畔）的「野人寨之大山」，即位於今日中緬邊境的高黎貢山。

此外，蘇寧阿對於毗鄰滿洲的朝鮮，亦有相當程度的認識，如〈山川影〉稱：「長白山頂之天池，東洩而東流者，名圖門烏拉即萬江也，其萬江之南岸，則歷惠寧府、高亮城、防範城、忠誠府、通嘉城、永達城、文昌城、黃石堡城、勳榮城、慶遠府城。」[89] 以上蘇寧阿列舉圖門江南岸諸城，係屬朝鮮咸鏡道；然而通過比較上述引文以及十九世紀初由朝鮮方面繪製的《朝鮮圖》，可以發現蘇寧阿在抄錄這些朝鮮地名時多有音訛、別字，並傾向比附漢文雅名，如其所謂「惠寧府」，實為「會寧」（朝鮮語 Hoiryŏng）都護府；「忠誠府」當作「鍾城」(Chongsŏn) 都護府；「慶遠府城」則乃「慶源」(Kyŏngwŏn) 都護府；至於所謂「高亮城」，實作「高嶺」（Koryŏng，今朝鮮咸鏡北道會寧市高嶺鎮）。[90] 這類特殊語文現象，體現蘇寧阿應是通過口耳打聽的方式，汲取關於朝鮮之地理資訊。

---

[87] 蘇寧阿，〈山居野吟歌〉，氏著，《山居野吟》，頁 250。關於清代史料中的控噶爾，即鄂圖曼土耳其，參：小沼孝博，〈控噶爾國小考：18 至 19 世紀歐亞東部奧斯曼朝認識之一端〉，《民族史研究》8 (2008)：153-163；Mosca, "Empire and the Circulation of Frontier Intelligence," pp. 147-207。

[88] 蘇寧阿，〈山川影〉，《萬里回疆圖》。

[89] 蘇寧阿，〈山川影〉，《萬里回疆圖》。

[90] Chang Sang-hun and Yi Hyo-jong, eds., *Chosŏndo* (Seoul: Kungnip Chungang Pangmulgwan, 2007), pp. 15, 19. 其餘諸城在朝鮮史料中之用字，詳本文附錄注 219。

對於位於中國北方並鄰近新疆的俄羅斯，蘇寧阿同樣有所關注，並將之納入其天下地理學的視野中，對此〈山川影〉載：

> 另有大山行向艮方，入鄂羅斯地方，為北海沿邊之龍。其伊犁之北大山與伊犁之南大山，兩山之中有伊犁江、精河、呼嗎哪嘶河等水，會歸厄爾起思河，流入北海以界龍，為北大幹龍山名額臨海秘勒漢，番語山脊梁骨也之北界水。[91]

這段關於中國三大幹龍中北大幹龍的文字，不僅明確地提到了俄羅斯（鄂羅斯），更進一步將俄羅斯知識容納到中國堪輿學傳統中。《萬里回疆圖》在提及北大幹龍時，蘇寧阿以小字旁注「山名額臨海秘勒漢，番語山脊梁骨也」，並認為所謂的「額臨海秘勒漢」，亦即衛拉特語「山脊」（托忒文 uula-in xabirġan）之音訛，此處實指天山山脈北支的額林哈畢爾噶（Eriyen xabirġan，今稱依連哈比爾尕山）。[92] 由此可見，蘇寧阿不僅將麥加比定為眾山之祖的崑崙山，同時更把北大幹龍與毗鄰俄羅斯的天山山脈進行勘同。換句話說，中國堪輿學、伊斯蘭地理學甚至是衛拉特語地名等多元知識在《萬里回疆圖》中產生了交流，而這個特殊的歷史現象則起源於蘇寧阿對新疆以及中亞穆斯林地方知識的再詮釋。

要言之，《萬里回疆圖》所體現的新疆地方知識不僅與中國堪輿學發生深刻互動，同時亦將清代天下地理學的範圍擴張至遙遠的中亞與西亞，進而將麥加以及天山山脈詮釋為龍脈論中的崑崙山與北大幹龍。由此可見，《萬里回疆圖》在容受並詮釋多元地理資訊的過程中，深刻體現出歐亞大陸各地間不同知識體系的交融。而在承載不同思想傳統的同時，《萬里回疆圖》藉由對地理資訊的視覺化處理，記載了十八世紀後期新疆地方社會的自然地貌以及人文地景，這些圖像史料對研究清代地圖學史以及歷史地理等相關議題，尤其對於探索十八世紀後期新疆基礎建設之情況，有獨特的歷史意義。以下將從《萬里回疆圖》的圖像之部切入，並將其與現存其他清代地圖手稿及相關文字史料進行比較，從而進一步討論清朝征服準噶爾後新疆地景與基層社會之變化。

[91] 蘇寧阿，〈山川影〉，《萬里回疆圖》。

[92] 蘇寧阿疑將此處漢字「額林」對音之衛拉特語 Eriyen（花斑紋的），理解為 uula-in（山的）。二詞在衛拉特語中音義相距甚遠，恐係漢字使其產生創造性之誤解。

六．十八世紀後期清朝的新疆地景認識與基礎建設

作為一幅在實地考察基礎上繪製而成的傳統輿圖，《萬里回疆圖》描繪十八世紀後期新疆的自然地貌以及人文地景，尤其重點記錄了當地的行政區劃、水利設施、道路交通、軍事防禦以及社會經濟等相關基礎建設。作為十八世紀後期新疆手繪地圖的代表，《萬里回疆圖》反映出清朝征服準噶爾汗國以後對新疆地方局勢的掌握，其中的地理資訊具有特殊的時空脈絡，值得與前後時段的清代西域地圖手繪本作進一步比較分析，以此動態地考察清朝在軍事擴張以及國家建構的過程中，對新疆地理資訊之蒐集以及當地基礎建設之發展。

如前文回顧，目前清代新疆地圖手稿，因文物保管條件等因素，極為罕見。故先行研究在討論清代新疆地圖學史時，往往利用官修刻本地圖，而對於地圖繪寫本討論相對較少。因此關於清代新疆地圖測繪等相關議題，在史料基礎及研究方法上，仍有相當的推進空間，尤其是古地圖背後所體現地理知識動態的建構過程，乃至於其發源自基層社會的地方性知識，仍有待進一步深入討論。有鑒於此，本文以下將形成於十八世紀後期的《萬里回疆圖》，以基礎建設相關議題切入，進而與十八世紀初期的《伊犁圖》以及十九世紀前期的《西域輿圖》進行比較，藉此分析清代新疆輿圖所承載之地理知識與地方基礎建設相關之歷史資訊。

在與《萬里回疆圖》進行比較研究以前，首先簡單介紹《伊犁圖》以及《西域輿圖》這兩份相關史料。《伊犁圖》，彩繪本，捲軸裝。長 1,050 公分，寬 28.15 公分。方位上北下南，起東迄西，繪製地理範圍東起寧夏平羅關，經居延海、哈密、吐魯番、烏什向西，迄喀什噶爾、葉爾羌、和闐各地。[93] 此外，又附有青海一帶地圖以及相關圖說。據筆者考證，該圖形成年代在康熙四十二年 (1703) 至四十四年 (1705) 之間，當時天山南北麓仍屬準噶爾策妄阿拉布坦之勢力範圍，故該圖應為清朝方面通過派遣間諜以及蒐集情報所繪製而成，其內容體現十七與十八世紀之交準噶爾統治時期天山南北麓的地理資訊。至於另一份《西域輿圖》，為彩繪本，經摺裝，繪有新疆總圖 1 幅，天山南北各地分幅地圖 16 幅，合計共 17 幅。每幅地圖長 38.7 公分，寬 23.3 公分，方位上南下北，圖後並附有文字圖說。[94] 繪製年代約在嘉慶十六年 (1811) 至二十五年 (1820) 間，故反映十九世紀初期清朝在新疆各地之基礎建設情況。

---

[93]《伊犁圖》（清紙本設色圖，京都：京都大學圖書館藏）。

[94]《西域輿圖》（清紙本設色圖，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京都：京都大學圖書館藏）。

考察《萬里回疆圖》、《伊犁圖》以及《西域輿圖》這三幅清代繪製的新疆古地圖，可以發現其形制有相似之處，不僅均以設色山水形象畫法繪製，並皆附有長達數千字之文字圖說。然對這三幅新疆古地圖進行仔細之比較研究，可以發現其所承載之地理資訊各自體現不同的時空脈絡，而十八世紀後期的《萬里回疆圖》在年代上正介於十八世紀初期的《伊犁圖》以及十九世紀前期的《西域輿圖》之間，亦正是乾隆朝征服準噶爾並將新疆納入統治之初。換句話說，在清代西域地圖學史的脈絡下，《萬里回疆圖》對於理解清朝關於新疆社會以及地理知識之變化，具有承上啟下之歷史意義。藉由比較分析《伊犁圖》、《萬里回疆圖》乃至於《西域輿圖》的地理資訊，可以進一步探討清朝方面從十八世紀初期至十九世紀前期間，如何逐步動態累積並建構其西域地理知識，最終實現其在新疆的基礎建設。

考察《伊犁圖》，可以發現十八世紀初期清朝在尚未真正控制天山南北麓時，業已通過派遣間諜繪製地圖等方式，來掌握地名、地形等基礎地理資訊。礙於準噶爾勢力，《伊犁圖》的作者在繪圖過程中，大量參考了地方口傳資訊，故許多地名的漢字音寫未經規範化。如其中阿克蘇（突厥語 Aqsu）被訛寫為「扎克蘇」，庫車（突厥語 Kuchar）被標示為「孤差」等，均反映《伊犁圖》製圖者及其線人所掌握的原始地名知識，與清廷後來藉由史地考證標準化的新疆地名間，存在一定差異。至於蘇寧阿在乾隆二十九年 (1764) 前後繪製《萬里回疆圖》底稿時，因清朝已征服準噶爾以及大小和卓勢力，朝廷官方當時已逐步開始統一新疆地名之漢文用字。故蘇寧阿在標注烏什、庫車等大型城市時，仍可參考清廷的官方用字規範。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當蘇寧阿隨清軍向下進入到村鎮一級的地方時，則開始自行音寫基層地名，從而產生音訛。如其經過闢展（今吐魯番市鄯善縣）西方八十里時，曾以「納木心」標示該地，並註記有「回戶四五十家」，然而這個地名罕見於清朝官方文獻。實際上該地名突厥語作 Lemjin，亦即後來《西域輿圖》中的「連木沁」，而十八世紀末以降《清朝文獻通考》等官書中也通稱「連木沁」（今吐魯番市鄯善縣連木沁鎮）。[95] 換句話說，蘇寧阿之所以將突厥語地名中的 le 訛寫為「納」，即是混淆了漢語鼻音 n 與突厥語邊音 l，這類邊鼻音不分的語言錯誤，體現當時清廷對新疆基層地名仍未徹底規範。通過語文學考察，可以發現

[95]《清朝文獻通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卷一九一，頁 6541。

相對於清軍已經控制的主要城市，蘇寧阿對於「連木沁」等新疆基層地名的對音掌握並不準確，由此可以推測《萬里回疆圖》中關於新疆基層地名的記載，主要並非來自朝廷中央自上而下的官方知識，而是依據當地民眾所提供的口頭情報。而《萬里回疆圖》在諸如烏什、庫車等大型城市以及聚落等地名用字上一方面與《清實錄》等官修史書的規範用字大體吻合，另一方面卻在村鎮等基層地名上出現各種音訛，也正體現蘇寧阿在繪製《萬里回疆圖》草稿的十八世紀六〇至七〇年代，清廷甫將新疆正式納入統治，對於城市以及村鎮等不同層級行政區劃的地理資訊，存在掌握程度不一的現象。要言之，《萬里回疆圖》中的行政區劃地名，恰巧位處從《伊犁圖》到《西域輿圖》的過渡階段，即其中城市與村鎮的地名用字，分別出自國家規範與民間口語等不同來源。

在行政區劃外，比較《萬里回疆圖》等清代地圖則又能體現清朝在不同時期對新疆軍事防禦工程、道路交通網絡以及水利基礎設施的掌握差異。在軍事防禦以及道路交通等基礎工事方面，蘇寧阿根據其經歷，在《萬里回疆圖》中重點畫出天山南麓主要城市的位置以及城牆外觀，並在城址旁以道里距離標示各城間的相對位置。不僅如此，蘇寧阿在《萬里回疆圖》中甚至對個別重要城市的防禦工事有所點評，如其在庫車城旁以文字注記：「城藉支龍建立，墻只一半，餘皆支土壘垻。聚水為東面之屏籓，西北南三面可攻。」[96] 蘇寧阿之所以在經過庫車城時留意該地防禦工事，很可能與先前乾隆二十三年 (1758) 清軍圍堵庫車城並試圖捉捕小和卓一役有關。[97]

與《伊犁圖》相比，《萬里回疆圖》對新疆的軍事以及交通基礎建設，有較為詳細的描繪。因囿於所探情報，《伊犁圖》僅能粗略勾勒天山南北大型城池的分布，並以行旅日程天數大概標記各城間的相對位置。《萬里回疆圖》則在清軍進駐新疆的前提下，得以描繪各地城池、堡墩、臺站以及卡倫等基礎防禦設施，並約略計算各地相距里程。在《萬里回疆圖》所記之基礎防禦工事中，卡倫頗能體現清朝在新疆之軍事統治特性。清代漢文史料所謂的卡倫，即滿文 karun 之音譯，係源自蒙古文 qaraġul，原意為斥候、哨兵，在康熙、雍正年間逐步演化為一特殊的軍事邊防單位，其職能多元，包含巡邏崗哨、維繫治安、文書傳遞、邊境

[96] 蘇寧阿，《萬里回疆圖》。

[97] 關於庫車城之形制以及清軍圍堵該城之經過，見《欽定皇輿西域圖志》卷一五。

仲裁甚至邊防稅收。[98] 而清代的卡倫，也成為後世漢語中哨卡、關卡的詞源。清朝在十八世紀中葉征服準噶爾以及大小和卓等天山南北勢力後，便有計畫地在新疆各地設置卡倫等軍事基礎建設。對此《皇輿西域圖志》載：「蕩平西域，全隸版圖，地周二萬餘里，為之遍置軍臺。而於其巖疆要隘，設卡倫，以資捍衛。」[99] 可見清朝在征服新疆以後在各地廣設軍臺，而在地勢險要處則又更設置卡倫，卡倫由是在職能上與一般軍臺有所區分。

對比《萬里回疆圖》與《西域輿圖》，可發現清朝卡倫從十八世紀後期至十九世紀前期在新疆的制度發展與職能擴張。如在喀什噶爾東部《萬里回疆圖》標有「阿爾土使庄子」，此處即今日新疆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阿圖什市（柯爾克孜語 Artush）一帶。在阿爾土使往東，蘇寧阿則標出一處「巴爾昌小卡子」，即位於今日阿圖什市哈拉峻鄉轄下巴羌境內。[100] 成書於乾隆三十七年 (1772) 的《新疆回部志》亦記有此地，稱：「巴爾昌，設小卡倫，瞭望薩林都、索渾兩處，路通布魯特」，[101] 可見當時巴爾昌仍為一小卡倫，其主要功能為軍事瞭望，並負責看守該地通往布魯特（今吉爾吉斯斯坦）的聯繫道路。至於到了十九世紀初的《西域輿圖》，則稱此處為「巴爾昌卡倫」，由此可見清軍在該地的軍事基礎建設有所演進。關於所謂「小卡子」與「卡倫」的差異，徐淞《新疆北路賦》曰：「其置邊衛也，大者卡倫，小布克申。（原注：）凡官兵巡守設汛之地，曰卡倫。兩卡倫間所設瞭望之處，曰布克申。」[102] 又《新疆識略》稱：「兩卡倫遞籌巡查之路，名曰開齊。小卡倫分置瞭望之處，名曰布克申。而統名之，則曰卡倫。」[103] 根據上述史料，可知當時清朝在新疆的軍事網絡，係以兩個大卡倫為基礎形成名為開齊（滿文 kaici）的線路，即會哨線；而其間又安插具有瞭望功能的小卡倫，也就是滿文所謂的布克申（滿文 buksin），意即暗哨。如

98 寶音朝克圖，《清代北部邊疆卡倫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頁 11-31。

99《欽定皇輿西域圖志》卷三一，葉 19b。

100 潘志平，〈布魯特諸部研究〉，《中亞學刊》第 5 輯（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頁 165-215。

101 蘇爾德，《新疆回部志》卷四，葉 12。

102 徐淞，《新疆賦》（收入氏著，《西域水道記（外二種）》，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551。

103 松筠修，《欽定新疆識略》（收入《中國邊疆叢書》第 1 輯第 11 冊，臺北：文海出版社，1965），下冊，卷一一，頁 1058。

《征緬紀聞》描述乾隆三十四年 (1769) 清軍進兵緬甸情況時，亦記述布克申的暗哨職能：「及暮，令官兵距大營二三里擇要設伏，國語謂之布克申。」[104] 大體來說，由開齊所連結的卡倫駐軍數量較大，編制相對固定，主要負責巡守，在一定程度上接近明哨的性質；至於安插在各卡倫間的布克申則規模較小，編制較為靈活，主要作為承擔瞭望任務的暗哨。[105] 通過比較《萬里回疆圖》以及《西域輿圖》中巴爾昌地區的沿革，可以發現該地的駐軍層級從布克申擴張為卡倫，而這也體現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清朝在當地的軍事基礎建設有所發展。

關於軍事基礎建設，《萬里回疆圖》中的地理資訊尚有一點值得注意，即廢棄的軍事防禦工事。與《伊犁圖》以及《西域輿圖》相比，《萬里回疆圖》描繪了大量的廢棄城址、堡壘、臺墩以及渠道，這也體現出清軍在征服新疆後，曾大規模地調查新疆之城池遺跡。如路經哈爾沙爾城（清代文獻常作喀喇沙爾，突厥文 Qarashahr，今焉耆回族自治縣）西南面時，蘇寧阿曾發現一座寬闊的廢棄城池，周遭並有水渠，此即後世考古學者視為漢唐時期焉耆首府的博格達沁故城遺址（位今焉耆回族自治縣四十里城子鎮）。有趣的是，《萬里回疆圖》在該城遺址處標注「土中有開元錢」，[106] 這也體現出清朝在新疆的調查所發現的出土文物，曾引起新疆地方官員的關注。在蘇寧阿之外，乾隆皇帝本人也曾關注新疆出土的古代錢幣。如清軍在新疆屢次發現唐宋銅錢後上繳朝廷，乾隆帝也因此命儒臣進行考證。對於新疆出土之唐宋錢幣，乾隆帝亦提出他的見解：「排次回部古錢時，有開元、景德諸錢，彼時未能臣服其地，自屬中國攜往者。」[107] 由此可見，蘇寧阿等基層官員在新疆各地遺址所發現的出土文物，曾對乾隆帝以及清廷儒臣的西域歷史認知產生了一定程度的影響。

在水利設施與農業建設方面，《萬里回疆圖》亦多有著墨。根據《伊犁圖》所標記的天山南北各地河川以及泉水等地理資訊，清朝在十八世紀初期已經因考慮行軍需求，而派員秘密調查該地水文。到了十八世紀後期清軍進入新疆後，更

---

[104] 王昶，《征緬紀聞》（收入《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正編》第 10 帙第 4 冊，上海：著易堂，1891），葉 245。

[105] 陳劍平，〈清代新疆卡倫的體系構成〉，《北方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4：11-15。

[106] 蘇寧阿，《萬里回疆圖》。

[107] 愛新覺羅・弘曆，《御製詩文十全集》（收入《武英殿聚珍版書》第 588-595 冊，清光緒二十五年廣雅書局刊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卷一六，頁 12-13；卷一七，頁 5-6。

是在各地推行屯田制度，並且對當地的地景以及環境產生影響。[108] 而蘇寧阿也記錄了清朝在新疆施行屯田以及環境變遷的相關情況。如《萬里回疆圖》標記烏什他拉（今和碩縣烏什塔拉回族鄉）的兩條水渠間，有「屯田守備住處，地墾二十餘頃，兵九十人」。[109] 關於該地屯田利用雪水灌溉的水利設施，蘇寧阿記述道：「雨少雪多，雪水自北溝出，遂開渠引以溉田，不藉雨水而田禾自熟，成回部膏田。」[110] 而清軍的屯田活動，亦對博斯騰湖一帶的濕地環境造成影響，對此蘇寧阿記述：「七月間麥熟，大野豬率群豬三、五十而來，踐踏盜食，人莫能禁，且不懼鎗砲之聲。」[111] 可見該地清軍的屯田行為，曾引來居住在博斯騰湖蘆葦林地的野豬前去搶食莊稼，從而產生人類社會與野生動物間的衝突。

十八世紀後期清朝駐軍對新疆地景的影響，除屯田以及水渠等水利農業基礎建設，亦包含公館、窩鋪、商店以及寺廟等社會經濟組織，對此《萬里回疆圖》亦有所記載。清代公館之主要職能，在於接待執行任務之往來官差。如乾隆十五年 (1750) 清廷派遣欽差前往雲南閱兵，便曾「令沿途各屬動用庫項，修理道路，建蓋公館」。[112] 除了支用官費興建，清軍有時亦徵用寺院、民店作為臨時公館。[113] 隨著十八世紀中葉對準噶爾的征服，清朝在當地修建軍事防禦以及道路交通等基礎工程時，也開始在沿途建設公館作為旅行官兵的住所。在這個脈絡下，《萬里回疆圖》所描繪的公館，亦沿著新疆交通幹道分布。除了作為清軍的住宿場所以及驛遞節點，《萬里回疆圖》中公館的分布，同時也體現十八世紀後期新疆物資運輸補給的情況，如蘇寧阿記錄哈密下轄大泉（今大泉灣鄉）南部的城泉有一公館，並以旁注強調該公館「有黃酒」，這也反映中原物產隨著清軍的運補路線進入新疆。

清軍在新疆修築城池、屯田開墾以及建造公館的同時，也帶動了天山南北各地民間社會經濟組織的發展。如清廷在乾隆三十七年 (1772) 於烏魯木齊修築鞏寧城作為八旗駐防據點後，該地的社會經濟有顯著發展，《異域瑣談》稱該城：「自歸化城北套之貿易人等雲集，其哈密之赴伊犁，及南路回疆之往北套者，亦

[108] 劉翠溶、范毅軍，〈試以環境史角度檢討清代新疆的屯田〉，陳永發主編，《明清帝國及其近現代轉型》（臺北：允晨文化，2011），頁 203-265。
[109] 蘇寧阿，《萬里回疆圖》。
[110] 蘇寧阿，《萬里回疆圖》。
[111] 蘇寧阿，《萬里回疆圖》。
[112]《清高宗實錄》卷三七五，頁 1146。
[113]《清高宗實錄》卷八二八，頁 41。

皆經由其地，以故店舖鱗次，內外各貨，無不豊備，市街寬厰，人民輻輳，茶房酒店，優伶歌童，工藝技巧之人，無不可以覓食。」[114] 至於葉爾羌等南疆城池，《異域瑣談》亦謂：「內地商賈，山陝江浙之人，不辭險遠，各攜貨貲，搆覓寶玉，以至其故店鋪館舍，輝耀整齊。」[115] 可見隨著清軍駐防在新疆的擴張，由內地民人所經營的商鋪與商店也勃興發展。由於市場經濟的需求，各地駐防清軍也開始出借城內土地給商民開設店鋪，收取租金以補貼軍餉。[116]

中原民人經營之商鋪等經濟組織的興起，體現新疆移民社會的發展。與此同時，壇廟等民間信仰組織也出現在《萬里回疆圖》中，如在喀喇沙爾以及喀什噶爾一帶，蘇寧阿畫出關帝廟與龍王廟等源自中原民間信仰傳統的壇廟，這也體現出清朝駐軍以及隨軍民人的移住，中原民間信仰也隨之傳入新疆。這類中原壇廟不僅成為凝聚新疆移民社會的精神據點，也因祭祀活動及酬神賽戲而成為移民社會的經濟與娛樂中心。[117]

七・結論

作為一份形成於十八世紀後期的新疆輿圖手稿，《萬里回疆圖》對於考察清代地圖學史以及地理知識所具有之重要意義，主要可歸結為以下三點。第一，《萬里回疆圖》的繪製，反映十八世紀後期清朝的版圖擴張一方面促成了西域地理知識的發展，另一方面亦與基層官員的經世思想產生互動。藉由在新疆的實地考察，蘇寧阿在繼承傳統堪輿學的同時，亦試圖以清朝新興的地理知識對宋明以降流行的龍脈論提出修正。不僅如此，《萬里回疆圖》所記錄的地理資訊，亦體現蘇寧阿的經世思想。作為一名親歷烏什回變的前線官兵，蘇寧阿在繪製輿圖的同時，就清朝在新疆的行政區劃及基礎建設之擘畫，提出了他對清廷在新疆推行

114 椿園七十一，《異域瑣談》（清鈔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卷二。

115 椿園七十一，《異域瑣談》卷二。

116 和寧，《回疆通志》（北京：中華書局，2018），卷七，頁 128；卷八，頁 178；《新疆孚化志略》（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西部地方新疆省第 19 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據咸豐七年鈔本影印），銀錢 1。

117 賈建飛，〈清代新疆的內地壇廟：人口流動、政府政策與文化認同〉，《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12.2：90-103；王鵬輝，〈近世哈密的佛寺道觀考實 (1727-1931)〉，《西域文史》2014.9：315-332。

基礎建設之觀察與願景。如其主張清廷應考慮將烏什、和闐等新疆的農業城市納入內地的府州縣體制，並推行改土歸流及軍民屯田等政策，以強化清朝在後準噶爾時代對新疆的地方治理。對此蘇寧阿總結出一系列具體的配套措施，諸如「更設府治，編籍戶口，改為內地，遷徙窮民，安置軍流，給以牛力、籽種，借以農具口粮，其沿途各城則預屯積粮，以備支給裹帶」。[118] 由此可見《萬里回疆圖》的繪製與蘇寧阿對新疆基礎建設的展望息息相關。而蘇寧阿對清廷在新疆推行屯田制的展望，也促成《萬里回疆圖》對烏什塔拉屯田以及溝渠工事的重點紀錄。

第二，通過與《伊犁圖》和《西域輿圖》等形成於十八世紀初期、十九世紀前期的清代西域輿圖進行比較研究，《萬里回疆圖》反映出十八世紀後期清朝在甫征服準噶爾汗國的特定時空脈絡下，於經略新疆初期對地方社會的掌握，及在各地所推行軍事防禦、道路交通、農田水利以及社會經濟等基礎建設的情況。相較於十八世紀初期清廷多半依靠間諜間接蒐集天山南北的地理情報，十八世紀後期清朝在征服準噶爾後得以通過地方官員直接調查新疆的地理資訊。然而通過語文學方法的考察，可以發現《萬里回疆圖》對於新疆村鎮地名的掌握尚未受到規範甚至存在音訛，這也反映當時清朝在征服新疆初期對於當地基層地名以及行政區劃掌握之限度。此外，隨著十八世紀後期清軍駐防體系在新疆各地的推進，《萬里回疆圖》體現當時新疆交通道路沿線一帶公館、商鋪與壇廟等社會經濟組織的設置，反映內地移民在新疆當地的社會經濟活動。

最後，通過考察《萬里回疆圖》，本文指出清代西域地圖繪製，尤其是以該圖為代表的私繪地圖背後，蘊含來自宋明傳統、清朝官方以及歐亞各地等不同來源之地理資訊。以蘇寧阿為例，他繪製的新疆輿圖雖受到宋明以降堪輿學傳統的影響，卻又同時加入了清朝皇權所主導的泰山龍脈論。與此同時，他又接受了新疆當地耆老的口傳資訊以及來自中亞的伊斯蘭世界觀。由此可見，《萬里回疆圖》所呈現的知識傳統，實來自中國堪輿學、伊斯蘭地理學乃至於新疆地方知識等多元來源，而這些知識傳統也共同形塑了蘇寧阿所代表之清朝基層官員的天下地理觀。

（本文於民國一一一年一月二十五日收稿；同年六月二十三日通過刊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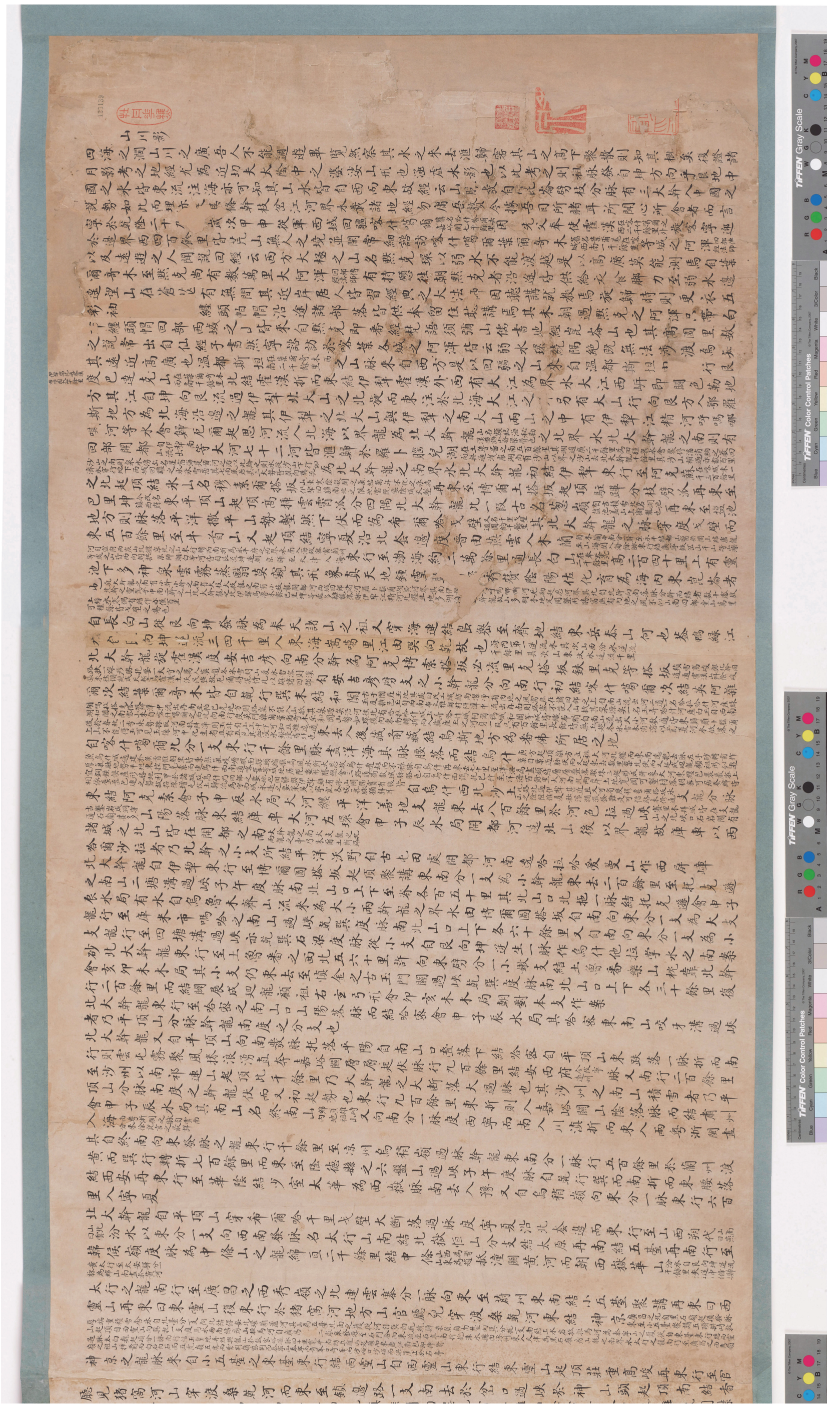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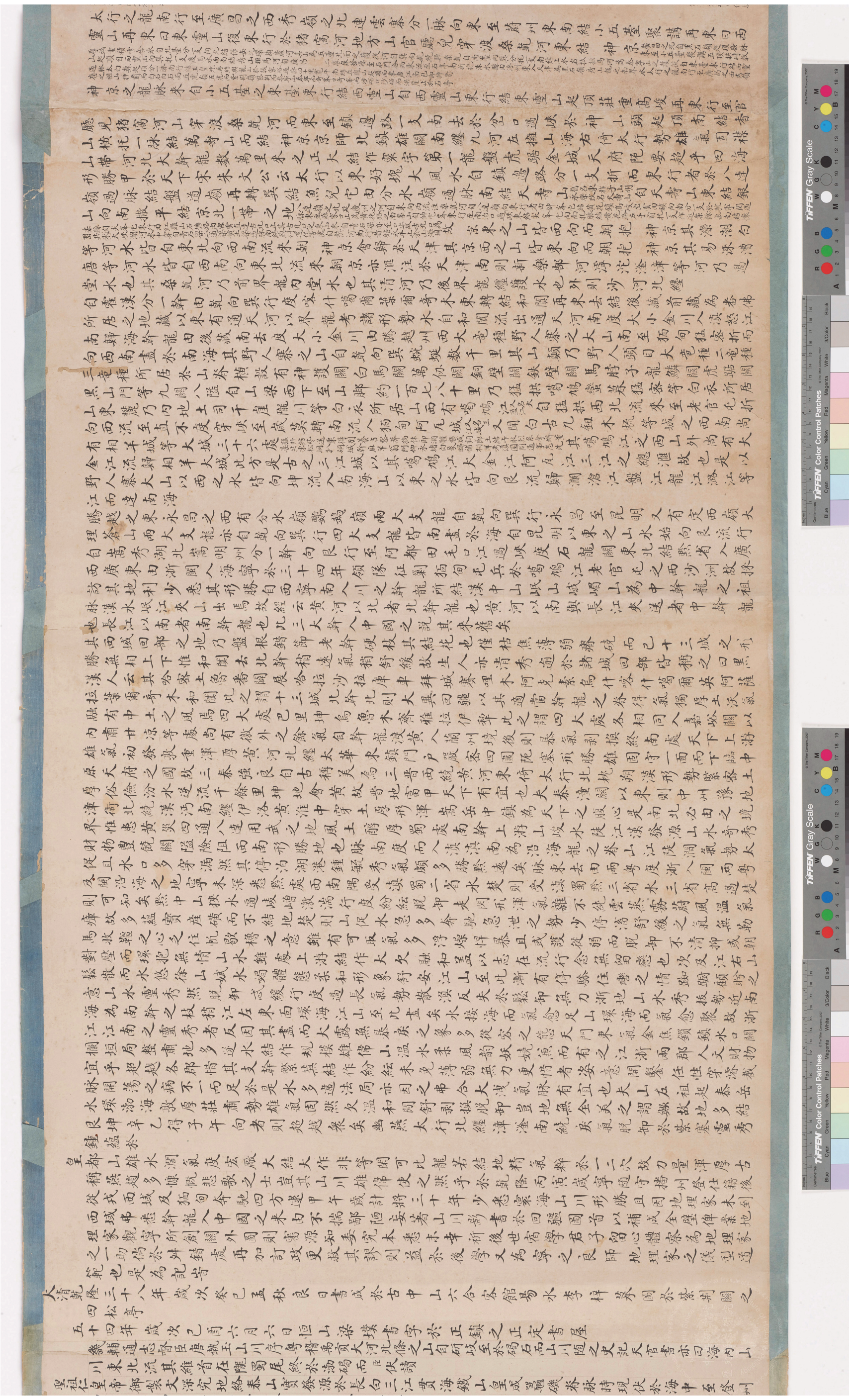
118 蘇寧阿，〈西域回疆記略〉，《萬里回疆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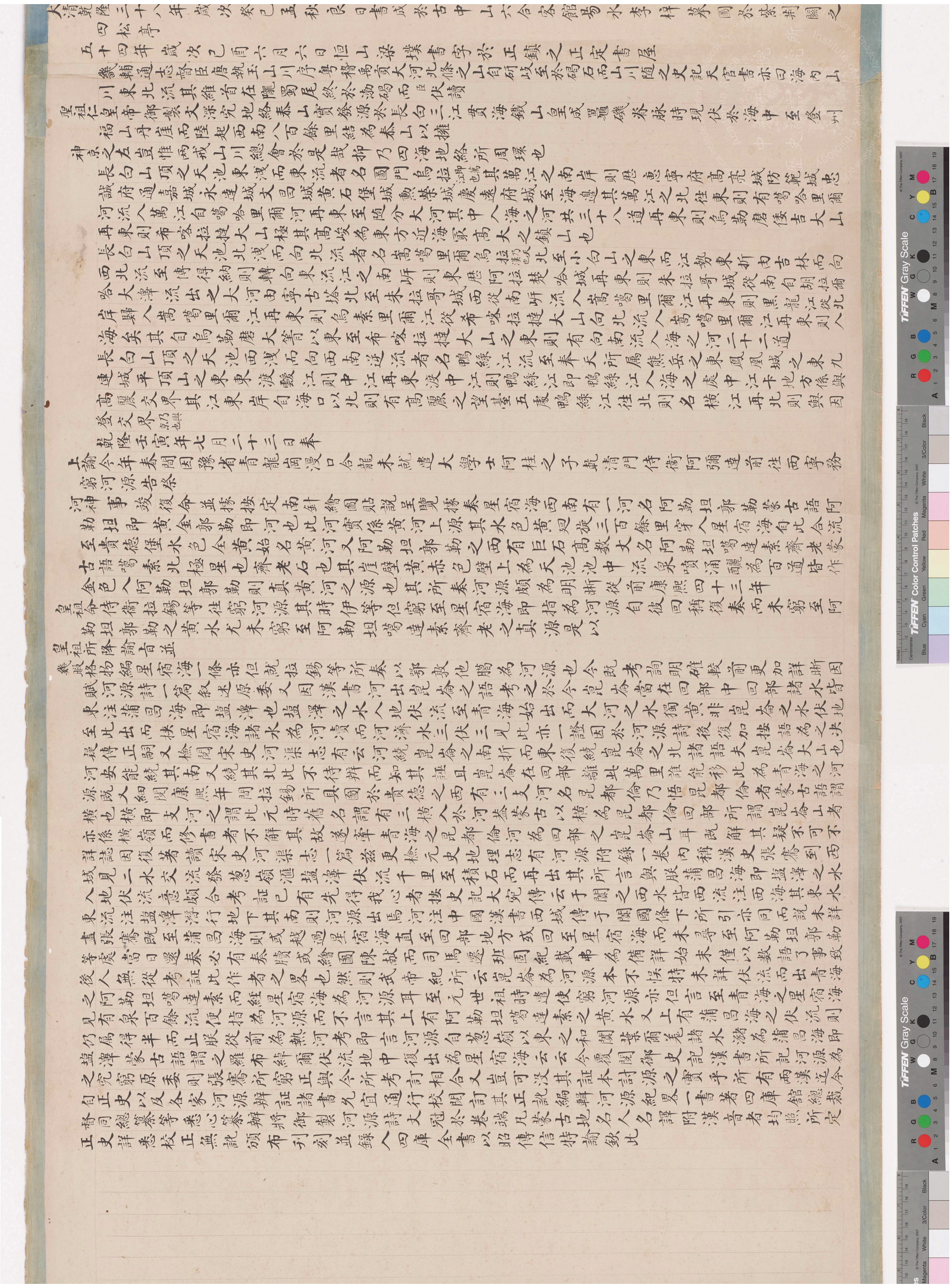
後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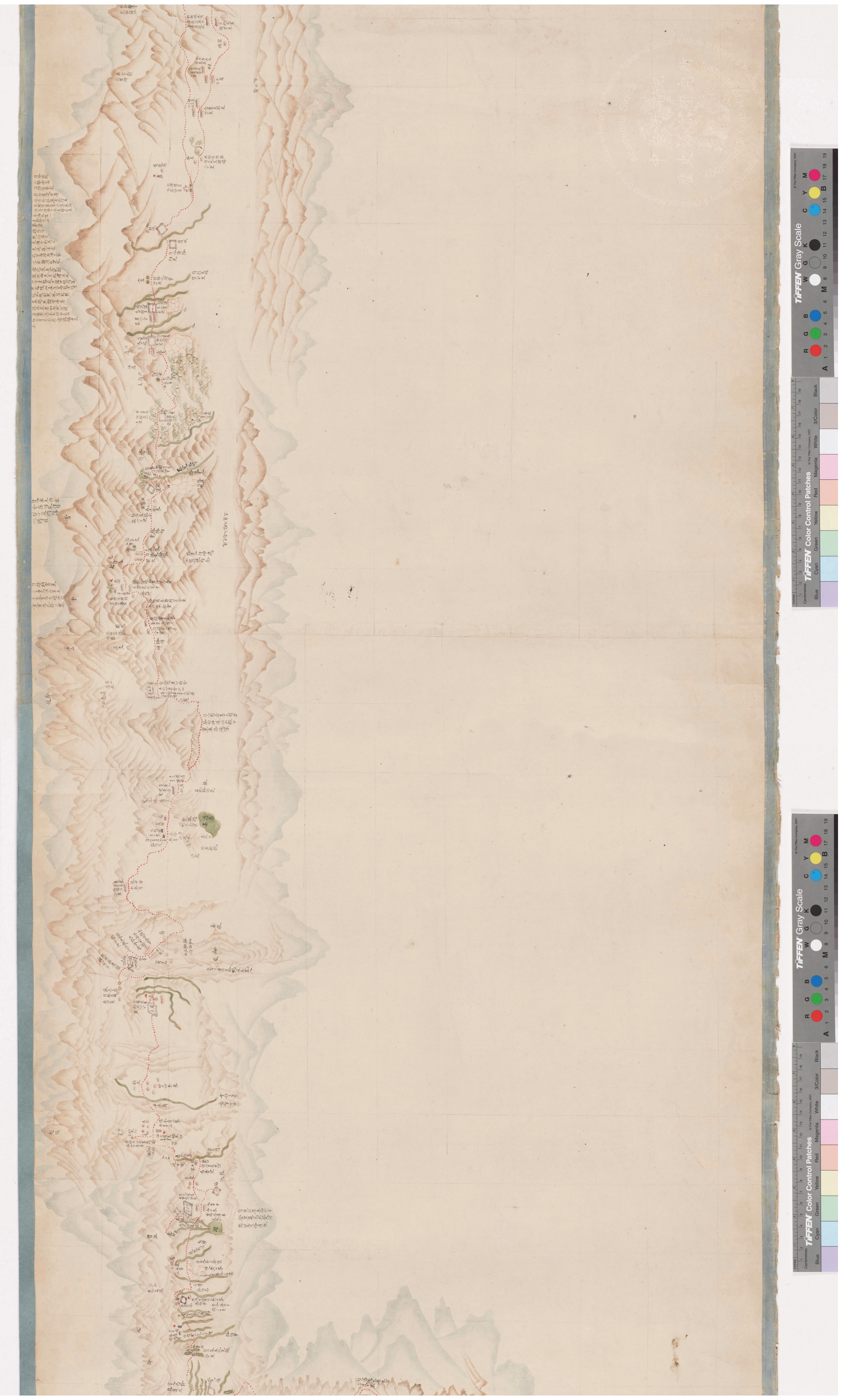
本文各節初稿，曾分別宣讀於 2021 年 11 月 22 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基礎建設與人群互動」讀書會、2021 年 12 月 15 日「2021 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2022 年 4 月 12 日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柳詒徵學堂強基計劃「邊關何處：新視野下的明清邊疆」系列講座、2022 年 4 月 21 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研究生講座，先後承王汎森、李貞德、陳國棟、祝平一、陳雯怡、李仁淵、陳韻如、吳修安、馬騰、胡簫白、葉高樹等先進指教；復得就正於二位匿名審查人。本文考證之清代新疆交通路線，與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范毅軍、蔡宗翰、廖泫銘合作製成 GIS 系統。又研究助理李心平、黃子晏、黃君泰曾協助文字校對。對於以上各方協助，謹致謝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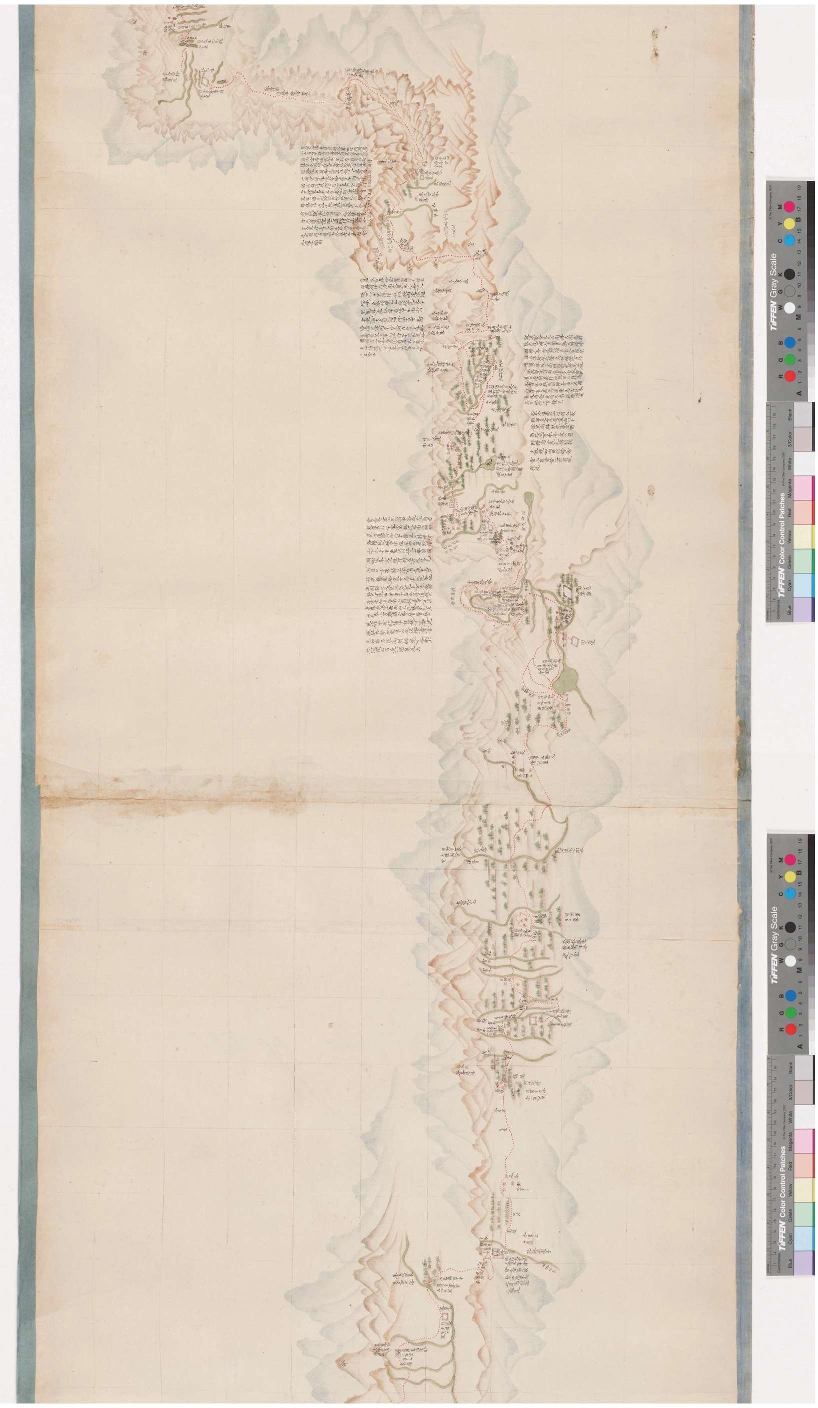
附錄一：《萬里回疆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品）彩色圖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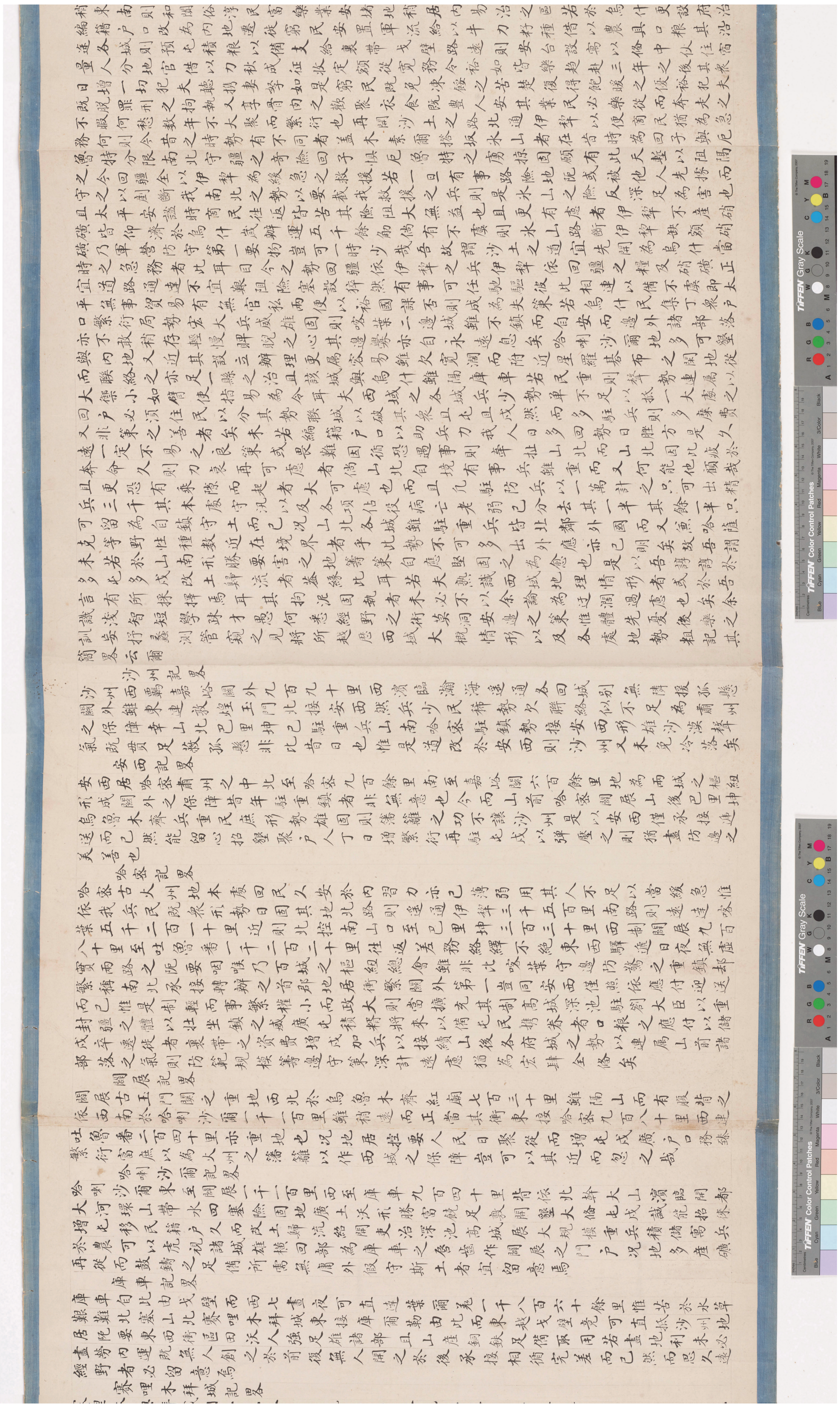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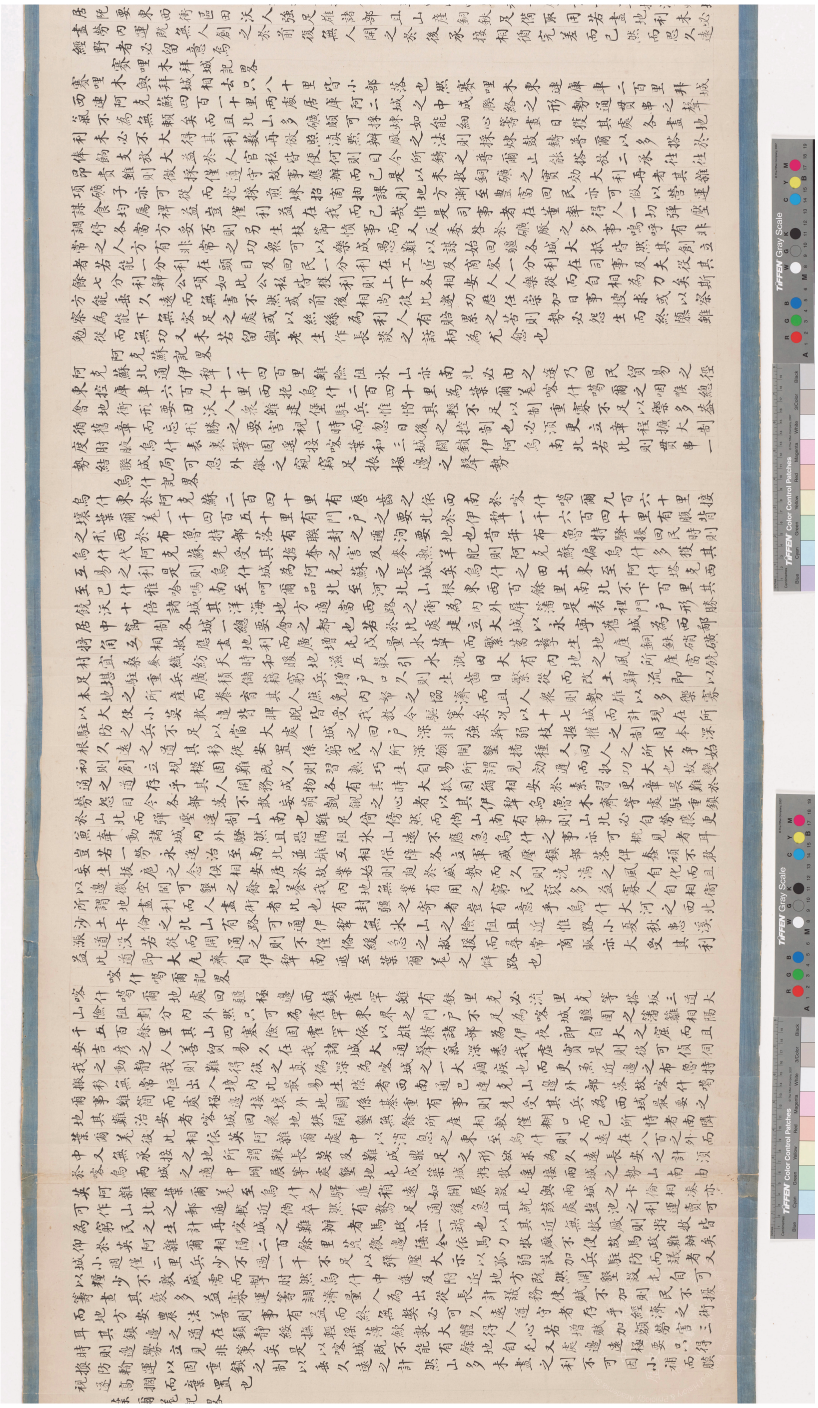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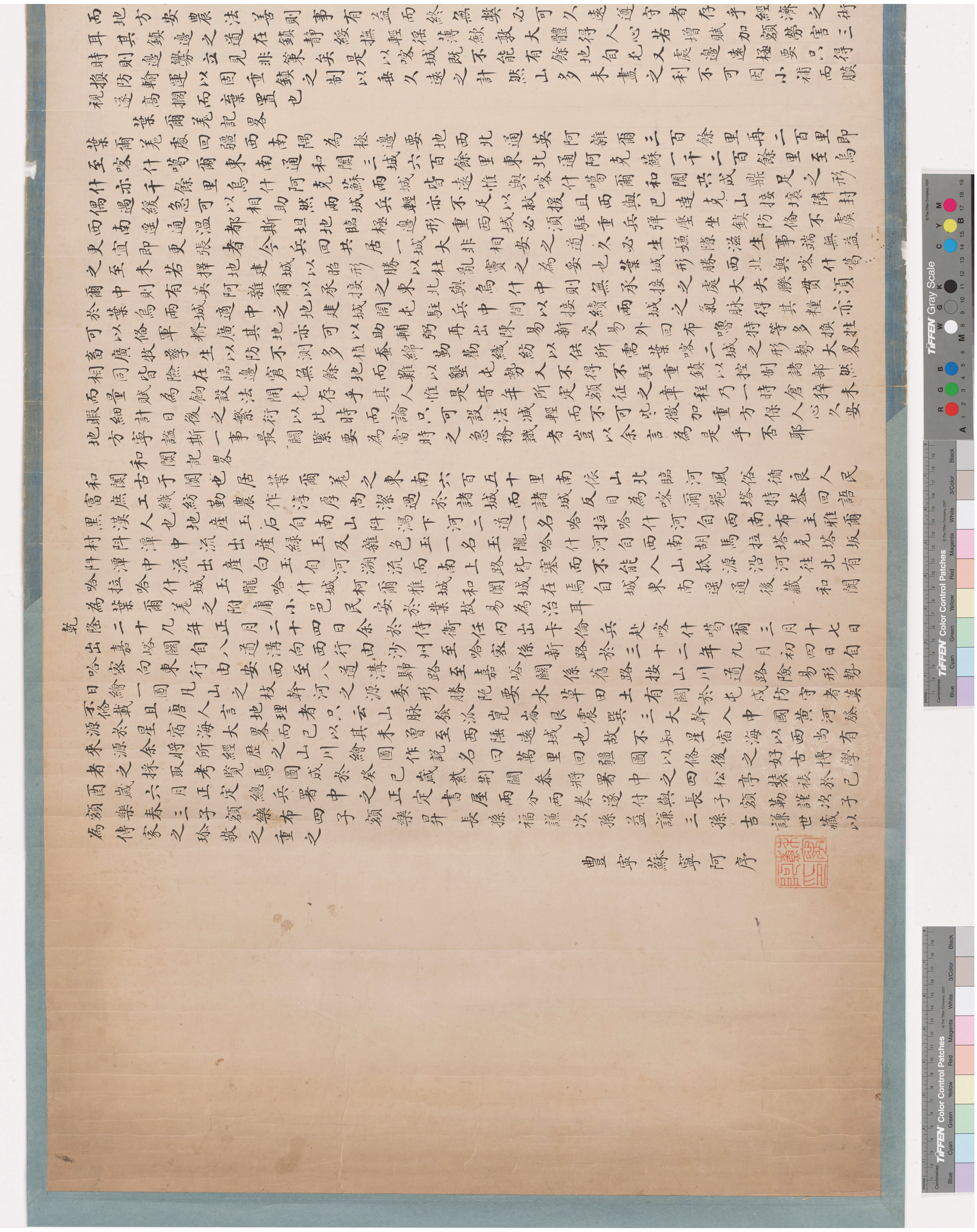


孔令偉





孔令偉



附錄二：序文〈山川影〉校注[119]

四海之濶，山川之廣，吾人不能週遊畢覧，然察其水之來去滙歸，審其山之高下聚散，則知其概矣。復證諸月影，考之地經，尤爲近切。夫太陰中之婆娑，山形也；涵虛，水影也。以此考之，則祖脉發自坤方，向乎艮地，[120] 中國之水，皆東流注海，亦可知其山水皆自西而東。故經云：山脉發自崑崙，劈枝分脉，有三大幹入中國之説，勢如此而理亦□，其條幹枝岔、江河界水，載諸地經，勿庸吾贅。[121] 今據吾目所睹，耳所聞，心所會者而言。寗於乾隆二十九〔年〕，嵗[122] 次甲申，從軍西域回疆喀什噶爾舊名哈什哈爾，去嘉峪関七千餘里，因　先父奉使霍漢在喀什噶爾之西二千餘里外旋喀，[123] 寗迎於邉界西四百餘里，皆荒山無人之境；並閑常細諮訪喀什噶爾、葉爾奇木舊名葉爾羌，在喀城西南一千餘里等城之阿渾[124] 回部

[119] 校注凡例：以下錄文盡可能在兼顧印刷條件下，保存史料原文異體字。原文「寧」字主要有兩種異體，錄文分別以「寗」、「寕」等形近異體字表示，惟筆劃略有出入，為利排版，不另行電腦編碼，請自行對照圖版。如遇原文漫漶不可判讀處，缺損一字以「□」符號替代，兩字則為「□□」，依此類推。至於漫漶而尚可辨讀者，則於本字外加方框處理，如「某」作某。至於依上下文意脈絡可推斷，或明顯錯落者，以〔 〕補充說明。原文分正文大字以及旁註小字，錄文亦分別以大、小字作區分。遇原文抬頭之使用，則以全形空格表示，並依原文留空與提行之格數，以對應其抬頭格數之全形空格數量呈現。此外，為便於錄文注釋的對讀，以下註碼將直接標示於字詞後方。

[120] 蘇寧阿採用之羅經八宮、二十四山方位系統，係以文王後天八卦為根據，故此處坤為西南，艮即東北。其餘對應關係如下：坎，正北；震，正東；巽，東南；離，正南；兌，正西；乾，西北。

[121] 此處所引三大幹龍入中國之說，源自宋明堪輿學傳統，指北、中、南三條。如託名唐人，實流行於北宋之《理氣心印》稱：「臣聞崑崙為四極之祖，分流三幹。北條出河北，入雲中、九嶷、鴈門、代郡，回復南而太原、帝丘、太行、恆山，派九河，東北渡遼海，以入於海，為冀兗之分。中條出河南，自秦隴、三輔入豐沛、汾晉，派伊洛，東而淮泗，以入於海，為雍豫徐青之分。南條出江南，自陝右分出西鄙，回巴蜀，踰荊衡，入黔中，東而匡阜，南極嶺海，北度閩粵、三吳，自浙右以入海，為梁荊楊之分。」又明人徐善繼、徐善述纂《地理人子須知》稱：「朱子曰：『天下有三處大水，曰黃河，曰長江，曰鴨綠江。』今以輿圖考之，長江與南海夾南條，盡於東南海。黃河與長江夾中條，盡於東海。黃河與鴨綠江夾北條，盡於遼海。」關於此概念的流傳，參：楊玉成，〈龍脈〉，頁 147-167；段志強，〈經學、政治與堪輿〉，頁 109-132。

[122]「歳」之異體字。

[123]「先父奉使霍漢旋喀」等語，指乾隆二十九年蘇寧阿之父四十七率清朝使團自浩罕汗國返回喀什噶爾。關於四十七奉使浩罕一事，參前文考證。

[124] 清代漢文文獻又作「阿訇」，源自波斯文 āḵūnd，意即「伊斯蘭教學者」。

傳經法師以及遠遊之人聞說。回經云：西方大極之山名默克[125]，環以弱水，[126] 不能渡越，是以高廣莫能測焉。自葉爾奇木至默克，尚有数萬里，大阿渾回部傳經法師有持懇徃[127] 朝默克者，沿途皆供給衣食脚[128] 力，至弱水邊遙望山在蒼茫[129] 有無間。其近岸居人皆習經典之大法師，因聽講就教焉。旋歸時，則更衣五彩袖□□□□纒頭帕帽[130]，沿途諸部落皆供奉留住聽講焉。其未朝過默克之阿渾，只帶白布纒頭帽。回部西域之山，皆來自默克，即番經梵語須彌山，儒書地經崑崙山也。其高圍里数之說，常出自仙經子書。然寧諮訪於喀、葉各城之阿渾，皆云弱水環繞隔絶，既無法涉渡，焉知其遠近高廣也？温都斯坦[131] 在葉爾奇木西南二千餘里之山脉來自西方，是以回疆之山來自温都斯坦，由□行艮伊犂山西北通察漢布呼圖大山千餘里[132] 度巴達克山[133] 在葉爾奇木西南千餘里，北結霍漢，折而東結伊犁。霍漢外，西有大江[134] 為界水，大江西�octet[135] 即闢色勒[136] 地方。其江自坤向艮，流過伊犁北大山之北，旋而東注於北海大江之外。另有大山行向艮方，入鄂羅斯地

125「默克」，即伊斯蘭教聖城「麥加」（阿拉伯文 Makkah）音轉，詳見本文考證。

126 此處「弱水」，指波斯灣。

127「往」之異體字。

128「腳」之異體字。

129「茫」之異體字。

130「帽」之異體字。

131 即波斯文 Hindustan 之音寫，指「印度」。關於溫都斯坦在清代文獻中的流傳，參 Mosca, *From Frontier Policy to Foreign Policy*, pp. 69-100.

132 此句小字注於正文上方。察漢布呼圖大山，《雍正十排圖》滿文作 Cagan buhūdu alin，《乾隆內府輿圖》漢文作「察漢布胡圖阿林」，山名俱音寫自蒙古文 čaġan bökötü，意即「白駝峰」。此山脈位於今日哈薩克斯坦齋桑泊西北。汪前進、劉若芳，《清廷三大實測全圖集——雍正十排圖》，四排西五；汪前進、劉若芳整理，《清廷三大實測全圖集——乾隆十三排圖》（北京：外文出版社，2007），七排西三。

133 中亞古國，明清漢文文獻又作「八答黑商」、「拔達克山」，對音波斯文 Badaḵšān，位於今阿富汗東北以及塔吉克斯坦南部一帶，該地十五世紀原為帖木兒帝國所控，十六至十九世紀烏茲別克人在該地建立政權，與明清兩朝曾互使往來。參：馬子木，〈乾隆朝初通巴達克山考：兼論準噶爾遺產與清朝中亞外交之初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8.2 (2017)：347-396。

134 即阿姆河（波斯文 Āmū Daryā）。在古代波斯文文獻中，阿姆河經常被視為伊朗以及中亞的界河，參 B. Spuler, "ĀMŪ DARYĀ," in *Encyclopædia Iranica*, ed. Ehsan Yarshater (London: Routledge, 1982-?), I/9, pp. 996-997。

135「岸」之異體字。

136 即「波斯」之突厥語 Pérsiye 的對音。

方，為北海沿邊之龍。其伊犁之北大山與伊犁之南大山，[137] 兩山之中有伊犂江、精河、呼嗎哪嘶河等水，會歸戹[138] 爾起思河，流入北海以界龍，[139] 為北大幹龍山名額臨海秘勒漢，番語山脊梁骨也[140] 之北界水。北大幹龍之南則有回部開都[141]自伊犂南山流出等大河，七十二河皆滙歸於羅卜腦兒湖[142] 在土魯畨之南五百餘里，其湖週廣二千餘里，為回疆眾水會聚停滀消納之藪，四面無通洩處[143]，湖南有沙山以界之。沙山去北大幹龍千餘里，其沙山橫過亦数百里。沙山之南則泉水湧出，名星宿海，是黄河之源。以此論之，則水從沙山下行，如濟水穿行地下。西域回疆之水，氷[144] 雪居其七，雨泉居其三，大勢皆乾向巽流，為北大幹龍之南界水。北大幹龍初結伊犂，東行至阿克蘇在喀城東一千三百餘里之北起頂結氷，山名穆素爾搭坂[145] 山秉寒陰凝閉之氣，結萬年不化之氷，為伊犂回疆南北之限，地當阨要，險成天塹，再東至博爾土搭坂[146] 起頂駐蹕，分枝劈泒[147]，再東至巴里坤今改名鎮西府[148] 東平頂山起頂，高揷雲霄，泒分四隅。北大幹龍此一叚[149]，古名葱嶺自古積雪，北名湖池、盐池，蓋山上衛龍也。再東至盐池[150] 地方，則脉落平洋，撒平[151] 山

---

137 伊犁之「北大山」以及「南大山」，分別指伊犁北部的科古爾琴山以及南部的天山主脈。

138「戹」之異體字。

139「戹爾起思河」即額爾齊思河 (Irtysh River)，北海即作為其出海口之北冰洋鄂畢灣。然此處謂伊犁河、精河以及瑪納斯河皆入額爾齊思河，則與現代地理知識有落差，今日這三條河流分別流入巴爾喀什湖、艾比湖以及瑪納斯湖。

140「額臨海秘勒漢」，此實指天山山脈北支，清代稱「額林哈畢爾噶」，即今依連哈比爾尕山脈一帶。蘇寧阿此處將此山名意涵理解為「山脊」，恐係漢字音訛所致。詳見前注 92 考訂。

141 開都河發源於天山北部依連哈比爾尕山脈，今流入博斯騰湖。

142 蒙古文 Lob naġur，即羅布泊。

143「處」之異體字。

144「冰」之異體字。

145 清代文獻又作「穆蘇爾達巴漢」，今伊犁昭蘇通往阿克蘇溫宿之木扎爾特（Muz-art，突厥語「冰山口」）古道；「搭坂」，又作「達阪」、「達巴漢」，蒙古語 dabaġa(n)，「山口」之意。此地為清代北疆南通庫車、阿克蘇等地之要道。《清高宗實錄》卷一三六六，頁 325。

146 又作「博爾圖達巴罕」，祁韻士《西陲要略》稱：「喀喇沙爾，山則有博爾圖達巴罕，在城東北一百三十里。」該地在今巴音郭勒和碩縣西北山區。祁韻士，《西陲要略》（收入《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正編》第 2 帙第 2 冊），頁 1。

147「派」之異體字。

148 乾隆三十八年 (1773)，升巴里坤直隸廳為鎮西府。

149「段」之異體字。

150 此處即巴里坤湖。

151 堪輿學術語，即龍脈降落之勢。

勢，塹然下伏，而為希爾哈戈壁[152] 又名千里戈壁，週圍約千餘里。其北大幹龍之脉穿度戈壁而東五百餘里，至牛首山[153] 又起頂，結寧夏，沿北套邊度晉，由燕雲入木蘭自木蘭中南分一幹，至永平結都山、醫無閭山，結盧龍，至山海関入海，餘脉東行，結廣寧鉄[154]岔山、千山等山。灤河自宣府西炭山，北纏京北之山，東行，轉而南折，為永平府之西界水，南入海。故密雲薊州等處之山，皆西向朝拱　京師，潮、白等河皆自艮流坤，遠朝　京師，至天津入海。東行至渤海約二萬餘里，通長白山在奉天東北二千餘里。高二百四十里，上有靈池[155]，下多神泉，雲霧蒸翳，莫窺其形象，真天地鍾霊[156]，乾〔坤毓〕秀，贊陰陽，佐化育，為海內東崑崙者也凢[157] 大幹龍之南有小幹，小幹之南有大枝，大枝龍之南有小枝龍。開都河、西域回部諸河、羅卜腦爾湖、黃河界，其南；伊犂江、精河、呼嗎哪嘶河、厄勒起思河界，其北。自北幹向南落脉，分幹而結者数十處，故北幹之霊駕乎中南二幹之上。北大幹龍之北，伊犂、烏魯木齊、巴里坤等處，多離龍落脉。伊犂江、精河北纏，且地多湖泊，□□幹龍，故山多樹木，地足開墾，形勝富庶，有內地之風；不似山南回部，童山萬里，土燥水寒，偶有結作，亦僅百里可種，餘皆戈壁之瘠也。

自長白山從艮向坤發脉，為奉天諸山之祖，又穿海連結島嶴[158]，至齊地結東岳泰山，何也？葢[159] 鴨緑江水自艮向坤，逆流三四千里，入東海嵩噶里江由巽向乾[160] 故也海內第一逆流水。其次山西汾水，逆流千餘里；其次山東汶水，逆流千里。

北大幹龍旋霍漢，度安吉彥[161]，向南分幹為阿克博索搭坂、必流里克搭坂、鉄里克等搭坂[162] 積雪高峻，與北幹同，道通霍漢，山阧險峻。路狹一線，形勝扼要，一夫守

---

152 蒙古語 Siġurġ-a ġobi（暴風沙漠）之對音，此即今人所稱之庫姆塔格沙漠（突厥語 Qumtagh Qumluqi）。《從軍雜記》、《回疆通志》等清代文獻又稱之為習里哈戈壁、千里翰海。方觀承，《從軍雜記》（收入《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正編》第2帙第1冊），葉2；和寧，《回疆通志》卷一一，頁249。

153 位於寧夏青銅峽市南方約二十公里之黃河東岸一帶。

154「鐵」之異體字。

155 即長白山天池。

156「靈」之異體字。

157「凡」之異體字。

158「嶴」之異體字。

159「蓋」之異體字。

160 鴨綠江三字後接「水自艮向坤，逆流三四千里，入東海嵩噶里江由巽向乾」，為挖改補入。嵩噶里江，滿文 Sunggari ula，即松花江。

161 即安集延 (Andijān)，中亞費爾干納盆地東南之大城，近於今烏茲別克斯坦東部。

162 此三處達阪大致沿今吉爾吉斯斯坦西北之恰特卡爾 (Chatkal) 山脈，以順時針方向繞行費爾干納盆地，南行今塔吉克斯坦北部阿賴 (Alai) 以及吉薩爾 (Gissar) 山脈。

之，萬人莫逾。冬氷雪封山，夏氷雪溶則溪漲，來往俱絕，成天塹焉。霍漢土沃民強，故厄爾德泥[163]恃此以雄[164]諸回部。自安吉彥劈支之小幹龍，分向南行，初結喀什噶爾，次結英阿雜爾[165]，次結葉爾奇木，皆自乾行巽。末結和闐古于闐，產玉地，其處回民工織紡，尚潔净，有內地之風，富庶在諸回部之上。自南山流出河二道，一名哈拉哈什河[166]，產綠玉及雜色玉，自西南布主雅爾村阧潭中流出，再南則路塞，不能入山抵其泉源矣；一名玉弄哈什河[167]，產白玉，自西南胡嗎拉搭克搭坂阧潭中流出，再南至帕巴克地方則路塞，不能入山抵其泉源矣。沿河往北，有哈拉哈什城、玉弄哈什城、柯爾鴉城[168]、和闐等城，皆織布絹。自南山流出大小河数道，皆東歸羅卜腦爾湖。和闐之南雪山，來自喀什噶爾之西北，向南行度英阿雜爾、葉爾奇木至和闐，山勢如環，復向東南轉折而入藏。產玉之河身一段，只有百餘里長，餘皆無玉。趂[169]冬氷雪未消溶以前，夏河水低落之後，於春秋二季，乘勢採取。河南抵阧潭，則玉非自山上沖下可知，且雖邊道上山，不能得玉，可見玉係河中化生者。且有五色，其血浸、水銀浸，皆非也，東去入後藏、前藏，結烏斯地方，[170]為番佛所居之地。

自喀什噶爾北分一支，東行千餘里，脉盡洋海[171]，其脉腰落而結烏什庚方[172]起頂，離方立祖，大河北纏而東南邊抱去脉，左手砂轉前作案，自案過脉伏而又起，東去数里，案北伏而又起成廻龍顧祖，形似遊魚。烏什城適建於魚首，惟朝坐皆秉煞氣，崚嶒破面，探頭縮腦，為風水所大忌，故烏什遭刼而不祿。脉自烏什再東去七十里，至洋海為盡頭，結層層疊落，聯珠三起，形成卧象。大河東纏，包裹嚴密，土厚氣融，地勢平坦，東控阿克素，西連烏什，西南通喀、葉等城，地居阨要，形勝總會，三路通衢，数城脉胳也。自烏什西諤托巴什[173]至洋海百餘里，大河

163 即額爾德尼伯克 (Erdeni Beg / Irdana Biy)，十八世紀五〇、六〇年代浩罕汗國的統治者。

164「雄」之異體字。

165 即英吉沙爾（突厥語 Yéngisar）之訛稱，在喀什南約七十公里。關於清代將英阿雜爾正名為英吉沙爾一事，乾隆四十六年閏五月上諭稱：「以朕所記憶而論，將英阿雜爾改稱英吉沙爾；哈喇沙爾改稱喀喇沙爾，方與回人原音相合。」《清高宗實錄》卷一一三二，頁132。

166 喀喇喀什（突厥語 Qaraqash）河，又稱墨玉河，源出喀喇崑崙山，為和田河西源。

167 玉龍喀什（突厥語 Yorungqash）河，又名白玉河，源於崑崙山北坡冰川，為和田河東源。

168「柯爾鴉城」，源自突厥語 Kériya，在克里雅 (Kériya) 河西岸，故得此名，約位於今日新疆和田轄下于田縣木尕拉鎮一帶。

169「趁」之異體字。

170 所謂「烏斯地方」，即藏文 Dbus，約包含今拉薩、山南以及林芝一帶，清代漢文文獻通稱「前藏」；至於「後藏」則主要包含日喀則一帶，藏文稱之為 Gtsang。元明清三代以「烏思藏」通稱西藏核心區域，即為 Dbus Gtsang 並稱。

171 突厥語 Yarghol，今洋海村，位於今阿克蘇烏什縣城東方約四十公里處。

172 此處用羅盤二十四山方位系統，庚方屬西，約對應現代指南針 247.5–262.5 度。

173 突厥語 Otbéshi，今烏什縣奧特貝希鄉。

南北兩岸，土地寬闊可墾，村落稠密可居，蚕[174] 綿皆宜，銅鉄俱産，形勝地利，甲於諸城，故烏什乃回部之要地也。回疆與伊犂雖有氷山[175] 間隔，實有腹背相依，唇[176] 齒包連之勢，故招徠增屯，改土歸流，為守西域永遠之要策，是以寧記各城氣脉獨詳耳。自烏什西北沙土[177] 此路北通伊犂甚近，且又可省度穆素爾搭坂氷山之險阻，惟夏秋溪澗漲發難走，可惜路未修通，支龍分脉，東結阿克素，會子申辰水局[178]，大河纒平洋善地，支龍東去八百餘里，於河色拉[179] 過峽賽里木、拜城皆在支龍山之北峽口，石岩間有古鑿岩成洞穿通，石廟甚多[180]，山陽落脉，東結庫車大河，左環會申子辰水局，開都河邊北山後以界龍。故庫車以西諸城之北山，皆在開都之南大幹龍之南，大支龍之北，兩龍之中乃朱爾土斯路[181]。

哈爾沙拉[182] 者，乃北幹之小支，所結平洋沃野，自古屯田處，開都河南邊哈拉哈爱曼山[183]，作西屏嶂。

北大幹龍自伊犂東行，至博爾圖搭坂起頂聚講，東南分一支為小幹龍，東去二百餘里，至托克遜[184] 之南山二塘溝過峽，子午度脉，南北山口上下至脊各百五十里，其北山口北拖一脉，結托克遜，會申子辰水局，有水自烏魯木齊山流

174「蠶」之異體字。

175 即指天山。

176 此為「唇」之別字。

177 清朝於烏什城外西北設有沙土卡倫，又作沙圖卡倫，在今托什干河以北。該地北通伊犁，西通巴達克山、安集延。《清宣宗實錄》卷七五，頁 217；卷八〇，頁 295。

178 即數術中所謂地支三合局。申子辰合水，寅午戌合火，巳酉丑合金，亥卯未合木。關於三合局在數術中的應用與意義，參：萬民英，《三命通會》（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10 冊）。

179 清代文獻又作赫色爾必拉、赫色勒郭勒，今稱克孜勒河。位於拜城縣境內，為渭干河主要支流之一。《欽定皇輿西域圖志》卷二，葉 11。

180 此處所謂「石廟甚多」，即後人所稱克孜爾千佛洞，位於今拜城縣克孜爾鄉。

181 位於今日新疆北部巴音郭楞下轄和靜縣西北。清代漢文文獻又作「裕勒都斯」、「珠勒都斯」等異稱，皆源自突厥語 Yultuz，意即「星」；又蒙古語文中的突厥借詞，字首 J̌ 以及 Y 常有混淆通假之例，如 J̌ada/Yada（札達，祈雨石），此處「裕勒都斯／珠勒都斯」之首字亦然。對此《西域同文志》載：「裕勒都斯郭勒。回語裕勒都斯，即星也。發源處泉眼如星，故名。」《欽定西域同文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35 冊），卷五，葉 31。

182「哈喇沙爾」之訛，清代又稱喀喇沙爾，對音突厥語 Qarasheher，今新疆焉耆。

183 清代文獻又作「哈爾哈愛曼」、「哈爾哈阿滿」，據《清實錄》、《西域聞見錄》等記載，此地在喀喇沙爾城西約九十里處，並產石碳煤礦。椿園七十一，《西域聞見錄》（清乾隆四十二年刊袖珍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第 4 冊，卷八，葉 6；《清宣宗實錄》卷三九一，頁 1023。

184 今吐魯番托克遜縣。

來，為大小兩幹龍之界水。由博爾圖搭坂自南向東分一支為大支龍，行至庫米市嗎哈之南山過峽，乾巽度脉，南北山口上下各六十餘里。又自南向東分一支為小支龍，行至四塘溝過峽，亦乾巽石梁度脉，從小支自艮向坤逆生一脉，作烏什他拉[185] 掌水之南案砂。北大幹龍東行至土魯番之西北五六十里許，向東劈分一小嫩支，結土魯番、樂山，枕靠北幹，會亥夘未木局，其小支仍東去至慎金之古玉門關過峽，乾巽度脉，南北山口上下各三十餘里，復行二百餘里而結闢展，成迴龍顧祖右玄弓形，會夘亥未木局，朝對本支作案。

北大幹龍東行至哈密之南山口，山陽落脉而結哈密，會申子辰水局，其哈密東南山咬牙溝過峽者，乃平頂山分脉幹龍南度之分支也。

北大幹龍又自平頂山[186] 向南發脉，托落平陽，自南山口叠[187] 落，下結哈密。自平頂山東跌落一脉，折而南行，則雲屯霧聚，風捲浪湧，直奔嘉峪關，層層起伏，脉行九百餘里，結安西府今改寧遠州，脉又南行二百餘里，至沙州以南祁連山起頂，此千餘里乃大幹龍之大断落、大過脉也。其沙州之南山積雪者，乃平頂山分脉南度之幹龍，伏而又初起勢也；東行九百餘里，東折則入嘉峪關，山陰落脉而結肅州，會申子辰水局，其南山名終南山綿亘雄峙，內地祖山；又向南分一脉，度西寧而南入川滇，折而東入兩粵浙閩，盡入海兩粵浙閩之脉，自雲南分來，徐記言之最詳。

其自終南向東發脉之龍，東行千餘里，至凉州烏稍嶺[188] 過脉。幹龍東南分一脉，行五百餘里，於蘭州渡黄而巽行，轉折七百餘里而東，至隆[189] 德縣之六盤山過峽，子午度脉，自乾行巽而南折，而東腰落結西安，再東行至華陰結少室、太華為西嶽。脉南去入豫，又自烏稍嶺向東分一脉，東行六百里入寧夏。

北大幹龍自平頂山穿希爾哈千里戈壁大斷落過脉，度寧夏，沿北套邊而東行，至山西朔代山南曰燕，山北曰雲汾水以東分一支向西南發脉，名太行山，南結北嶽恒山，分支結太原，再南結五臺[190]，再南行至韓侯嶺[191]，度脉為中條山之龍，綿亘二千餘里，結中條山西為晋，山東為趙，抵潼關、黄河，而朝西嶽華山汾水自艮向坤逆流千餘里，夾送中條歸黄，太行至太安驛分一脉為綿山，南盡於黄河。

---

[185] 位於博斯騰湖北岸，今屬巴音郭楞和碩縣。
[186] 天山東支，今新疆昌吉木壘縣照壁山鄉平頂山村一帶。
[187]「疊」之異體字。
[188] 亦稱烏鞘嶺，屬祁連山脈北支，位於今甘肅武威天祝中部。
[189]「隆」之異體字。
[190]「臺」之異體字。
[191] 今稱高壁嶺，在今山西省靈石縣南。相傳韓信葬於此，故得此名。

太行之龍南行，至廣昌之西、秀嶺之北連雲寨，分一脉向東，至蔚州東南結小五臺[192] 聚講，再東曰西靈山，再東曰東靈山，復東行於猪窩河地方山、官廳兒，穿渡桑乾河，東結　神京廣昌之北，自黑石嶺起頂發脉，東至小五臺聚講，五頂拱峙，敦厚端重，積雪啥[193] 氷，自北臺分一支向北，結保安，北環葫蘆河，其山為五臺北面之護從，河自巽向乾繞歸桑乾，自南臺向巽分托一支，南結上水岩，抵拒馬河，為泰寧山之護從，自東臺東行結西靈山起頂，自西靈山向巽托一支，度馬水而南結房山。拒馬河自廣昌□□二處泉發源，至石門合而東流，至石亭南折抱涞水縣，由涿州東入天津，為黒石嶺、房山龍之南界水。太行之龍南行，至廣昌之西秀嶺過脉，太白巍起頂，分一脉南行結玉皇坨，再結興龍山於張家峪，過脉四十里寬平，南結五鳳山起頂而東唐江南包，即插箭嶺之祖山。揷箭而白石，白石而五虎嶺，五虎而紫荊嶺，紫荊而泰寧山，泰寧而奇峯口，奇峯而沙峪口，沙峪而洪崖，止於石亭。

神京之龍脉，來自小五臺之東臺，東行結西靈山，自西靈山東行結東靈山起頂，莊重高峻，再東行至官廳兒、猪窩河山，穿渡桑乾河而東，至鎮邊路一支南去，於岔口過峽，於神山頭起頂，南結香山，橫托一脉，結萬壽山而結　神京。京師北鎮雄關，南纏九河，左擁山海，右倚太行，勢雄氣固，襟山帶河。北大幹龍数萬里來之，正大結作寰宇第一龍盤虎踞、金城天府，阨要超乎四海，形勝甲於天下。宋朱文公云：太行以東，好塊大風水。[194] 自鎮邊[195] 路分一支折而東行者，於八達嶺過脉，結盤道嶺[196]，再轉巽結魚兒它，由分水嶺過脉，南結天壽山舊名東柞子山，明永樂改名天壽山[197]。自天壽山東結銀山[198]，向南撒平結京北一帶之地八達嶺之北延慶州之河，自東向西流注桑乾河，自八達嶺向東行者，由帥峯它結黃花鎮，高峻出雲，由鎮向南分一支，於駝寧閔過脉，東至蘇家口止，為黃花路之南案山。自帥它峯[199] 東行，至南冶口過峽，東結尖峯它，向南托脉，結黃花路，左手前托一支作近案，餘氣南結懷柔縣，自尖峯它東行，由紅羅山石塘路、由密雲，直達古北口止。其古北口之東山，來自青石梁，亦至口止，故古北口為崩[200] 共水大峽，潮河水中穿自青石梁、二道梁、黃土梁，過脉南結薊州、遵化等處，自熱河

---

[192] 即小五臺山，位於今河北張家口蔚縣。

[193]「含」之異體字。

[194]《朱子語類》原文作：「冀都是正天地中間，好箇風水。」黎靖德，《朱子語類》，頁29。

[195] 今山西大同陽高縣一帶。

[196] 位於今河北承德興隆縣。

[197] 在北京昌平區北，即明十三陵所在。

[198] 位於今北京昌平延壽鎮。

[199] 為「帥峯它」之誤。

[200] 原文作崩。

南行者，結永平，止於山海關。故　京東之山，皆西向而朝抱　神京，其灤、潮、白等河水，皆自東北向西南流，來朝　神京，會歸於天津。其京西之山，皆東向而朝抱　神京，其易、淶、漕、唐等河水，皆自西南向東北流來朝京，亦滙注於天津南。則新樂、郜河、滹沱、滏漳等河，乃過堂水也；其桑乾河乃前界龍，內堂水也；其清河乃後界龍，纏護水也。外則沙河北纏。

自霍漢分一幹，由乾向巽行，度喀什噶爾、葉爾奇木，東轉結和闐，再東去結後藏、前藏，為沓佛所居之地。藏以東有通天河以界龍，考諸形勢，水自和闐流出通天河，南度大小金川，入滇怒江，南歸海；幹龍由後藏南去，度大小金川，由騰越州西大竜[201] 種野人寨之大山南，至緬甸猛密，折而向西南，盡於南海。其野人寨之山，自乾向巽，蜿蜒数千里，其山顛乃野人頭目大竜種、二竜種、三竜種所居，於山脊橫設有神護關、白馬關、萬仞關、銅壁關、鉄壁關、馬脖子、龍鱗關、虎踞關、黑山門等九關八隘。自山梁西下至山脚，約一百七八十里，乃猛拱、噶鳩、蠻暮、猛密等白衣所居。山東麓乃內地土司干崖、隴川等白衣所居，山西有噶鳩江又名大盈江自猛拱西北流來，至老官屯折向西流，至直，不度穿峽，至崴莫轉南，流入緬甸阿瓦城又名三江城。又聞白古、九鈕、木梳等城之西南，尚有相羊城等大城三十六處猛外、結些、送栗、得別、養吉、黎莽、猧休、郎洞、體樂、成詞、郎土、結卡、敢烈、糸拿、蟒董、晏共、凍松、洞扒、硐城、幹麻、羊翁、阿仰、永堵、白象、蟒補、相羊。考滇圖，問通事，悉此，其噶鳩江之西山外，尚有大金江流歸相羊大城，此方是古之三江城，以其噶鳩江、大金江、阿瓦江三江之總滙故也，是以野人寨大山以西之水，皆向坤流入南海；山以東之水，皆向艮流歸瀾滄江、盤江、龍江、潞江等江，而達南海。

騰越之東，永昌之西，有分水嶺、鸚鵡嶺兩大支龍，自乾向巽行；永昌至昆明，又有定西嶺、大理蒼山兩大支龍，亦自乾向巽行。四大支龍，皆南盡於海。自昆明以東之山，水始向艮流，行自嵩秀湖北嵩明州，分一幹向艮行，至阿都田、毛口江過峽，度石龍關東北，結黔省，入廣西、廣東，由浙閩入海。寧於三十四年領隊征剿緬甸，[202] 屯兵於噶鳩江、老官屯之西沙洲，故採訪其地利，少悉其形勝。自西寧南入川之幹龍，所結漢中山、岷山、峨嵋山，為中幹龍之祖脉，漢水、岷江夾山出焉，故經云：「黄河以北者，北幹龍也。黄河以南與長江夾送者，中幹龍也。長江以南者，南幹龍也。」此三大幹入中國之說，其來舊矣。

---

[201]「龍」之異體字。

[202] 此指乾隆三十四年 (1769) 清軍第四次征緬戰役。

其西域回部之地，乃盤根錯節，老幹硬枝，其結花也，僅枯焦薄弱瘠磽而已。十三城之形勝，無相上下，惟和闐去北幹稍遠，氣稍舒緩，故生人亦清秀，逾於諸城，回部皆稱之曰黒漢人云。其哈密、土魯番、闢展、哈拉沙拉、庫車、拜城、賽哩木、阿克素、烏什、喀什噶爾、英阿薩拉、葉爾奇木、和闐，此之謂十三城。北幹北則大異回疆，以其適當幹龍之脊，得氣獨厚，土沃氣融，有中土之風焉。四大處，巴里坤、烏魯木齊、雅拉、伊犂，此之謂。四大處各相同。入嘉峪關以內，肅、甘、凉等處，尚有徼外之餘氣；自幹龍渡黄入蘭州境後，則暴氣剥換。終南處天下上游，雄氣初發，敦重渾厚，黄河北纒太華東鎮，門戶嚴密，四圍阨塞，形勝雄固，守一面而下臨中原天府之國，故三秦強良，自古稱美焉。三晋西繞黄河，東倚太行，北枕朔漠，形勢緊密，土厚俗儉。汾水逆流千餘里，坤地會黄，故晋地富甲天下有宜也。夫秦潼關以東則中州豫地，漳、衛北繞，漢、沔南纒，伊、洛、黄、淮中穿，土厚形渾，嵩岳中鎮，為天下之腹心，是南北必由之境界，惟患黄災，四通八達，用武之地，風土醇厚。蜀處南幹上游，山峻水陡，江漢發源，山水奇秀，財物豊[203] 饒，關隘險阻，西南形勝地也。脉南度而入滇，滇南為沿海龍之脊，山江陡澗，氣勢太促，且水口多穿漏，然其停泊湖港，鍾毓秀氣頗多，勝黔遠矣。脉東去，由兩粵度浙入閩，兩粵及閩沿海之地，寧未深悉。黔處西南隅，受滇蜀二省水，楚則受滇蜀黔三省水，三省高過楚，則可知矣。黔中山狹水逼，崚嶒激湍，行度紛紜，脱卸走閃，形渾氣雜不純；雲蒸霧蔚，風温氣瘴，故多藴寶，産礦而不結地。楚則山促水急，多奔馳急泄之勢，少停滀舒緩之氣，無勒馬收韁之心，乏住帆[204] 歇櫓之意，雖有可取，氣多浮燥悍暴，且或護從弱而脱卸不清，抑或朝對壓而環抱無情，山水雖處上游，結作大欠融和，盖[205] 以志在流行，念無留戀也。次及江右，山鬆散而水悠徐，山娬[206] 水媚，體態柔和，形象舒安，江山至此，漸有停驂住轡之情，踟躕顧眄[207] 之意，山水靈秀，然脱卸忒緩，行度過長，氣勢散渙，反失於鬆卸無力。浙地山水秀抜[208]，勢近南海，為南幹之枝稍。江左東面環海，江山至此盡矣。水接海而氣愈足，山環海而氣愈聚，故浙江江南之靈秀者，反因其盡而大

[203]「豐」之異體字。
[204]「帆」之異體字。
[205]「蓋」之異體字。
[206]「嫵」之通假字。
[207]「盼」之異體字。
[208]「拔」之異體字。

露，無暴戾之象，多從容之態。天門東氣，金焦鎻[209] 鎮，水口闗攔，垣局整肅，地多逆水結作，規模雄偉，山温水柔，風韵妖嬈，兼而有之。江浙兩郡，人文財物宜乎超越各郡，惜其支幹繁蕪，結作紛紜，未免薄弱無力；更惜者姿意開鑿，任性穿濬，截脉開蕩之病，不一而足，於是水多違法，局亦因之弗合，大洩氣脉有宜也。夫山左祖起泰岳，水環渤海，敦厚莊肅，勢雄氣固，然欠溫和閒舒，剥換脫卸，豈地無全美之謂歟？故地多結艮坤，辛乙得子午向者，則超越眾矣。幽燕太行北纒，漳滏南繞，戾氣脫卸於紫塞，靈秀鍾蘊於　皇都，山雄水濶，氣度宏敞[210]，大結大作，非等閑可比。龍若結地，精氣粹於一二穴，故力量渾厚，古稱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豈其山川雄偉使之然乎？於乾隆丙寅歳，寧隨守播州，登仕籍；[211] 後從戎西域及緬甸，奔馳四方。逮甲午歲，計將三十年。少悉寰海山川形勝，且因地理家未到西域，弗悉幹龍入中國之来由，不揣鄙陋，妄著〈山川影〉，書於《回疆圖》首，以補成全璧，俾業地理家觀寧所創闗外圖，則審源知委，究本悉末。幸祈後世宿學君子，留心體察，為地理家之一助；倘於舛錯處再加訂政，更救其謬，則益於後學，又為寧之良師，地理家之儀型道範也。是為記。旹[212]　　　大清乾隆三十八年歳次癸巳孟秋良日，書成於古中山六合客館。易水李梓摹圖於紫荊闗之四松亭。

五十四年歳次己酉，六月六日恒山梁璞書字於正鎮之正定書屋。

《畿輔通志》督臣唐執玉〈山川序〉：「粵稽[213]〈禹貢〉大河北條之山，自研岐至於碣石，而山川[214] 隨之。《史記・天官書》亦曰：『海內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終於渤碣』。[215] 而臣伏讀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深究地絡，泰山實發源於長白，三江貫海，鐵山皇成，鼉磯脊脉時現，伏於海中，至登州福山丹崖而陸起西南八百餘里，結為泰山，以擁　神京之左，豈惟两戒山川總會於是哉，抑乃四海地絡所周環也。」[216]

209「鎮」之異體字。

210「敞」之異體字。

211 此處指乾隆十一年 (1746) 因其父四十七出任貴州遵義府知府，蘇寧阿隨同前往，並取得蔭補資格。

212「時」之通假字。

213「稽」之異體字。

214 唐執玉等，《畿輔通志》四庫本作「川澤」。

215《史記》原文作：「故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于勃、碣。」司馬遷，《史記》（臺北：鼎文書局，1981），卷二七，頁 1347。

216 以上引文，係摘抄自：唐執玉等，《畿輔通志》卷一七，葉 2。

長白山頂之天池，東洩而東流者，名圖門烏拉即萬江也[217]，其萬江之南岸，則歴[218] 恵寧府、高亮城、防範城、忠誠府、通嘉城、永達城、文昌城、黃石堡城、勲榮城、慶遠府城，[219] 至海邊。其萬江之北徃東，則有噶哈里爾河[220] 流入萬江，自噶哈里爾河再東至随分大河[221]，其中入海之河共三十八道，再東則烏勒磨倭吉[222]大山，再東則希喀拉撻[223] 大山，極其高峻，為東方近海最高大之鎮山也。

長白山頂之天池，北洩而向北流者，名嵩噶里爾烏拉乃天漢也，北至小白山[224]之東，而江勢東折，由吉林而向西北，流至博得納則轉向東流。江之南岍則東歴阿拉楚哈城[225]，再東則朱拉哥城[226]。從南自胡拉爾哈大澤流出之大河，[227] 由寧古塔北至朱拉哥城西，從南岍流入嵩噶里爾江，再東則黑龍江從北岸歸入嵩噶里爾江，再東則烏素里爾江[228]，從希喀拉撻大山向北流入嵩噶里爾江，再東則入海矣。其自烏勒磨大箐以東，至希喀拉撻大山之東，則有向南流入海之河二十二道。

---

[217] 即滿文 Tumen ula。

[218]「歴」之異體字。

[219] 上述諸地屬圖門江南岸之朝鮮咸鏡道，對照十九世紀初期由朝鮮方面繪製的《朝鮮圖》，可知此處紀錄多有音訛，如所謂「恵寧府」實為會寧（朝鮮語 Hoiryŏng）都護府；「忠誠府」當作鍾城 (Chongsŏn) 都護府；「慶遠府城」則乃慶源 (Kyŏngwŏn) 都護府。又其餘諸城在朝鮮史料中，分別作高嶺（高亮）、防垣（防範）、潼關（通嘉）、永達（永達）、美錢（文昌）、黃柘坡（黃石堡）、訓榮（勳榮）等。清朝以及朝鮮雙方漢文史料中之名物對音差異，為深入滿鮮史乃至東北亞史地之關鍵，除「豆滿／圖門」一類已為人所悉外，餘亦應加詳考。上述圖門江南咸鏡道諸城地理方位，參《朝鮮圖》：Chang, *Chosŏndo*, pp. 15, 19.

[220] 滿文 Gahari bira，今吉林東部嘎呀河。

[221] 滿文 Suifun bira，清代文獻又作隋分河，今稱綏芬河。

[222] 此處「烏」應為衍字，係滿文 Lefu weji 之音訛，清代漢文文獻稱勒富窩集；又滿文「窩集」(weji)，意即密林。此地位於興凱湖南岸，在今日俄羅斯烏蘇里斯基自然保護區（俄文 Ussuriĭskiĭ zapovednik）一帶。

[223] 此處「拉」應為衍字，係滿文 Sikata 之音訛，清代漢文文獻稱希喀塔山，今俄羅斯遠東地區錫霍特山脈（俄文 Sikhote-alin）。

[224] 位於今吉林市豐滿區白山鄉小白山村，雍正十一年 (1733) 清廷於此處修建望祭殿，以供皇帝遙拜長白山之用。

[225] 滿文 Alacuka hoton，清代文獻又作阿拉楚喀城、阿爾楚庫和屯，今黑龍江阿城市。

[226] 滿文 Julgei hoton，清代文獻又作珠爾格伊和屯，位於今黑龍江哈爾濱呼蘭區公家村一帶。

[227] 所謂「胡拉爾哈大澤」，即古稱忽汗海的鏡泊湖；其下游河流，清代文獻稱胡爾哈必拉（滿文 Hūrha bira），即今牡丹江。

[228] 滿文 Usuri ula，即烏蘇里江。

長白山頂之天池，西洩而向西南逆流者，名鴨綠江，流至奉天所屬[229] 熊岳[230]之東、鳳凰城[231] 之東、九連城[232]、平頂山之東，東渡靉江[233]，則中江[234]，再東渡中江，則鴨綠江。即鴨綠江入海之處，中江卡[235] 地方，係與高麗交界，其江東岸自海口以北，則有高麗之望臺五處。鴨綠江往北，則名橫江，再北則與因登[236]交界乃興京也。

「乾隆壬寅年七月二十三日，奉　上諭：[237]『今年春間，因豫省青龍崗漫口，合龍未就，遣大學士阿桂之子、乾清門侍衛阿彌達前往西寧，務窮河源，告祭河神。事竣復命，並據按定南針繪圖貼說呈覽。據奏，星宿海西南有一河，名阿勒坦郭勒，蒙古語阿勒坦即黄金，郭勒即河也。此河實係黄河上源，其水色黄，廻旋三百餘里，穿入星宿海，自此合流至貴德堡，水色全黄，始名黄河。又阿勒坦郭勒之西，有巨石高数丈，名阿勒坦噶達素齊老，蒙古語噶〔達〕素，北極星也；齊老，石也。其崖壁黄赤色，壁上為天池，池中流泉噴涌，釃為百道，皆作金色，入阿勒坦郭勒，則真黄河之源也。其所奏河源，頗為明晰。從前康熙四十三年，　　皇祖命侍衛拉錫等往窮河源，其時伊等但窮至星宿海，即指為河源，自彼回稱復奏，而未窮至阿勒坦郭勒之黄水，尤未窮至阿勒坦噶達素齊老之真源，是以　　皇祖所降諭旨並　　《幾暇格物編》「星宿海」一條，亦但就拉錫等所奏，以鄂敦他臘為河源也。今既考詢明確，較前更加詳晰，因賦〈河源詩〉一篇，敘述原委。又因《漢書》「河出崑崙」之語考之，於今崑崙當在回部中。回部諸水，皆東注蒲昌海，即鹽澤也。鹽澤之水，入地伏流，至青海始出，而大河之水獨黄，非崑崙之水伏地至此，出而挾星宿海諸水為河瀆，而河濟水三伏三

---

229 「屬」之異體字。

230 今遼寧省營口市鮁魚圈區熊岳鎮，清代曾設城駐防。

231 今遼寧丹東市鳳城市。

232 今丹東市振安區九連城鎮。

233 今稱愛河，屬鴨綠江右岸支流。

234 鴨綠江西支流，《鳳城瑣錄》曰：「鴨綠江，古馬訾水，源出長白山，與佟家江合流，南入海；至朝鮮義州府城北，分二流，南行二十里復合焉。西支在東支及靉河之中，故稱中江。」博明希哲，《鳳城瑣錄》（收入金毓黻主編，《遼海叢書》第 1 集，瀋陽：遼瀋書社，1985），頁 274。

235 今遼寧丹東市東北、寬甸滿族自治縣西南之中江台一帶，又稱馬市台，曾為清朝與朝鮮通市之處。

236 滿文 Yenden，又稱赫圖阿拉 (Hetu ala)，位於今遼寧省新賓滿族自治縣永陵鎮。

237 本段係摘自《河源紀略》書首之乾隆帝上諭，以下據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校勘。紀昀等纂，《欽定河源紀略》（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79 冊），卷一，葉 1-4。

見，此亦一證。因於〈河源詩〉後復加按語，為之决疑傳正。嗣又檢閱《宋史・河渠志》有云：「河繞崑崙之南，折而東，復繞崑崙之北」諸語。夫崑崙，大山也，河安能繞其南又繞其北？此不待辨而知其誣。且崑崙在回部，離此萬里，誰能移此為青海之河源？既又細閱康熙年間拉錫所具圖，於貴德之西有三支河，名昆都倫，乃悟昆都倫者，蒙古語謂横也，横即支河之謂。此元時舊名，謂有三横[238]入於河，葢蒙古以横為昆都倫。回部所謂崑崙山者，亦係横嶺，而修書者不觧[239]其故，遂牽青海之昆都倫河為回部之崑崙山耳。既觧其疑，不可不詳誌，因復著〈讀《宋史・河渠志》〉一篇。玆更檢《元史・地理志》，有〈河源附録〉一卷，内稱：「漢史張騫到西域見二水交流，發葱嶺，滙揺澤，伏流千里，至積石而再出。」其所言與朕蒲昌海即揺澤之水入地伏流意頗合，[240] 考証已有先得我心者。按《史記・大宛傳》云：「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揺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河注中國。」《漢書・西域傳》「于闐國」條下所引亦同，而説未詳盡。張騫既至蒲昌海，則或越過星宿海，直至回部地方，或回至星宿海，而未尋至阿勒坦郭勒等處。當日還奏，必有奏牘或繪圖陳献[241]，而司馬遷、班固紀載弗為備詳始末，僅以数語了事，致後人無從考証，此作者之畧也。然則〈武帝紀〉所云：「崑崙為河源」，本不悮[242]，特未詳伏流而出青海之阿勒坦噶達素，而經星宿海為河源耳。至元世祖時，遣使窮河源，亦但言至青海之星宿海，見有泉百餘流，便指為河源，而不言其上有阿勒坦噶達素之黄水，又上有蒲昌海之伏流，則仍屬得半而止。朕從前為〈熱河考〉，即言河源自葱嶺以東之和闐、葉爾羗諸水瀦為蒲昌海，即揺澤，蒙古語謂之羅布綽[243] 爾，伏流地中，復出為星宿海云云。今覆閱御[244]《史記》、《漢書》所記河源，為之究窮原委，則張騫所窮，正與今所考訂相合，又豈可沒其証[245] 本討源之實乎！所有兩漢迄今，自正史以及各家河源辨証諸書，允[246] 宜通行校閱，訂

238 此處漏抄一「河」字。
239「解」之異體字。
240 此處闕「可見古人」。
241「獻」之異體字。
242「誤」之異體字。
243 此處應作「淖」。
244 此處「御」應為衍字。
245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河源紀略》作「探」。
246「允」之異體字。

其[247] 正訛，編輯《河源紀畧》一書。著四庫館總裁督同總纂等，悉心纂辦，將御製〈河源詩文〉冠於卷端。凡蒙古地名、人名譯附[248] 漢音者，均照所[249] 定正史，詳悉校正無訛，頒布刊刻，並錄入四庫全書，以昭傳信。特諭。』欽此。」

附錄三：跋文〈西域回疆記畧〉校注

西域回疆，自嘉峪關外，由哈密順北大幹龍大山之南山根，西抵喀什噶爾、葉爾羌、和闐等處計十三城，共六千七百六十里，實約有萬里。哈密在關之西北，近大幹北山根，堵禦巴里坤之南山口，承接山北伊犂、山南喀葉，係兩路總會，為諸城衝區。再西南則闢展，通山北烏魯木齊紅廟[250]，亦西路阨要地也。再西則吐魯番，乃久附內地之熟回。再稍西南則哈喇沙爾，地廣形固，適中之會，先屯而後可以改土歸流，以輔佐烏魯木齊，且西北路通朱勒都斯地方，水草山川皆為山南之上等。再西則庫車，形勢阨塞。再稍西北則賽哩木、拜城，為庫阿二城中途要地。再西則阿克蘇，北通伊犂，西達喀葉，連封烏什，三路咽喉，形勝總會。再西則烏什，地濶田多，蚕穀皆宜，水草遊牧，礦產俱饒，沃野数百里，富饒之形，為回疆第一城。足具編籍民戶，改土歸流之制，以之腹背伊犂等城，以之鎮制喀、葉各處，足垂[251] 久遠，可固西域。且烏什從剿滅逆回後，地多空閑，深可更制為一府之治。哈喇沙爾，亦多閑地，可為一縣之治。若別城則無餘地，勢難更章設立州縣矣。再稍西南則喀什噶爾，地處西域極邊，接連霍漢，籓籬疆圉，是稱重地。再南則葉爾羌，地處回疆西南隅，邊臨巴達克山、温都斯坦，屏幃內地回封，故為要鎮。再稍東南則和闐，俗淳民富，樂業安堵，地稍居內，易治之區。若於烏什更設府治，編籍戶口，改為內地，遷徙窮民，安置軍流，給以牛力、籽種，借以農具、口粮[252]；其沿途各城則預屯積粮，以備支給裹

---

247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河源紀略》作「是」。

248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河源紀略》作「對」。

249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河源紀略》作「改」。

250 祁韻士《西域釋地》載：「烏魯木齊，都統所駐名鞏甯城，即迪化州，俗呼紅廟子……紅山城東南三里，山色皆赤，上建玉皇廟，以赤土壘壁，故俗呼烏魯木齊爲紅廟。」此紅廟原址在今烏魯木齊市中心紅山公園。祁韻士，《西域釋地》（收入《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正編》第 2 帙第 1 冊），葉 2。

251「垂」之異體字。

252「糧」之異體字。

帶；戈壁路遠，則安台設寓，以偹[253] 中伙住宿。量人分地，官借以力，秋成征[254]收，定額從寬，務令裕如，皆樂趋赴。三年之後，其眾日增，一切犯夫，聽携妻孥。如是，窮民既免凍餒之苦楚，復得飽暖之優裕，犯夫既脫罪刑之拘執，又享骨肉之歡聚。衣食既豊，人安其業，民必樂從，而奔走之不暇，何愁数年不大聚而繁衍也？再開沙土之路，北通伊犂，以便啇[255] 民，猶為急務。何則？今昔之時勢有不同者，盖木素爾搭[256] 坂氷山[257] 者，在昔時為回子與厄魯特分限南北守疆之奇險，回子惧厄魯特之虜掠，固願有此天塹以阻隔之；今回疆全以伊犂為緩急之救援，若一旦有事，路險地阨，或被他人先據而守之，以劃斷我南北之勢，以要截我救援之兵，則是氷山之險，反深足為害也。且太平安謐時，商民往返，皆苦其險阻，大無益也。且更有慮者，伊犂不產硝磺，皆仰濟於烏什，歲辦運五千餘觔，倘有不虞，則氷山路斷，伊犂缺額。硝磺乃軍營防守第一要物，豈可一時少哉！吾故謂沙土之道宜先開，為烏什當時之急務者，此耳。目今之勢，回疆依伊犂之兵，伊犂依回疆之糧及硝磺，正宜道路通達，不宜艱阻險塞。設猝然有事，可任馳驅，彼此相連，以備不虞；即太平無事，貿易有無，官私兩便，以裕國課，否則成為失策。若烏什民集丁眾，戶口繁衍，局勢宏大，兵威雄固，則喀、葉二邊城雖不鎮而自安，而邊外諸部落，亦不敢稍存輕慢睥睨之心，其邊釁亦自永遠息矣。哈喇沙爾地多可墾，與內地又近，其設立辦理更屬容易，雖欠寬濶，而附近星羅碁[258] 布之閑地，從而聯絡之，亦足一縣之治。且該城與烏什雖隔庫車，若民重則聲勢連屬，以大禦小，如臂使指，易為令耳。夫西域之各城，兵少勢单，不足以抵一大處之回戶，必湏[259] 住民以分其勢，聯城以破其眾，且屯且戍。然而多駐兵則多糜費，又非策之善者矣，未若編籍戶口，以助兵力。我人日多，回勢日脞，方是乆遠一定不易之良策。或畏難因循，恐遇事則牽扯山北，而山北因此疲於奔命，久則力衰。再可慮者，倘山北自境有事，兵雖重而又何能他顧哉！且更恐有乘隙而起者，大可慮也。而且九駐防兵以一萬計之，只可出精兵三千，其本處守汛以及各項佔役、病亡老弱，已分去其一半，其餘一半只

253「備」之異體字。
254「徵」之通假字。
255「商」之通假字。
256「搭」之異體字。
257 即穆素爾搭坂，詳見注 145。
258「棋」之異體字。
259「須」之通假字。

可留為自鎮守土而已。况山北各城雖駐重兵，皆北鄰外國，而又兼哈薩克等野性種数近在境界者乎？此勢不可多出外，應亦已朗矣。故吾謂未若於山南形勝要害之地，籌策自應堅固之為愈也，是以吾諄諄於多屯多戍、改土歸流者，葢縁此耳。若夫熟識西域地理情形者，或於吾言有所採擇焉耳；其拘泥固執者，未必不以余論為迂濶過慮也矣。余識淺智短，學疎才愚，何悉經野之術，莫洞安邊之策。惟體先憂後樂之訓，妄[260] 抒蠡測管窺之見，將所越歷西域大概情形以及各處地勢，粗記其簡畧云爾。

沙州記畧。沙州西羈嘉峪關外九百九十里，西濵[261] 臨瀚海，遙通各回城，別無隣援，孤懸關外。雖東連敦煌、玉門，北接安西，然兵少民稀，勢欠聯絡，似不足為肅州之保障。幸山北巴里坤已駐重兵，山南哈密駐鎮，勢接安西，形雄沙漠，聲氣既貫，足蔽孤懸，非比昔日也。惟是道改於安西，則沙州又未免冷落矣。

安西記畧。安西居哈密、肅州之中，北至哈密九百餘里，南至嘉峪關六百餘里地，為兩城之樞紐，形成關外之保障。昔年駐重鎮者，非無意也。今而山前哈密、闢展，山後巴里坤、烏魯木齊，兵重民庶，形勢雄固，則籓籬之功不讓沙州，是以安西僅承接遞[262] 送而已。然能留心招墾聚戶，人丁日增繁衍，再駐屯戍以弹壓之，則猶盡防邊之美善也。

哈密記畧。哈密，古火州地。本處回民久安於內習，力亦已薄弱，用其人不足以當緩急，惟依我兵。民既眾，形勢日固。其地北路則遥通伊犂三千五百里；南路則遠達喀、葉五千二百一十里；近則北控南山口至巴里坤三百三十里；西制闢展九百八十里，至吐魯番一千二百二十里。往返差務絡繹不絕，東西驛遞日夜無虛，實兩路之阨要咽喉，乃百城之樞紐總會，雖非比喀、葉守邊防驚之重鎮，却[263] 繁稱南北承接轉辦之首郡，地居衝繁，關外第一，豈同安西僅照依應付迎送而已。惟是制輕而事繁，權小而政大，則當擴充其制，高城深池，駐劄大臣，以重封疆之體，以壯坐鎮之威。廣屯積糈，將來以備屯民携眷者口粮之應付，以儲戍卒遷徙者裹帶之資費。增戍加兵，以接續山後各府城之勢，以連屬山前諸部落之氣，則防範規模，籌邊守策，深計遠慮，猶為宏肆全備矣。

闢展記畧。闢展，古玉門關之重地。西北於烏魯木齊紅廟七百三十里，雖隔山而有腹背之依；西南於哈喇沙爾一千一百里，雖稍遠而正當其衝；東接哈密九

260「妄」之異體字。

261「濱」之異體字。

262「遞」之異體字。

263「卻」之異體字。

百八十里；西連吐魯番二百四十里，亦重地也。况地居控要，人民日聚，從而增屯戍、廣戶口，務臻繁衍富庶，以為火州之藩籬，以作西域之保障，豈可以其近而忽之哉！

哈喇沙爾記畧。哈喇沙爾，東至闢展一千一百里，西至庫車九百四十里，背依北幹大山，濵臨開都大河，環山帶水，四塞險固，地廣土沃，形勝富饒，足敷開墾，大儲屯戍。誠能招徠增屯，移民籍戶，久而改土歸流，紹開吏治。深池高城，展大規模，重兵積儲，寓兵於農。可以虎視諸城，雄橫回部，為庫車之唇齒，作闢展之門戶。况地多産礦，再從而鼓鑄之，足備所需，無庸外假，守斯土者，宜留意焉。

庫車記畧。庫車，自此由戈壁而西七晝夜，可直達葉爾羗一千八百六十餘里，惟苦於水草艱難。北塞山北賽哩木、拜城，東接庫爾勒，由此而東越戈壁，竟可直抵沙州。地居阨要，東西衝區，田沃人強，足雄諸部。且山産銅鉄，足備取用，若盡地利，未必盡勞內運。既無人創之於前，復無人開之於後，承接相循完差而已。然而思久遠經野者，必留意焉。

賽哩木、拜城記畧。賽哩木與拜城相去只八十里，皆小部落也。然賽哩木東連庫車二百里，拜城西連阿克蘇四百一十里，兩處居庫、阿二城之中，成聯絡之形勢，通貫串之聲氣，不為無賴矣。而且北山多礦，頗可採煉，如能細心籌畫，日獲其處，各盡地利，未必不大得其利藪。再倣照滇黔辦廠之法，則採煉鼓鑄普爾[264]，以多搭於俸餉支放，大益於人，官私皆便。何則？目今所鑄之普爾，止能搭放二承[265]，往往昂貴。雖則徵採，僅遵守故事，應辦而已，是以未收銅礦之實効大利。再者其雜項礦子，亦可從而挖採煎煉，招商抽課，則地方漸至豊富，回民亦可假以營運謀食，均屬裨益，豈僅利益在我而已哉。惟是司事者在董率得人，一切弾壓調停各當方妥，否則另生枝節憤事，而又反委咎於礦廠之多事。嗚呼！有非常之人，方有非常之功，眾可以樂成，愚難以謀始，回疆各城大抵皆

[264]「普爾」(pul) 一詞，突厥語意即「錢」，係借自波斯語。葉爾羌汗國以及準噶爾汗國時期，天山南麓諸城因與中亞、南亞各地市場商品交易密切，故多流通銅鑄普爾錢。清代在控制新疆後，亦在葉爾羌等南疆各地設鑄錢局，發行普爾錢。

[265] 應作「搭放二成」。此當地搭放駐紮清軍兵餉之二成制錢，係由鼓鑄之普爾支應。然此處以普爾錢搭放新疆駐軍二成兵餉之例，似乎在乾隆以後並未推廣，仍主要由內地支銀。如道光十九年御史重豫仍奏稱：「新疆地方，自乾隆年間底定以來，每年所需官兵俸餉，皆調自內地……內地銀價之昂，未必不由於此。若照內地兵餉搭放二成之例，每年在南北兩路添鑄錢數萬串，以資搭放。」《清宣宗實錄》卷三二九，頁 1179。

然。其創立者若能一分利在頭目及回民，一分利在工匠及商客，一分利在司事及夫役，其餘七分利歸公項，如此公私皆獲利，則上下各相安，人人樂從而自相為力矣，斯方能垂久遠而無害。不然或前後相尚，彼此邀[266] 功，歷任祟加，日事搜求。或以察察為能，下無容足之處；或以絲絲為利，人有賠累之苦。則勢必怨生而終隳，雖勉從而無功，又未若留與老生作長談之話柄為尤愈也。

阿克蘇記畧。阿克蘇，北通伊犂一千四百里，雖險阻氷山，亦南北必由之途，乃回民貿易之徑。東控庫車六百九十里，西扼烏什二百四十里，為葉爾羌、喀什噶爾之咽喉總會，地衝形要，田沃人眾。雖建堡駐兵，惟惜其輕不足以制重，寡不足以禦多，葢循舊章而忘形勝之要害，視一時而忽日後之控制也。必須更立章程，擴大制度，肘腋烏什，表裏鞏固。遥接喀、葉、和三城，關鎖伊、阿、烏南北，若此則貫串一勢，結聯成局，可息外徼之窺竊，足振極邊之聲勢。

烏什記畧。烏什，東於阿克蘇二百四十里，有唇齒之依；西南於喀什噶爾九百六十里，接壤葉爾羌一千四百五十里，有門戶之要；北於伊犂一千六百四十里，有腹背之形；西於布魯特部落有聯封之邇，洵要地也。昔年布魯特騷擾回民時，則烏什代阿克蘇先受其搶奪之害；及麥熟羊肥，則阿克蘇偏烏什，多獲其互易之利，是則烏什城為阿克蘇之長城矣。烏什之田土，東至阿什塔克，西至巴什雅哈嗎，南至呵爾品，北至河北山根，東西百餘里，南北不下百里，其饒沃十倍諸城。其洋海地方適當西路之衝，為內外屏籓，是表裡門戶，形勝居中，節制各城，一總要會之都也。若於此處建立大城，以永寧舊城為西鄙犄角，互相救應，盡地利而廣增屯戍，量水草而繁蓄孳生，地產銅鉄硝磺，村宜桑蚕織紡。天時和暖，地滋五穀，引水溉田，大有內地之風。所產富饒，足堪駐重兵，廣積儲，籍窮兵，增戶口，久則生齒日繁，從而改土歸流，即以本地之所產而養育其人，庶免內帑之協濟，而且人眾則勢雄，以多禦寡，以大使小，莫敢違背，睥睨皆受我教令驅策矣。况以十七城而計，現在所駐防之兵，不足以當大處一城之回戶，深非強幹弱枝握權之制、固本深根久遠之道。其移徙安置，係窮民之所深願；開墾播種，又回人之所不争。始初則創立規模固難，既久則習熟巧生自易，所謂見効遲而收功大也。故變通之道，存乎其人，開務成物，各有其時。大抵因循相安於素習，更章畏難於勞怨。目今各部落不敢妄萌覬覦之心者，以其伊犂、烏魯木齊等處，駐重鎮於山北，而弾壓遥制山南也。雖足倚傍，然而倘山南有事，則山北必自勞攘，更兼牽動諸城，內外騷然，且恐隔阻氷山，遠不應急。烏什之事，亦

266「邀」之異體字。

可概見者耳。豈若一勞永逸，治至南北並雄，互相保障，各立軍威，壓鎮部落，俾蠢頑不敢妄生扳扈之念，俱相安居於故業，始則迫於威勢，而久則澆漓之風自化。而且以邊徼空閑可墾之餘地，養我內地無業有用之窮民，裒[267] 多益寡，人自相衛。所謂地盡利而人盡術者，此也。有封疆之寄者，豈有意乎？烏什大河之西北、沙土卡倫之北，山有路可通伊犂，無氷山之險阻，且近，惟路小，夏秋患溪漲道沒。若從而開通之，則不僅倫緩急之救援，而尋常商販亦大受其利益。此道即大瓦齊[268] 自伊犂南遁[269] 至葉爾羌之僻路也。

喀什噶爾記畧。喀什噶爾，地處回疆極邊，西鎮霍罕。雖有鉄里克、必流里克等搭坂，三道大山險阻劃分內外，然只可為霍罕東界之門戶，不足為喀城疆圉之藩籬。相隔千五百餘里，其山四塞險固，霍罕依以雄橫諸部，為伊夜郎自大之窟；而且安吉彦之人善貿易，久在我諸城大通聲氣，深悉我虛實，是則彼可偵伺我之動靜，我則難得彼之真偽，深為喀城之一大痼疾也。而更兼近邊之布魯特，搬移無常，恒出入境內，此最易生隙者。西南通巴達克山邊外部落，故喀什噶爾事雖簡而處極邊，接壤外地，關係綦重，有事則先受其兵，為西域最要之地。其難治安者，喀城回眾地狹，開墾無餘，所產相較僅糊口而已。所恃者南隣葉爾羌，彼此相依，英阿雜爾處中，以消息之東至烏什則又遠在八百之外，而中又無承接之地，所謂鞭長莫及，難成鼎足之形。欲求為久遠長安之計，須於喀、烏兩城之適中鬮展等處，墾地屯戍，築城游牧，遙接兩城之勢。山南由英阿雜爾、葉爾羌至烏什之驛遞稍遠，如鬮展設屯，與兩城之卡倫相湊亦可作；山北之郵遞較近，倘卒然有驚，足通緩急，且就該處鹽池之利，運賣可為窮民之生計。再喀城之難辦者，馬政亦一端也，以其近無牧厰，則游牧皆仰於英阿雜爾，相隔二百餘里，荒徼邊陲，全依馬力，牧厰不便，故馬政難辦矣。城小週僅二里，兵少不過一千，不足以弾壓，大示以孤弱；設加兵駐防，而議者又以糧少不敷歳需而掣肘。然烏什中途及附近地方既然開墾設屯，自可籌畫，其裒多益寡，運籌調劑，量入為出，從長計議，務使賦不加則民不擾，而地方安、農法善，則事有益而終無獘[270]。必可久遠遵守者，存乎經濟之術耳。其鎮邊之道，在鎮靜綏撫，輕徭薄

[267]「裒」之通假字。

[268] 即準噶爾首領達瓦齊 (?-1759)。關於其事蹟，見：孔令偉，〈察哈爾格西《厄魯特王統世系》譯注〉，《衛拉特研究》6 (2020)：25-34；承志，〈阿睦爾撒納「叛亂」始末考（上）〉，《追手門学院大学国際教養学部紀要》8 (2014)：45-77。

[269]「逃」之異體字。

[270]「弊」之異體字。

歛，敦大體，得人心。若增賦加額，勞害三時，則邊釁立見，非策矣。是以喀城既不能有餘地自屯，又處邊遠極要，只得換防輸運，以固重鎮之制，以垂久遠之計。然山多未盡之利，不可因小補而膜視，遂高擱而棄置也。

葉爾羌記畧。葉爾羌，處回疆西南隅，為極邊要地。西北通英阿雜爾三百餘里，再二百里即至喀什噶爾；東南通和闐三城六百餘里；東北通阿克蘇一千二百餘里，至烏什亦千餘里。烏什、阿克蘇兩城皆遠，惟與喀什噶爾、和闐共成鼎足之形，偶遇緩急可以相助。然兩城兵輕，亦不足以救援，且西與巴達克山接壤隣封，西南遥通温都斯坦，地臨極邊，形重西域，必須駐重兵弹壓坐鎮，防備不虞。更宜即更張者，今兵、回共居一城，大非相安之道，久必生嫌隙，滋生事端，無益之至；未若擇地建城，以昭形勝，以杜亂竇之為妥也。葉城形勝，西北與喀什噶爾中則有英阿雜爾，以承接之；東北與烏什中則無承接之處，大失聯貫。須於葉烏兩城適中之地建城，開屯駐兵中間，以接續兩城之氣脉，得其糧亦可以備軍糈，廣其地亦可以助輔弼；再出陳易新，交易外回、布嚕特等，多換牲畜，廣牧孳生，以防不測；多植蚕綿，勤勸織紡，以供所需。葉喀二城之形勢，大畧相同，皆險在臨邊，窘無餘地，而難以墾屯，勢又不得不駐重鎮以控制諸部。然而量賦為餉，設法開屯，存乎其人。惟是昔年所定額征之章程，乃一時倉猝，未暇細計日後之繁衍，以此時而論只可設法减輕，而不可些徵[271] 加重，方保人心久安，地方寧謐。斯一事最關緊要，為當時之急務，識者豈以余言為是乎否耶？

和闐記畧。和闐，古于闐也，居葉爾羌之東南六百五十里，南依山，北臨河。風俗循良，人民富庶，工織紡，勤農作，淳厚尚潔，過於諸城，而諸城反目為喀爾器塔特，葢回語黑漢人也。[272] 地產玉石，自南山阧瀉下河二道，一名哈拉哈什河，自西南布主雅爾村阧潭中流出，產緑玉及雜色玉；一名玉隴哈什河，自西南胡馬拉塔克塔坂阧潭中流出，產白玉。自河溯流而南上，路皆塞，而不能入山抵源。沿河徃北有哈拉哈什城、玉隴哈什城、柯爾雅城、和闐城在焉。自城東南遥通後藏。和闐為葉爾羌之附庸小邑，民安於業，故易為治耳。

乾隆二十九年正月二十四日，余於侍衛任內，出卡倫兵，赴喀什噶爾。三月十七日出嘉峪關，自八道溝向西行，由沙州至哈密，係新路。於三十二年九月初

271「微」之異體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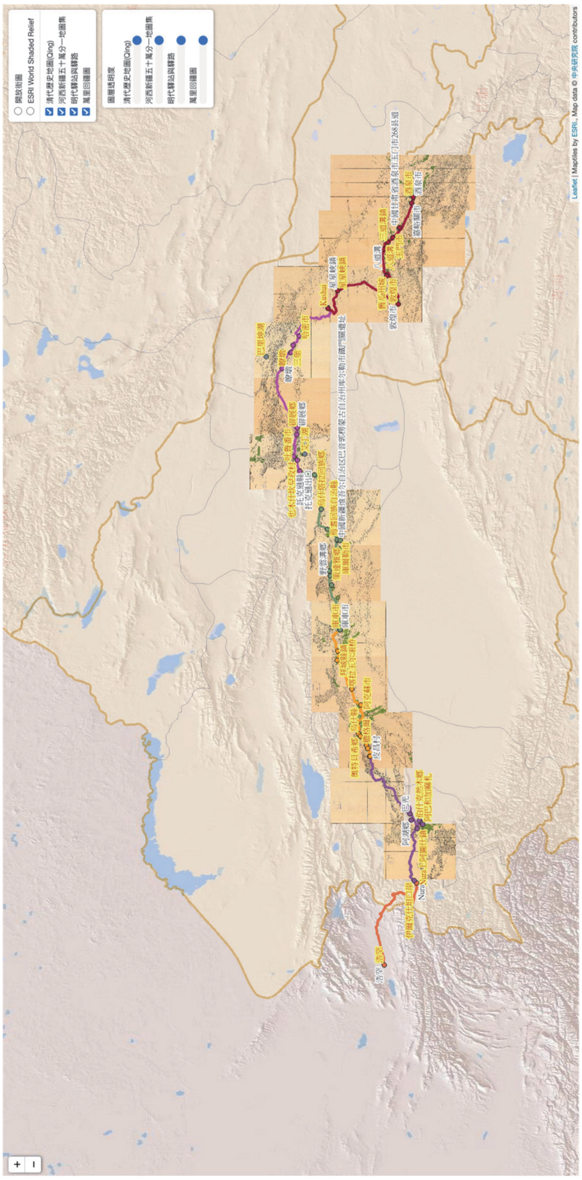
272 此即波斯、突厥以及蒙古諸語所謂 Qarā Ḵeṭāy / Qara Kitad，字面意思確如蘇寧阿所謂黑漢人，然十二世紀統治和闐的西遼政權亦為此名。此稱謂是否真實反映十八世紀南疆諸城視和闐人為漢化群體，抑或是西遼政權之遺產影響，俟日後詳考。

四日自哈密向東行，由安西至八道溝，歸路至嘉峪關，係舊路。按山川道路險易形勢，日繪一圖，凡山之枝幹，河之源委，形勝阨要，水草田土，有關於屯戍防守者，莫不備載。且唐人言地理者，只云山脉發泒崑崙，艮震巽三大幹入中國；黃河發源於星宿海，大畧而已，以其未曾至西陲遠域也，故不知星宿海以西，尚有來源。余將所經歷之山川繪圖作説，名曰《萬里回疆圖》，以備後之好古博學者之採取考覧焉。圖成於癸巳歲，紫荊關叅[273] 將署中之四松亭；裝裱於己酉歲六月，正定總兵署中之正定書屋。兩分两卷，遂付與長子額勒謹、次子額樂春、三子額樂布、四子額樂昇、長孫福謙、次孫益謙、三孫吉謙世藏，以為傳家之珎[274]，敬之重之。

豐寧蘇寧阿序【蘇寧阿印】

273「參」之異體字。
274「珍」之異體字。

附錄四：十八世紀後期南疆交通路線圖暨地理資訊系統[275]



[275] 孔令偉、廖泫銘，「清乾隆朝《萬里回疆圖》歷史地理資訊系統」(https://gis.sinica.edu.tw/prj/xinjiang/，檢索 2021.11.18)。此 GIS 系統之古今地名座標對照係立基於筆者對《萬里回疆圖》之史地考證，並參校一九四三年國立中央大學理科研究所地理學部繪製之《河西新疆五十萬分一地圖集》以及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清代部分等數化底圖。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整編史語所檔案》，臺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
《內閣大庫檔》，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伊犁圖》，清紙本設色圖，京都：京都大學圖書館藏。
《西域輿圖》，清紙本設色圖，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京都：京都大學圖書館藏。
《軍機處檔摺件》，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國史大臣列傳》，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清宣宗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
《清高宗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
《清朝文獻通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
《欽定八旗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71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欽定西域同文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35冊。
《欽定皇輿西域圖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00冊。
《新疆全圖》，清鈔本，Washington, DC: Library of Congress。
《新疆孚化志略》，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西部地方新疆省第19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據咸豐七年鈔本影印。
《蘇寧阿列傳》，收入《清史滿漢大臣列傳》第116冊，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統一編號：故殿026369。
《蘇寧阿列傳》，收入《清國史館傳稿》，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文獻編號701003586。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滿文寄信檔譯編》，長沙：嶽麓書社，2011。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代新疆滿文檔案彙編》，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
方志遠等點校，《大明一統志》，北京：中華書局，2017。
方觀承，《從軍雜記》，收入《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正編》第2帙第1冊，上海：著易堂，1891。

王圻，《三才圖會》，清雍正乾隆間黃晟槐蔭草堂後印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
王昶，《征緬紀聞》，收入《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正編》第 10 帙第 4 冊。
王梓材、馮雲濠輯，《宋元學案補遺》，收入《四明叢書》第 5 集，臺北：新文豐，1988。
司馬遷，《史記》，臺北：鼎文書局，1981。
永瑢等編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
汪前進、劉若芳整理，《清廷三大實測全圖集——乾隆十三排圖》，北京：外文出版社，2007。
汪前進、劉若芳整理，《清廷三大實測全圖集——雍正十排圖》，北京：外文出版社，2007。
汪前進編，《中國地圖學史研究文獻集成（民國時期）》，西安：西安地圖出版社，2007。
和寧，《回疆通志》，北京：中華書局，2018。
松筠修，《欽定新疆識略》，收入《中國邊疆叢書》第 1 輯第 11 冊，臺北：文海出版社，1965。
祁韻士，《西域釋地》，收入《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正編》第 2 帙第 1 冊。
祁韻士，《西陲要略》，收入《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正編》第 2 帙第 2 冊。
紀昀等纂，《欽定河源紀略》，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79 冊。
唐執玉等纂，《畿輔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04 冊。
徐淞，《新疆賦》，收入氏著，《西域水道記（外二種）》，北京：中華書局，2005。
徐善繼、徐善述，《重刊人子須知資孝地理心學統宗八卷》，收入《故宮珍本叢刊》第 411 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
徐道撰，黃掌綸修訂，《神仙鑑》，臺北：廣文書局，1987。
笑幻道人，《新疆地輿總圖》，清光緒年間鈔本，臺北：國家圖書館藏。
博明希哲，《鳳城瑣錄》，收入金毓黻主編，《遼海叢書》第 1 集，瀋陽：遼瀋書社，1985。
黃掌綸等纂，《長蘆鹽法志》，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
愛新覺羅・弘曆，《御製詩文十全集》，收入《武英殿聚珍版書》第 588-595 冊，清光緒二十五年廣雅書局刊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
愛新覺羅・玄燁，《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第 4 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99 冊。
愛新覺羅・玄燁，《聖祖仁皇帝聖訓》，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411 冊。

椿園七十一，《西域聞見錄》，清乾隆四十二年刊袖珍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

椿園七十一，《異域瑣談》，清鈔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

萬民英，《三命通會》，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10 冊。

劉基，《堪輿漫興》，收入《古今圖書集成》第 475 冊，上海：中華書局，1934。

慶桂等編，左步青校點，《國朝宮史續編》，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

歐陽修，《文忠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02-1103 冊。

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

穆齊賢，《繙譯試策法程》(*Ubaliyambuha simnehe bodon i durun kemun i bithe*)，清鈔本，Berlin: Staatsbibliothek zu Berlin。

蘇軾撰，王文誥輯注，《蘇軾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

蘇寧阿，《山居野吟》，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376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蘇寧阿，《江村野吟》，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376 冊。

蘇寧阿，《恒一堂文稿》，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376 冊。

蘇寧阿，《煙霞錄》，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376 冊。

蘇寧阿，《萬里回疆圖》，清乾隆三十八年紙本設色圖，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

蘇爾德，《新疆回部志》，清鈔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

Chang, Sang-hun, and Yi Hyo-jong, eds. *Chosŏndo*. Seoul: Kungnip Chungang Pangmulgwan, 2007.

Fuchs, Walter. *Der Jesuiten-Atlas der Kanghsi-zeit, seine Entstehungsgeschichte nebst Namensindices für die Karten der Mandjurei, Mongolei, Ostturkestan und Tibet, mit Wiedergabe der Jesuiten-Karten in Originalgrösse*. Peking: Fu-Jen Universität, 1943.

Hesei toktobuha hoise jecen i kooli hacin i bithe, 《欽定回疆則例》滿文清刻本, Washington, DC: Library of Congress.

二・近人論著

小沼孝博

2008 〈控噶爾國小考：18 至 19 世紀歐亞東部奧斯曼朝認識之一端〉，《民族史研究》8：153-163。

中國國家圖書館編

1997 《輿圖要錄》，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孔令偉

2018 〈1724-1768 年間拉達克、西藏與清廷間的歐亞情報網——以清代中國對莫臥兒帝國的認識起源為核心〉，《清史研究》2018.2：27-48。

2020 〈察哈爾格西《厄魯特王統世系》譯注〉，《衛拉特研究》6：25-34。

2021 〈欽差喇嘛楚兒沁藏布蘭木占巴、清代西藏地圖測繪與世界地理知識之傳播〉，《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92.3：603-648。

王明珂主編

2018 《史語所舊檔文書選輯》，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王庸編

1932 〈國立北平圖書館特藏清內閣大庫輿圖目錄・附國立北平圖書館特藏新購輿圖目錄〉，《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6.4：45-72。

王庸、茅乃文編

1933 《國立北平圖書館中文輿圖目錄》，北平：國立北平圖書館。

1937 《國立北平圖書館中文輿圖目錄續編》，北平：國立北平圖書館。

王鵬輝

2014 〈近世哈密的佛寺道觀考實 (1727-1931)〉，《西域文史》2014.9：315-332。

王耀

2014 〈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清代《新疆地輿總圖》研究〉，《中國典籍與文化》2014.3：121-128。

李孝聰

2007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藏清代輿圖的初步整理與認識〉，《故宮學術季刊》25.1：151-178。

承志

2009 〈滿文《烏喇等處地方圖》考〉，《故宮學術季刊》26.4：1-74。

2011 〈尼布楚條約界碑圖的幻影——滿文《黑龍江流域圖》研究〉，《故宮學術季刊》29.1：147-236。

2014 〈阿睦爾撒納「叛亂」始末考（上）〉，《追手門学院大学国際教養学部紀要》8：45-77。

姚大力

2004 〈「回回祖國」與回族認同的歷史變遷〉，《中國學術》2004.1：90-135。

柯志明

2021　《熟番與奸民：清代臺灣的治理部署與抗爭政治》，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段志強

2021　〈經學、政治與堪輿：中國龍脈理論的形成〉，《歷史研究》2021.2：109-132。

烏雲畢力格、那順達來整理

2014　《蒙古游牧圖：日本天理圖書館所藏手繪蒙古游牧圖及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秦國經、劉若芳

1997　〈清朝輿圖的繪製與管理〉，曹婉如等編，《中國古代地圖集・清代》，北京：文物出版社，頁 71-78。

馬子木

2017　〈乾隆朝初通巴達克山考：兼論準噶爾遺產與清朝中亞外交之初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8.2：347-396。

國立中央圖書館編

1986　《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增訂二版。

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編

1936　《清內務府造辦處輿圖房圖目初編》，北平：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

國立北平圖書館編

1934　《國立北平圖書館輿圖部概況》，北平：國立北平圖書館。

張莉

2008　〈《西域圖志》所載鎮西府、迪化州地區戶口資料考述〉，《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3.2：142-147。

張瑛

2017　〈《西域圖志》纂修略論〉，《西夏研究》2017.1：114-120。

陳世明

2007　〈清代《西域圖志》維漢蒙漢合璧地名〉，《民族語文》2007.1：52-55。

陳維新

2009　〈同、光年間中俄伊犁邊界交涉探討——以中俄訂定之條約及界圖為例〉，《故宮學術季刊》27.1：179-225。

2014　〈帕米爾界圖及光緒時期中俄帕米爾界務交涉問題探討：以國立故宮博物院現藏外交輿圖為例〉，《故宮學術季刊》32.2：117-168。

2016　〈清末新疆塔爾巴哈台段界圖及界務交涉 (1864-1893)〉，《故宮學術季刊》33.4：95-142。

陳劍平

2014　〈清代新疆卡倫的體系構成〉，《北方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4：11-15。

喬治忠、侯德仁

2005　〈乾隆朝官修《西域圖志》考析〉，《清史研究》2005.1：104-113。

惠男

2020　〈薩木薩克早年經歷考：清朝在喀什噶爾與中亞帕米爾以西的政治困境，1759-1784〉，《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09：1-43。

黃清琦

2010　《臺灣輿圖暨解說圖研究》，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楊玉成

2019　〈龍脈〉，《中國文哲研究通訊》29.1：147-167。

葉高華、蘇峯楠

2017　《十八世紀末御製臺灣原漢界址圖解讀》，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賈建飛

2012　〈清代新疆的內地壇廟：人口流動、政府政策與文化認同〉，《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12.2：90-103。

鄒愛蓮

2006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清宮輿圖〉，發表於國立故宮博物院主辦，「清代檔案整理與館際合作——第三屆清代檔案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6.11.02-03。

靳煜

2014　〈清乾隆年間西域測繪再考察〉，《歷史地理》30：249-266。

2016　〈乾隆年間三次西域測繪再分析〉，《西域研究》2016.1：27-34。

劉祥光

2010　〈宋代風水文化的擴展〉，《臺大歷史學報》45：1-78。

劉傳飛

2017　〈清代新疆輿圖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博士論文。

劉翠溶、范毅軍

2011　〈試以環境史角度檢討清代新疆的屯田〉，陳永發主編，《明清帝國及其近現代轉型》，臺北：允晨文化，頁 203-265。

潘志平

2000　〈布魯特諸部研究〉，《中亞學刊》第 5 輯，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頁 165-215。

蔣鐵生、呂繼祥

2008　〈康熙〈泰山山脈自長白山來〉一文的歷史學解讀〉，《社會科學戰線》2008.6：140-146。

鄧衍林編

1958　《中國邊疆圖籍錄》，上海：商務印書館。

盧雪燕

2013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彩繪本《山西邊垣圖》與《山西三關邊垣圖》考述〉，《故宮學術季刊》30.4：105-153。

寶音朝克圖

2005　《清代北部邊疆卡倫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佐口透

1960　〈カシュガル＝ホージャ家の後裔〉，《東洋學報》42.4：373-411。

榎一雄

1949　〈乾隆期の西域調査とその成果——特に西域同文志について〉，《史学雑誌》58.3：49-76。

Bartlett, Beatrice

1991　*Monarchs and Ministers: The Grand Council in Mid-Ch'ing China, 1723-182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rophy, David

2016　*Uyghur Nation: Reform and Revolution on the Russia-China Frontie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osca, Matthew（馬世嘉）

2010　"Empire and the Circulation of Frontier Intelligence: Qing Conceptions of the Ottomans."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70.1: 147-207.

2013　*From Frontier Policy to Foreign Policy: The Question of Indi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eopolitics in Qing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Onuma, Takahiro

2017　"The 1795 Khoqand Mission and Its Negotiations with the Qing." In *Kashgar Revisited: Uyghur Studies in Memory of Ambassador Gunnar Jarring*, edited by I. Bellér-Hann, B. N. Schlyter, and J. Sugawara. Leiden: Brill, pp. 91-115.

Thum, Rian

2014 *The Sacred Routes of Uyghur Histo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Yarshater, Ehsan, ed.

1982-? *Encyclopædia Iranica*. London: Routledge.

Zhang, Xue（張雪）

2020a "Imperial Maps of Xinjiang and Their Readers in Qing China, 1660-1860."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 4.1: 111-133.

2020b "Qing China's Discovery of Central Eurasia: Geography and Statecraft, 1759-1881." PhD diss., Princeton University.

三、網路資訊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人名權威／人名傳記資料庫」

https://newarchive.ihp.sinica.edu.tw/sncaccgi/sncacFtp?@@0.8700873109300296，檢索 2021.07.19。

國立故宮博物院「明清輿圖全文影像資料庫」

http://npmhost.npm.gov.tw/tts/npmmeta/map/mapindex.html，檢索 2021.07.19。

孔令偉、廖泫銘

2021 「清乾隆朝《萬里回疆圖》歷史地理資訊系統」，https://gis.sinica.edu.tw/prj/xinjiang/，檢索 2021.11.18。

柯志明、陳兆勇

2020 「乾隆臺灣番界」，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 GIS 專題中心「臺灣百年歷史地圖」，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twhgis.aspx?fbclid=IwAR2kTdqfHmkEDcwRgx1d6XPZbL3peDn9OEESUYa7ZYYxZnsNzFvr_sPQY58#，檢索 2021.12.31。

葉高華、蘇峯楠

2017 「『十八世紀末御製臺灣原漢界址圖』轉譯」，https://www.google.com/maps/d/u/0/viewer?mid=158sIoQJr_4YvZWdx9Uj4sSjNXNY&ll=23.329738505884478%2C122.74074475390624&z=7，檢索 2021.12.31。

孔令偉

Suningga's *Wanli Huijiang Tu* and Qing Geographic Knowledge of Xinjiang in the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Ling-Wei Kung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The Fu Ssu-nien Library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t Academia Sinica is in possession of *Wanli Huijiang tu* 萬里回疆圖 (*Atlas of the Hui's Territories*), a large map of Xinjiang produced by Suningga (Suning'a 蘇寧阿 in Chinese, 1731–1805), a Qing Mongol banner officer, in 1773. As the only existing copy in the world, this colorful manuscript map is rich in cultural and heritage value. Additionally, it contains significant historical meanings in providing abundant pictorial and literary information on Xinjiang under the rule of the Qing dynasty in the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especially regarding the so-called "xiyu" 西域 (western regions) and the influence of Qing infrastructure on Xinjiang's landscape. The map, in this way, meticulously illustrates the natural and human landscape of southern Xinjiang, with attention paid to the infrastructure and social situation of Altishahr after the Qing conquest of the Zunghars.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a voluminous preface and postscript are included in which Suningga elaborates the creation process of the map, namely it being based on his military experience in Xinjiang in the 1760s, writings which profoundly shed light on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diverse knowledge traditions such as Song-Ming geomancy, Qing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 studies of Northwest China, and Islamic geographic studies from Central Asia. Moreover, this map—centered on Xinjiang—contains extensive geographic records that profoundly reflect the author's geographic understandings of "land under heaven" 天下, thereby providing critical clues which further our apprehens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cartography, geography, and related worldviews in the Qing empire.

By contextualizing the cartographic images and literary annotations of *Wanli Huijiang tu* together with related Qing records in Manchu and Chinese, the present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development of Qing geographic knowledge of the western regions as well as the above influences of Qing infrastructure by considering perspectives on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late imperial China and Central Eurasia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Finally, aside from including colorful photocopies of *Wanli Huijiang tu* and both its preface and postscript with critical annotations as appendices, this article, based on historical and philological studies of the map, has reconstructed the Qing traffic routes within southern Xinjiang by mapping it in a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Keywords: *Wanli Huijiang tu* by Suningga; Qing maps of Xinjiang;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xiyu"; geographic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